

启微

〔日〕横手慎一 著

吉辰 译

日露战争史：20世纪最初的大国间战争

日俄战争

20世纪第一场大国间战争

日露战争史

日露戦争史：20世紀最初の大国間戦争

日俄战争

20世纪第一场大国间战争

〔日〕横手慎二 著

吉辰 译

启微
QIWE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俄战争：20世纪第一场大国间战争 / (日)横手慎二著；吉辰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4

ISBN 978 - 7 - 5201 - 4496 - 4

I. ①日… II. ①横… ②吉… III. ①日俄战争 - 研究 IV. ①K31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7445 号

日俄战争：20 世纪第一场大国间战争

著 者 / [日]横手慎二

译 者 / 吉 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李期耀 陈肖寒

责任编辑 / 李期耀 陈肖寒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 (010) 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5 字 数：115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4496 - 4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9 - 0840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说起日俄战争，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司马辽太郎的《坂上之云》。我初次读到这部小说，是在1970年代做学生的时候。虽然知道这不过是小说，但被书中描写的日本的“历史”所打动，一口气便读完了。不过那时没有想到，时隔三十多年，我自己会来撰写日俄战争的历史。

且不论并非研究著作的《坂上之云》，日俄战争的研究成果数量极多，将其全部消化是难以办到的。不过，中公新书编辑部提议撰写这本书时，我不顾学力未逮答允下来，是因为从前读过的一位俄国军事思想家的著作浮现在了脑海中。此人名叫亚历山大·斯维钦（Alexander Andreyevich Svechin）。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在1937年撰写的日俄战争史论。在本书末，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他的事迹。

斯维钦1903年毕业于总参谋部附属的尼古拉学院，在总参谋部服务不久后适值日俄战争爆发，志愿参战。战后回到总参谋部，根据战争中的经验陆续发表了一些日俄战争史论，受到关注，尤其著名的是1910年出版的《日俄战争：1904~1905》一书。

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斯维钦认同了苏联共产党政权，在苏军总参谋部中从事战史研究。这种沙俄时代的专家，在苏联共产

党治下被视为思想不可靠的“资产阶级专家”而受到提防，但他们的专业知识对于国家的运转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在苏联社会因急剧工业化而矛盾突出的 1931 年 2 月，斯维钦以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罪名被逮捕，处以五年徒刑。1932 年 2 月，他被突然释放。这是因为 1931 年 9 月日本对中国东北出兵后，苏联领导层认为需要斯维钦在日俄战争史方面的知识。被释放后，他陆续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发表了一系列分析日军的论文，诸如《过去与现在的日军》《日本军事学的新发展》。对于这样一位重要人物，日本却没有一个人加以注意。

斯维钦 1937 年撰写的日俄战争史论《20 世纪最初阶段的战略》，是他的集大成之作。在这部作品中，他给予日军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创造性地发展了欧洲大陆的军事理论，并且出色地结合陆军与海军，开展出新时代的军事战略。按照他的观点，旅顺的攻防战几乎凝聚了这场战争的全部战略意义。

当时俄方的研究者几乎无法运用日文的日俄战争资料，因此斯维钦的这些观点可能会遭到质疑（本书也对他的若干观点提出了异议）。不过，俄国（苏联）人念念不忘其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因此持续思考对日战争的方法，这一点是谁也无法否定的。至于斯维钦自己，他在写出这部作品后再度被逮捕，1938 年被处决。但是他对日军的评价很可能在 1945 年的“第二次日俄战争”时影响了苏军的对日战争准备。这一研究被长期封存，直到 1990 年代初才被重新发掘。

本书是受斯维钦这一研究的触发而写作的。他的著作从军事理论角度出发，对于将日俄战争看作旧时代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

开启了新时代这一看似有理的论点提出了疑问。按照他的观点，俄国革命带来的变化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意义。本书尚未在这一方面展开讨论便即收尾。不过，本书中对斯维钦以客观眼光重新观察历史事件、思考问题与现实联系的态度多有学习。当然，这样的意图究竟实现到了何种程度，唯有交由读者评价。敬待大方指正。

最后，本书写作过程中承蒙中公新书编辑部松室彻先生多方关照，谨此记之。如果没有这样的帮助，本书大约是无法完成的。

目 录

序章 世纪之交的世界·····	1
第一章 世纪之交的日本与俄国·····	11
1 义和团运动与日本·····	11
2 山县有朋的意见书·····	14
3 山县有朋对俄观点的变化·····	15
4 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	18
5 财政大臣维特·····	20
6 中国东北与俄国·····	23
第二章 战争的地理学·····	27
1 “兵要地志”与地图·····	27
2 俄国方面的地志与地图·····	30
3 对铁路的利用·····	33
4 朝鲜半岛·····	37
5 旅顺与海参崴·····	40
第三章 政事与军事·····	43
1 莫理循的报道·····	43

2	关于中国东北问题的拔河比赛	45
3	“满韩交换论”	49
4	日英同盟	51
5	别佐勃拉佐夫	54
6	陆军参谋本部	57
第四章 走向战争之路		61
1	库罗巴特金访日	61
2	旅顺会议	64
3	日本的领导层	66
4	谈判开始	68
5	俄国的回答与日本的反提案	70
6	观点的不同	73
7	安全困境	76
第五章 开战		80
1	奇袭	80
2	俄军的混乱	83
3	爱国心与举国一致	86
4	辽阳之战	89
5	日军的问题	92
第六章 陆与海的纽带		97
1	联合舰队	97

2 波罗的海舰队	100
3 要塞战	103
4 沙河会战	106
5 旅顺的陷落	109
第七章 终局	114
1 两种国际关系	114
2 俄国国内的混乱	117
3 虎头蛇尾的反攻	118
4 奉天会战	120
5 战俘	124
6 日本海海战	126
7 战和之间	130
终章 近的未来与远的未来	133
1 议和条约的缔结	133
2 战争的归结	136
3 何谓日俄战争	140
主要参考文献	143
译后记	149

世纪之交的世界

日俄战争是一场怎样的战争？在日本，诸多研究者长期以来对这场战争的性质众说纷纭，主要有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基本属于赌上日本国家存亡的战争；另一种观点认为本质上是对朝鲜与中国东北支配权的争夺。就结果而言，本书亦与这一争论有关。不过本书的主要目标旨在回答三个问题：战争是如何开始的？新兴国家日本是如何取胜的，大国俄国又是如何败北的？战争产生了怎样的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书籍在论及日俄战争开战原因时，极力指出俄国的南下政策是一大要因。与此相对，苏联时代的俄文书籍则特别强调日本对大陆的扩张意图是开战的原因。既然日俄战争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对其开战主要原因的议论自然免不了染上政治色彩。

同样，要回答为何日本获胜、俄国败北这一问题也并不简单。虽然这在学界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还是需要指出一点：日本参谋本部在编纂战史时，首先撰写草稿，然后删除机密事项再行出版。在草稿审查阶段，因为“恐有减少我军之价值，且妨害将来之教育之故”，军队与个人的“怯懦、失策之类情形”无法光明正大地写出来。也就是说，日本官方对日俄战争的记述是不能照单全

收的。

另外，二战后苏联的历史书籍对于俄国战败的原因，强调沙俄政治体制的脆弱与整个指导层的无能。这样的议论虽然没有明说，但其实是在暗示没有输掉战争的苏联更具有体制上的优越性。不过，貌似优越的苏联体制终究还是崩溃了。于是，俄国方面的议论也需要重新反思。本书将比较日本与俄国的战史，进而参考他国军事史家的分析，对这一点进行讨论。

至于第三个问题即战争的结果，相关议论利用的分析框架各不相同，其重点自然有所变化。换言之，对这一问题，既有在日本或俄国一国框架下立论的，也有在世界史的大框架下立论的。事实上，有不少关于日俄战争的论述是以这些框架书写的。本书固然重视基于这些框架的议论，同时也希望就伴随战争过程的日俄关系这一框架，思考战争的结果意味着什么。

日俄战争究竟是怎样的战争呢？让我们首先从考察这场战争的时代背景开始吧。

十九世纪末的战争

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的十年间，也就是从 1894 年到 1904 年，欧洲列强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欧洲当时最近的战争，是 1870 年爆发的普法战争。

1899 年，根据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提议，在荷兰海牙召开了国际和平会议，试图通过削减军备换来永久的和平。英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德国、法国、比利时等欧洲诸国与日本、中国、美国等非欧洲诸国代表共聚一堂，围绕着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纷争、

陆战与海战的法规展开了讨论。与 1884 ~ 1885 年为瓜分非洲而召开的柏林会议一样，欧洲列强打算以欧洲以外的地区作为交易筹码，避免互相之间的战争。

虽然欧洲列强之间没有战争，但这些国家与非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却频频发生。与“落后野蛮之地”的居民之间进行的小型战争，若从巨额贸易利益与炫耀国威考虑的话，是相当合算的事情。这样的小型战争，能够给原本陷入无序状态的人们带来“文明”，并增加作为“文明”中心的本国的财富。从这种意义上说，这是无可避免的过程。于是，被称为“殖民地战争”的小型战争便接二连三地爆发了。

这种战争最引人注目的舞台，是如同欧洲后院的非洲大陆。著名的例子，可以举出 1895 年至次年发生的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埃塞俄比亚由于得到法国的武器支援而取得了胜利。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历史书，鉴于这一胜利是非白人对白人取得的，便将其与日俄战争联系起来。这种议论是否妥当姑且不论，当时的阿比西尼亚皇帝孟尼利克（Menelek II）利用了接近苏伊士运河的战略优势，以及臣民为基督教徒这一国情，成功地从欧洲诸国买进武器，由此获得了战争的胜利。这样的事实得到铭记是理所当然的。

为阿比西尼亚战胜意大利做出贡献的法国，为了将西非化作自己的殖民地，强迫当地人在“和平或火药”中二者择一，并屡屡动用后者以达目的。当然，那时的非洲人也展示出了旺盛的斗志，萨摩利·杜尔（Samory Toure）在尼日尔河上游流域进行的抵抗战争尤其出名。

德国也对在非洲获得殖民地兴趣强烈。根据德国学者的统计，从 1891 年至 1897 年，德国向非洲派遣了 60 批以上的大规模“惩罚部队”。仅在小小的多哥，1895 ~ 1899 年德国便进行了 17 次镇压行动。

在这些军事行动中，欧洲列强的军队取得了显著的战果。被派遣的部队基本上兵力不多，而且不习惯非洲的地理与气候，但是训练有素的派遣军，有条不紊地碾碎了非洲人的拼死抵抗。为欧洲军队的胜利做出头等贡献的要数武器。譬如欧洲士兵使用的机枪，每分钟发射 660 发子弹。倚仗马克沁机枪或加特林机枪，列强远征军屡屡击败了人数在五倍或十倍以上，但使用着每分钟连一发子弹也打不出的旧式步枪的非洲反抗者。

英国的战争

武器的进步，无疑意味着增加了战争带来的伤害。欧洲列强在非洲大陆上发动的战争中，最激烈的一场是英国与荷兰移民后裔布尔人之间的战争^①。这场战争是围绕着布尔人的国家——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共和国^②发现的钻石矿和金矿的所有权而进行的。

1899 年 10 月战争开始之后，布尔人部队初战告捷，击败了英军。于是，英国被迫立即派出增援部队。结果，到同年 12 月为止兵力为 12 万人的英军，至战争结束时增加至正规军 25 万人、从英国本土出动的志愿军 11 万人、从英帝国其他地区出动的志愿军 3

① 国内一般称为布尔战争。本书所有脚注皆为译者注，以下不再说明。

② 正式名称应为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

万人，以及从南非出动的 5 万人，亦即有超过 44 万人的兵力参加了这场战争。英帝国不得不动用如此庞大的兵力，将他们从遥远的地区送至前线。就这一点而言，这场战争向英国领导层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兵站问题。

另外，布尔人在这场战争中也从欧洲筹措到了武器，因此所用武器的水平与英国并无差别。甚至可以说，在战争初期准备充分的布尔人使用的武器性能甚至略高半筹。譬如，布尔人所用的毛瑟枪，枪口初速比英国士兵使用的来复枪更快，弹道也更平直，比起弹道为山形^①的枪支杀伤力更高。双方也都使用了机枪。

于是，这场战争的死伤者数量是当时非洲战争中最高的。到 1902 年 5 月 31 日缔结和约时为止，英方战死、病死 2.2 万人，负伤 10 万人。至于战败的布尔人一方，死亡人数远高于此，但数目无法确认。据称，战场上死去的士兵有 8000 余人，不包含非洲兵。战争中的实际死亡人数更多，除了士兵以外，被英军关进集中营的妇女、儿童大量死亡。有一种说法称，从 1906 年 6 月至次年 5 月，在集中营里死去的布尔人达到了 27927 人。这个数字是战死者的两倍，相当于两个布尔人国家总人口的 10%。战争打到这个时候，已经不仅仅是军队与军队之间的事情了。

另外，这场战争还加入了一个新的要素，即战争被认为是白人之间的事情。英国也好，布尔人国家也好，对于让非洲黑人在本国军队中当兵都有所踌躇。英国殖民大臣金伯利（Joseph Chamberlain）表示，不让非洲黑人当兵是鉴于“南非的特殊情

① 指弹道曲度较大。

况”，不希望黑人拿起武器。不消说，如果让布尔人这样的白人被非洲黑人使用对等的武器杀死，就会让支撑非洲大陆殖民地政策的人种论思想有遭到破坏的危险。

抱有这种危机感的不只是英方领导层，布尔人方面也反对让非洲黑人加入战争。由于英方打破了不让非洲黑人当兵的默契，布尔人因此公开指责英方，这可谓人种论思想渗入骨髓的表现。但是由于战局严峻，双方最终都让许多非洲黑人拿起了武器，使这场战争成为即将来临的白人与非白人作为士兵对等作战时代的先声。

美国的战争

尽管在地理上不属于欧洲，但与欧洲列强并驾齐驱的美国，与这一时期的小型战争也不是没有关系的。美国在 1898 年因古巴与西班牙进行了战争，在海战中完胜西班牙舰队。同年底签订的巴黎和平条约中，西班牙承认古巴独立，并割让菲律宾、关岛等地给美国。古巴从此实际上被美国纳入其保护之下。

美国的战争没有就此告终。为了镇压反对势力，美国在巴黎会议^①之前就向菲律宾派出了部队。当然，对于不承认独立的美国来说，这不是“战争”，而是镇压“叛乱”的警察行动。但是，菲律宾方面的领导人阿奎那多（Emilio Aguinaldo）决心运用地利开展游击战，令警察行动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战争。被派往菲律宾的美军最多时达到 1 万人，与菲律宾合计 10 万人的正规军、非正规军作战。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从 1899 年 11 月至菲律宾独立运动首谋

^① 即美西两国代表于 1898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10 日在巴黎进行的议和谈判。

者被逮捕^①的1902年春，美军死亡4000余人，菲方死亡2万余人。

在此期间，苦于游击战的美军故意让菲律宾的非战斗人员卷入军事作战行动之中，借此烧毁村庄和农田，不时扣押平民作为人质，挫伤了游击队的战斗意志。据说这是因为菲军的领导者警告岛民，将对里通美军者加以惩罚，于是美军便将居民与战斗人员不加区别地都视为敌人。

美军指挥官雅各布·史密斯（Jacob Hurd Smith）^②在这一点上做得尤为彻底。他对部下反复说：“我不想要俘虏。我希望你们尽量杀和烧，最好杀光拿着武器抵抗美国的人。”在他担任司令官的1901年10月至次年2月间，美军破坏了数千座房屋，将数吨粮食化为灰烬，杀掉数百头牲畜。这样的言行自然在美军中惹起非议，战后他被送上军事法庭。

当然，这样的司令官并不是个例，相似的情况也在其他的指挥官身上发生过。譬如，詹姆斯·贝尔（James Bell）这名指挥官曾下令逮捕涉嫌以任何形式援助叛乱者的人。他命令将居民迁往城市，没收各地的粮食，进而逮捕或杀害在这些地区发现的人。这种指挥官的人种观，为当时的美军士兵所共有。在写给家乡亲人的信中，他们反复提到菲律宾人“知识与文化的落后”。

战争在任何时代都会带来新情况。可以说，没有哪场战争在结束前未能引起武器、战术、思想方面的革新。如此观之，通过机枪

① 似指菲律宾第一共和国总统阿奎那多于1901年3月23日被美军俘虏。

② 时为美国陆军准将，菲律宾独立战争期间在萨马岛下令滥杀平民，战后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以战争罪被起诉的美军将领，并被军事法庭裁决有罪，以强制退役告终。

等杀伤力强大的武器，通过游击战，通过旨在对抗游击战的将非战斗人员卷入的战术，以及通过不能忘记的一点：全球规模的人种歧视及使之强化的弱肉强食式的“适者生存”思想，19 世纪末的战争显示出了新的样貌。

义和团运动

19 世纪末，欧洲列强与中国之间也发生了战争。论其远因，不消说在于甲午战争暴露的清朝的衰弱。国力的衰退，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都十分明显。从 1898 年左右开始，在山东贫苦民众中间发展的义和团运动，成为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的直接原因。他们自称义和团，认定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欧文明的扩大，是民众生活苦难的根源。

恰在此时，清朝上层的权力斗争使得失败的开明派遭到驱除。于是，义和团在山东、直隶（今河北）、河南等省迅速发展。到了 1900 年初，他们进入北京周边。义和团尽管在其发展之初对清政府表示出强烈的反感，但到了 1900 年转而接近清政府，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因而，清政府内部也展开了究竟应当视其为“匪贼”还是“义贼”^① 的争论，而后者占了上风。

与此同时，无意严格督管义和团的清政府与各国之间的矛盾加深了。1900 年 5 月底，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派出少数部队在天津登陆。

其后，随着义和团包围外国使馆区，杀害德国公使，清政府向

^① 原文如此，似为“义民”之误。

各国宣战，事态急转直下。这一过程中，大沽、天津、北京等地的义和团与清军联合，与列强军队反复交战。伴随着清朝内部的动摇，义和团与清军的关系也在变化，令事态趋于复杂。至迟在清政府宣战的6月21日，清军与列强军队之间的战争开始。也有研究者认为6月17日的大沽炮台攻防战标志着战争的开始，这一说法或许更接近实情。

战争的规模在不同阶段有所差异。列强以英国的西摩尔（Edward H. Seymour）中将为司令官，从天津向北京派出了2000人的救援部队，而阻击他们的是义和团与超过1万人的清军。清军也拥有马克沁机枪与克虏伯大炮这样的武器，其实力不是列强能轻易打垮的。而且，拥有旺盛斗志的义和团也增加了清军的勇气。结果，西摩尔的军队在一周内死伤10%。

据一名与西摩尔同行的英国军官回忆：“说起抵抗的情况，（6月）20日前进了9英里，21日4英里，22日1英里，这样的事实是很好的证明。由于清军的抵抗，我方的伤亡在持续增加。”清军与义和团方面充分认识到了从天津通往北京铁路的战略价值，对其进行破坏。因此，列强派遣军未能抵达北京，一度不得不退回天津。

天津的战斗是这场战争中最为激烈的。在这里，从6月中旬开始的四周内，1.4万余人的列强军队与数万人的清军及义和团反复攻防。清军的某些部队，如曾参加甲午战争的聂士成所部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因此，仅7月13~14日对天津城的攻击中，参战的日、美、法、英四国军队便付出了700余人伤亡的代价。

但是，清军和义和团虽然顽强抵抗，但实力终究不敌列强派遣

军。结果，北京在 8 月中旬被 1.8 万余人的八国联军攻占。截至当时，向清朝派遣军队（即使为数不多）的国家有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德国、日本和俄国。攻占北京后，这些国家的军队继续追击义和团。在八国联军的追击下，义和团成员大多逃入村庄，不时进行游击战，因此多有平民遭到波及。

世纪之交的日本与俄国

1 义和团运动与日本

义和团运动对日本来说是一次大的考验。在清朝开始发生动乱之时，日本领导人所面临的课题不只是保护本国侨民。由于清朝的进一步衰弱，东亚局势的动荡，期待与不安都随之而生。当时对此抱有期待的是陆军大臣桂太郎。所谓期待，即日本通过与欧美诸国共同派兵，进入头等国家的行列。

另外，元老伊藤博文表现出了不安。之所以不安，是由于他认为在东亚局势的走向尚不明朗之时派兵消耗国力是无谋之举。甲午战争时，伊藤博文身为首相，与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一同尝到了三国干涉还辽的苦果。鉴于这样的教训，伊藤博文首先警惕地紧盯欧美诸国的动向，优先考虑充实本国国力。

当然，欧美诸国之中也混杂着期待和不安。期待是因为可以进一步扩充在清朝获得的利权，不安是因为唯恐在争夺利权的竞争中落后。于是，欧美诸国虽然在可能的范围内采取了一致行动，但也相互猜忌。因此，这些国家的行动往往缺乏协调。这种情形也让日本领导人疑惧。

而对于英国来说，由于忙于应付前面提到的布尔战争，此时无

力起到领导作用，这从一开始便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是一个比较容易利用的新兴国家。而且，为了应对这样紧急的情况，也只能依赖与中国邻近的日本了。于是，英国代理驻日公使 1900 年 6 月 23 日请求日本出兵。

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已任命福岛安正少将为司令官，向大沽派出了以两个步兵大队为基干的混成部队。接到英国的请求后，日本政府认定有必要进一步增派部队。于是，7 月 6 日决定动员第五师团。既然派遣大军是应英国的请求，那么伊藤博文也就难以反对了。俄国亦于 7 月中旬表示不反对日本出兵。结果，到 7 月中旬派遣该师团时为止，日本成为列强当中派兵最多的国家，兵力达到 2.2 万余人。（在主要战斗完结的入秋以后，日本的这一地位被德国取代。当年秋天，德军的残暴行为在列强间引发了非议。）

除了派遣兵力的数量之外，日本士兵的作战表现也引起了欧美的关注。关于这一点，日本驻天津领事 7 月 10 日有这样的报告：“当日（9 日）之战斗，我陆海军派遣队几乎全部出动。除英国兵约九百，美国兵百余名外，全系我军，其数一千四百余名，可谓独占鳌头。此支大部队之兵员人人勇壮，各国人皆感叹，英国兵尤以非常之厚意待之。”

在这场战争中，列强军队的掠夺、对中国人的暴行屡见不鲜。这样的行径太过旁若无人，而日本兵的军纪据称相对好些。在这个意义上，日军也是引人注目的存在。

当然，日军的作战在列强中间并非只引起了好意。譬如，两天后的 12 日出版的《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封来信，认为尽情赞扬日本对北京救援做出的贡献是危险的，原因在于这最终会怂恿亚洲人

梦想着将白人逐出亚洲。根据来信者外交官米特福德（Algernon Bertram Freeman-Mitford）的意见，如果英国指望将来的和平，就应该将中国北方的改革委托给俄国。这是因为俄国不是侵略国，即使是侵略国，也和仅在中国南方拥有利益的英国没有关系。因此，英国没有理由招惹俄国的猜疑。

对于日本政府来说，问题不仅仅是英国有影响力的报纸《泰晤士报》刊登了这样的来信，还在于报纸介绍这名来信者是亚洲问题专家，而且基本认可他的观点。报告英国舆论这一动向的日本驻法公使栗野慎一郎，还报告法国报纸上同样也对将来的日本表示警惕，由此提请注意“黄祸论”在欧洲的泛滥。

栗野之后的报告，显示出他虽然对“黄祸论”的危险性反应强烈，但与人种歧视的观念并非绝缘。时至9月，栗野向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告知法国舆论有所变化，出现了对日本表示好意的论说，但接下来如此写道：

（法国有影响力的政治家阿诺托^①）称赞日本人不似中国人，有坚持不变之可信品质。上述良好转变并非由于何人之努力，全因日本国所保持之公平无私态度，加之我军值得褒奖之勇猛刚毅表现，尤其令法国公众感到我国之行动并不依赖英国势力。若我国无显著之变故，以上述状态善始善终，则我国可在文明列国中博得高度之信任与尊敬。

^① Albert Auguste Gabriel Hanotaux，法国政治家、历史学者，曾任外交部长。

栗野慎一郎认为，欧美人已经认定日本人与中国人有异，由此开启了成为“文明国”一员的道路。这种对中国人的优越感与对欧洲列强的劣等感结合，不止在栗野一人身上见到，而是存在于当时日本人中间的普遍现象。

2 山县有朋的意见书

正在外界对日本士兵的行为议论之时，首相山县有朋在 1901 年 8 月 20 日起草了一份意见书——《关于北清事变^①善后之意见书》。据称这是为了统一内阁意见而撰写的。攻占北京之后，以山县为首的日本领导层将目光转向了战后处理。伊藤博文主张让日军率先撤退，并向其他列强提议撤军。他之所以如此主张，是为了表示日本对中国没有特别的野心。

山县有朋的考量与伊藤博文大异其趣。在该意见书中，山县认为清朝气数已尽。而他也指出列强目前希望维持清朝统治，由清朝的新领导层贯彻联军方面的要求：处罚“乱徒”、赔偿及其他举措。因此，即使日本趁此机会得以在中国驻扎全部军队，这样的行动也只会招致“各国之猜疑”，因此不如留下若干部队，撤退主力，以便随机应变。

该意见书接下来的议论，是山县有朋已经表明的观点，即首先注重俄国，在考虑对俄政策的形式下触及朝鲜半岛问题。在山县看来，“乘此良机，占领朝鲜，以御俄之南下于未然”这一意见是不

① 中国称“庚子事变”。

容置疑的。但是，朝鲜半岛问题与义和团运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即使在讨论善后之时提出这样的“局外事项”，也不会轻易获得列强的同意，在这一方向上是难以取得成果的。

关于这一点，山县有朋还提到了以承认俄国“满洲经营”为代价，使之承认日本“朝鲜经营”的日俄协定方案。但这一方案的问题在于难以信任“狡猾”的俄国。在山县看来，俄国言行不一，“独占大利之野心”昭然若揭。因此，他稍退一步说，即使在这一方向上取得满意的进展，在“北清之祸乱未治，满洲之处置未议”的情况下，恐怕也无法与俄国就这样的方案交换意见。

结果，在这一节点，山县有朋支持了旨在向南方即台湾对岸而非北方扩张的“北守南进论”。从上文引用的内容来看，他的“北守南进论”与为了向南扩张而和北方的俄国缔结某种协定的设想并不一定重合。他脑中的想法恐怕是：虽然将来是否会与俄国开战尚不明朗，但为了做好准备，首先应当在南方培植日本的势力。因此，他在意见书中总结道：“欲将朝鲜收为我之势力区域，不可不先立对俄开战之决心。唯以此之决心，方能达到全北方经营之目的。”在这里，看不到多少与俄国缔结协定的意愿。他与伊藤博文之间对俄的观点差异已经十分明显了。

3 山县有朋对俄观点的变化

上述意见书所展示的山县有朋的对俄观点，归根结底是对俄国为寻求不冻港而南下的所谓“南下论”的危机感与对俄国外交的不信任感所构成的。关于前者的议论，山县已经在1871年的《军

备意见书》中表露一二。至于更加明晰的观点，可以在 1888 年其撰写的《军事意见书》中得到确认。在这篇意见书中，山县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俄国一旦开始修建西伯利亚铁路，鉴于海参崴冬季不能使用，便会寻求其他的良港，随之而来的动向大概就是侵略朝鲜半岛。

相对而言，俄国是执行狡诈外交的国家这一认识，在山县有朋身上并没有很早体现出来。譬如，在甲午战争的前一年即 1893 年，山县在其起草的《军备意见书》中写道：“俄国以侵略为其对外政策，彼若有隙，我当立即乘之，今日各国政治家有目共睹。”虽然如此，在这里也看不到他将俄国看作格外不值得相信的国家的认识。在当时，山县只将俄国与其他欧洲列强视为同等程度的威胁。

山县有朋的对俄观点在 1895 年 4 月，即三国干涉前夕明晰地展示了出来。当时他写信给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设想了俄国与英国的共同干涉，并提议选择俄国而非英国作为日本的同盟国。显而易见，山县日俄同盟论的背后，是将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列强同样视为威胁的国际政治观。

这样的认识，在他 1896 年 5 月的行动中表现了出来。当时山县有朋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前往俄国。6 月 9 日，在西德二郎公使的帮助下，“山县 - 罗拔诺夫协定”签订。这一协定的公开条款规定对朝鲜进行财政援助，但其秘密条款规定，在朝鲜出现动乱的情况下，日俄两国将同时派遣军队，届时为了避免发生日俄冲突，应设置缓冲地带。山县显然认为，日本与俄国缔结这样的秘密协定能够互相确保利益。

综上所述，山县有朋认为俄国是特别危险的狡诈国家，当在

1896年之后。此后发生了什么呢？可以举出几个事件。

第一个事件，是在山县有朋与俄方签订协定一周前的6月3日发生的。当日，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R. Lobanov）和财政大臣维特（Sergei Witte）与清政府全权代表李鸿章缔结了秘密军事协定。其中规定，在日本进攻俄国或中国领土时相互予以军事援助。为了让俄国能够援助中国，该协定还给予了俄国修建纵贯黑龙江与吉林、通向海参崴的铁路权利，即“中东铁路”。这一反日协定的存在，几个月后被外国报纸曝光，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但实际确认它的存在是在日俄战争后不久。由于反日协定的传言，山县大概会把俄国看作无法与之缔结协定的国家。

第二个事件，是俄国于1898年3月强行从中国取得旅顺与大连各25年的租借权，以及从中东铁路的一站延伸开来的新铁路（所谓南部支线）的修筑权。1897年，德国以传教士被杀事件为借口占领胶州湾，俄国的行动是由此触发的。同时，法国与英国分别从中国取得了广州湾和威海卫的租借权。从这一意义上讲，俄国的行动并不特别。但是俄国的行动确实是不能与英法等国等量齐观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俄国在三国干涉时以保护中国领土为名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还给中国，而在不到五年之后又将辽东半岛上的旅顺与大连置于自己控制之下。日本人对俄国的行动感到愤怒是很正常的，山县有朋大概也是其中一人。

第三个事件，是俄国从1897年左右开始试图购买朝鲜半岛南部沿海的土地。此举是对日本方面同样举动的对抗，被认为是旨在让俄国海军得以利用朝鲜土地作为锚地。尤其是在1899年5月，俄国在这些港口中的马山浦进行测量活动，掀起了很大的风波。

早就对俄国的南下政策抱有危机感的山县有朋，是不会对此无动于衷的。他在 1899 年 10 月撰写的《对韩政策意见书》中如此写道：

俄国自占领大连、旅顺之要冲以来，战略上犹有进取，以在朝鲜东南沿岸占领一军舰锚地为唯一方针，以迫彼之政府，以借用土地之名实行其目的为第一政略。我之对应政略，不可不讲求陆海军之兵力与财政之实力，定将来之方针。

山县有朋如此下笔，表明了他迫切的危机感。当时他的结论是，在俄国“企图占领或借用朝鲜之马山浦、巨济岛，胁迫朝鲜政府或采取其他手段实行其目的”的情况下，应当劝其罢手。如果无功而返，则应作为“关系帝国存亡兴废之重要问题”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对策。

的确，山县有朋此时还认为日本有可能令俄国在这一问题上让步，避免了“战争”的字眼。但是，上述引文也显示他对俄国强烈的疑惧萦绕于心。1900 年夏天，他在意见书中表露的对俄观点，可以放在以上认识变化的延长线上来看待。义和团运动中俄国的反应，促进了这一变化。

4 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

另外，有一点需要确认，那就是前文所述山县有朋对马山浦问题的反应。1900 年俄国与朝鲜政府间缔结的关于马山浦的协定，

实际上只允许俄国建设煤库和医院，没有带有实战意味的设施。俄国在该地购买土地动作迟缓，反而被日本占了先机。

结果，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夕的1904年2月6日，日本舰队若无其事地驶入了马山浦。如果俄国考虑到对日开战之际的战略重要性，在购买土地与建设锚地上多下点功夫的话，日俄战争的经过大概会变得大不相同。当时的俄国，有些事情是山县有朋所不理解的。从这一点来看，有必要从俄国的东亚政策出发，追溯一下俄国的行动。

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计划是1882年由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决定的，但计划实际开始施行是在九年后的1891年。超乎预料的庞大建设经费，妨碍了这一雄心计划的实现。

西伯利亚铁路实际建设始于1890年代初的这一事实表明，在俄国开始建设该铁路的时候，日本和这一计划还没有什么关系。当时的日本还不是国际意义上的强国。俄国领导层最初筹划修建铁路时，最主要的目标是改善俄国欧洲部分人口过密的问题。

但是，在此之外又逐渐增加了对抗英、德两国在华势力扩张的目的。对19世纪末的俄国领导者来说，这两国的动向是最大的问题。尤其是英国在中国获得的铁路利权，威胁到了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流域的俄国部分。有俄国人担忧，海洋国家英国有与中国联手袭击俄国脆弱地区的可能。

此外，在19世纪末，在中国东北居住的中国人数量剧增，这也引起了俄方的警惕。1888年，中国东北地区的人口数已经达到1200万人。与之相对，俄国远东地区的人口数不过7.3万人而已。这样的人口落差被俄国政府认为是一大问题。这样一来，铁路的修

建也就有了对抗中国人口的压力，以及强化俄国亚洲地区防卫力量的考量。

在以上种种议论之下，全长 8000 千米的西伯利亚铁路开工建设。1891 年 5 月底，铁路从最东端的海参崴开始动工修建。这座城市当时建城尚不满 30 年。安放建设基石的，是正在东亚游历的俄国皇太子。两周前的 5 月 11 日，他在滋贺县大津遭到津田三藏^①的袭击而负伤，震惊全日本。日俄战争时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正是此人。

当时，亚历山大三世不得不让皇太子与铁路建设事业联系起来，以保证工程的实施。这是因为建设成本导致国内对此产生强烈的抗拒。虽然在过去十年间俄国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但其经济实力仍然无法与西欧各国比拟。以这一时期俄国的财政状况，要修建西伯利亚铁路就必须长期搁置国内其他迫切需要的事业，实为一大冒险。

5 财政大臣维特

1892 年 9 月，亚历山大三世锐意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姿态，通过一项人事异动再度显示出来。因重视财政均衡而对铁路建设面露难色的财政大臣维什涅格拉德斯基（Vyshnegradsky）被撤换，继任的是曾任财政部铁路局局长，半年前才被任命为交通大臣，与铁

^① 时为滋贺县警察，尼古拉皇太子来访时担任警卫任务。因不满俄国强硬的对日态度，他用佩刀砍伤尼古拉头部，之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同年因急性肺炎死于狱中。

路建设关系甚大的维特。维特是一名主张以铁路建设迅速达成工业化，从而令俄国在既有专制体制下成为强大国家的政治家。因此，财政大臣的任命令他狂喜不已。在此之后，他以旺盛的精力粉碎了反对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势力。

为了促进（建设）西伯利亚铁路的事业，我就任财政大臣之后，立即决心设立西伯利亚铁路特别委员会。这一委员会旨在避免大臣会议或国务会议中大臣之间的纷争产生出的各种扯皮或困难。委员会不仅拥有铁路建设相关问题的权限，还被赋予了关于铁路建设的立法权限。

上引维特回忆录中的这一段显示，即使得到了沙皇支持，这样成本巨大的事业仍然遭到强力抵制。最大的反对来自地主贵族。他们认为，一旦铁路使移民简单易行，俄国欧洲部分的地价就会下跌。这样的意见也在西伯利亚铁路特别委员会开会时被提出，但是维特时而运用舌辩，时而削减经费，令铁路建设得以推进。

正在维特全力推进西伯利亚铁路建设之时，甲午战争爆发了。几乎没有俄国人预料到日本的胜利。在1895年的马关议和中，日方割取辽东半岛的要求同样让俄国人始料未及。是否承认日本割取辽东半岛这一问题，被认为是要在日本和中国之间选择一个将来的伙伴。

如果看到中国在战争中暴露出的虚弱，那么俄国可以乘此之机从中国获得不冻港。作为远东的军港，海参崴冬季封冻，有很大的缺陷。这一选择也意味着俄国有望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

另一种观点则重视日本的强大。如果让日本获得辽东半岛，可能将开启日本向中国东北与蒙古的扩张，进而使其拥有足以威胁俄国的势力。如果与各国一同发动干涉，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应当会让俄国得到中国的高度评价。对于希望修建联通两国国境铁路的俄国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机会。

不用说，强烈拥护后一种意见的是维特。但是，即位未久的尼古拉二世则倾向于前者。不过，尼古拉二世没能压倒维特的力量。结果，俄国采取了维特的政策，与德国、法国联手向日本施加压力，令其将辽东半岛还给中国。

尽管维特的对清友好政策招致了日本的愤怒，但也很快收到了回报。前文已述，俄国于 1896 年通过秘密协定获得了修筑横贯中国东北铁路的权利。由此，联结俄国欧洲部分与海参崴铁路的建设距离大大缩短。鉴于当时在黑龙江沿岸修筑铁路存在技术上的困难，这一利权的获得对该铁路的建设是一大促进。

但是，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大问题。如前所述，俄国难以抑制进一步在东北扩张权益的欲望。但是俄国进行过度的扩张，那并非维特之愿，他强烈反对俄国获得更多的利权。他在 1897 年 11 月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提出，维持中国现状和对华友好关系对俄国来说是上佳的策略。在座的海军将领也指出旅顺作为海军基地存在布局上的问题。然而，尼古拉二世得到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Nikolay Muravyov）的支持，拒绝了维特的忠告。穆拉维约夫不仅拥护尼古拉二世向东方扩张的政策，而且对总是表现得自信满满的维特心怀反感，他提出了获取旅顺的方案。于是，俄国 1898 年获得了包括

旅顺与大连在内的“关东省”^①的租借权和南部支线的修筑权。

总之，通过这一权利的获得，俄国增加了它的影响力，而代价则是增强了日本人对俄国的疑惧。更大的代价，则是让三国干涉以来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急速冷却。

而且，俄国从此开始不得不从紧缺的财政资金中挤出大笔资金投入中东铁路和旅顺军港的建设。这正是俄国无法在朝鲜半岛强化既有地位的主因。1900年10月驻朝公使巴布罗福（Aleksandr Pavlov）送交外交部首脑的报告书显示，俄国的实情与山县有朋的担忧大相径庭。巴布罗福当时向高层提议，签订强化日俄共同支配朝鲜的协定。他的这一考量在当年7月放上了台面。巴布罗福认为，无力割取朝鲜半岛的俄国，只有通过这样的协定才能抑制日本对它的独自支配。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俄国完全腾不出手来经营在朝鲜的对日战略。

综上所述，由于在国内引起了激烈的意见对立，19世纪末俄国的东亚政策无法追求其一贯目的。尽管如此，它所获得的成果让外界对其狡猾的外交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国内意见存在分裂，但就结果而言，取得的成果仍是非常丰硕的。通过对义和团运动的介入，俄国又进一步增强了各国的疑惧。

6 中国东北与俄国

与山东半岛不同，与俄国接壤的地区到1900年6月为止并没

^① 俄国1899年在旅大租借地建立的行政区。

有出现与义和团运动相关的动乱。但是，一向因修建中东铁路而对俄国人心怀不满的当地居民，从6月底开始要求破坏修建中的铁路，并赶走俄国人。这样的行动中也有清军加入，据说来自清朝中央或省级领导者的指示。

俄国为了建设铁路与城市，向中国东北输送了6万余人，因此对动乱的扩大极度敏感。而且，俄方也自负地认为中国在军事上根本不是对手，东北的破坏行动使其大为焦躁。要求立即出兵保护中国东北的俄国人与建设中的设施和铁路的论调高涨起来。也有人认为，同样应当对北京和天津采取行动，武力镇压“暴徒”。诸多意见之中，也有主张俄国应当趁乱掌控中国东北的声音。

正在局势紧张之时，7月15日，黑龙江上的俄国汽船突然遭到清军的炮击，河畔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也遭到来自对岸中国领土的炮击。俄国马上开始反击，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黑龙江沿岸杀害了大批中国人。之后，俄军的作战行动迅速扩大，8月底占领齐齐哈尔，9月下旬控制了东北中部的大多数城市。9月20日，清政府请求由李鸿章会见俄军总司令阿列克谢耶夫（Yevgeni Alekseyev），并请求俄方停止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但结果却是奉天（沈阳）于10月初被俄军占领。

结果，俄国以外的列强不得不考虑，在为义和团运动善后而与中国进行的交涉中，俄国能获得什么程度的特殊地位。俄方主张，俄国与中国有很长的边境，而且在东北有进行大规模建设的权利，因此应当得到特别的待遇。但是，关于这种特别对待的内容，俄国国内的意见并不一致。

当时俄国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马尔顿斯（Fyodor F. Martens）提

出，由于俄国的占领是基于中方的攻击，没有理由中止占领。这种意见意味着获得中国东北，因此得到了参加行动的军方高层的支持。另外，维特向尼古拉二世提议不要索取领土作为补偿。结果，俄国的领导层定下了折中的基本政策，承认东北是中国的领土，但为了平息动乱、继续修建铁路而令俄军留驻以确保治安。结果，中国东北维持现状，事实上处于俄国的控制之下，反过来也留下了恢复清政府权限的可能性。

但是俄国当权者尚不清楚这一方针怎样才能实现。于是，在中国东北指挥派遣军的阿列克谢耶夫为了将俄军驻扎的权利明确化，强行逼迫当地的清朝官员签署协定。最终，他在11月底与奉天将军增祺签订了确定俄军驻扎权的协定。按照俄方的理解，这只不过是当地的暂行协定。

俄国对东北的出兵及其后续事态，不仅刺激了日本，也令英国和德国为之不安。这是因为，欧洲各国将俄国获得中国东北理解为瓜分中国的开始。于是，英国和德国于10月16日缔结了“长江协定”。^① 这一协定除了有反对俄国扩张领土的目的之外，还有着英、德互相阻止对方对俄接近的消极目的。两国在缔结协定的过程中互相窥知了对方的态度。

在日本领导层当中，把该事态当作关于瓜分中国的问题，进而作为国家安全的问题来对待。日本虽然一度对“长江协定”有所期待，但最终还是认为那是幻想，该协定只不过显示了俄国在中国

^① 该协定是英德两国通过互换照会缔结的，无正式名称，通称为“长江协定”（Yangtze Agreement）。日本、奥匈帝国、意大利三国之后表示完全承认这一协定，美、俄、法三国则表示有保留地承认。

东北的行动引起了国际批判而已。这样的外界态度，虽然能够被维特和俄国外交部高层理解，但对于率领驻华俄军的将领来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义。在他们看来，留驻中国东北是出于自卫的正常举措，想不到这样的行动会被日本领导层当作关乎国家存亡的问题。

于是，在 1900 年底这一节点，日本与俄国的领导层对于东亚的变化有着相当不同的认识。日本领导层以山县有朋为中心，开始在脑海中描绘日俄战争这一最坏的剧本。而在俄国方面，则认为东亚事态正在以对本国有利的形式走向稳定。尼古拉二世 9 月底移居温暖的克里米亚，在那里偶尔把大臣叫来办公，过起了相当悠闲的日子。

1 “兵要地志”与地图

林权助作为日本驻朝公使，在明治后期的大约七年间表现突出。他在其回忆录《林权助述 谈我的七十年》（1935）中写下了一段饶有趣味的話。在他被任命为驻朝公使的1899年，陆军的田村怡与造、福岛安正和长冈外史三人为他举办赴朝欢送会，在席上出示了朝鲜半岛的地图。这三人都是当时正在准备对俄作战的参谋本部的高级军官。^①

田村指着镇海湾^②的地点对林说道：“如果这里被俄国拿到，将来日本可就糟糕了。你去当公使以后，我们要拜托你多多留意这个事情。”林权助补充说明，他们秘密制作的地图“尽管是手绘图，但是一目了然，十分详细，连小地方的地名也写了上去，感觉很妥帖”。

① 田村怡与造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福岛安正时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长冈外史时任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

② 朝鲜南部海湾，日俄战争期间曾被用作日本联合舰队锚地，其北岸城市镇海在日本吞并朝鲜后成为日本海军在朝鲜最主要的军港，今日是韩国第一大海军基地。

这样的会面，应当是确实存在的。在军部之中，由对俄作战的意识引发的行动已经相当广泛。但是，陆军的参谋果真曾在 1899 年利用这样的“手绘图”发表过议论吗？这一点是很成问题的。已然经历过甲午战争的日军，理应准备了朝鲜半岛的地图，尤其应当熟悉半岛南部。

对于战争来说，描绘战场地形的地图是不可或缺的，明治时期日本的领导者相当了解这一点。他们以陆军参谋本部为基础创设组织，收集近邻诸国的情报，制作国内外的地图，并且编纂了被称为“兵要地志”的书籍。这是一种汇总了地理、气候、人口、物产、风俗、政体、宗教、岁出岁入和交通手段等与战争相关的各个方面的百科全书式书籍。关于中国的《支那地志》的最早几卷刊行于 1887 年；关于朝鲜半岛的《朝鲜地志略》刊行于 1888 年；作为《支那地志》的一部分，关于中国东北的《满洲地志》刊行于 1889 年。关于俄国的《西伯利亚地志》则刊行于 1893 年，该书是日本俄国地志研究的嚆矢。

这些著作主要的情报来源是外国出版的地理书籍与军事间谍收集的情报。在后一方面，这种间谍的派遣在 1870 年代末至 1880 年代初形成了制度。对于当时受日本特别关注的中国，每年有 10 名左右的军官被派往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等地，广泛收集当地情报。

这种间谍活动中一个尤为著名的人物，是林权助回忆录中提到的福岛安正。他在担任驻北京公使馆武官时获得了中国的军事机密情报，还通过西伯利亚单骑旅行与中亚探险收集了当时俄国对亚洲扩张的情报。对于未知土地的纯粹好奇心和日本的军事需求驱使了

他的行动。

接下来再看地图。它的绘制是与上述地志的编纂并行的。但是，地图并非仅凭踏行道路、确认山川的形状就可以制成。甲午战争的爆发使得地图测量方式由依靠“步数”变为运用器材。出于这一目的，参谋本部于1894年12月组建了临时测图部，该部于次年开入战场。1922年出版的《陆地测量部沿革志》展示了它的一部分活动。该书记载，陆地测量部在甲午战争期间制图1710张，制版2034块。“前述地图主要为邻邦二十万分之一图（朝鲜及中国）、奉天直隶两省三十万分之一图、其他各局部地图、临时^①东亚舆地图等。”

另外，根据陆军参谋本部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编纂的《外邦测量沿革史》，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元山附近派遣了第一班测量人员，汉城附近派遣了第二班，平壤附近派遣了第三班，大邱附近派遣了第四班。军方高层向他们训令：“鉴于无法公开，作业应极度秘密。对于班外者，无论本国人或外国人，一概不得泄露。”

由于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作业，制成的地图日后遭到了诸多批评。对此，《陆地测量部沿革志》中有如下解释：“于此急遽之际，就散漫零碎之资料，比较校定同地异称、同韵异字，参酌为数甚少之已知经纬度以作地图之骨骼，且须依据诸般地志、旅行记等稽地形、补地物，以辑成外邦未开地之地图，其困难实超乎意料。”

这一时期测图的问题在于不得不在民间寻求测量员，制图技术

① 日文原文为“假製”，“假”有临时之意。“临时地形图”又称“迅速地形图”，指运用平板测量法绘制的地图，精度不如运用三角测量法绘制的“正式地形图”。

尚未纯熟。另一大缺陷是作业之时不能使用国内测量时的器械，只能用轻便的便携测板来进行。

无论如何，参谋本部一直强烈希望制作近邻诸国的精确地图。该部虽然于 1896 年让临时测图部解散回国，但没有忘记在朝鲜半岛留下人手，刚刚开始测图工作仍在继续。其结果是在 1898 年完成了平壤周边的测图。但是，当时还无法在朝鲜半岛北部完全展开这一活动，于是参谋本部在日俄开战前的 1903 年采取了在平安道、黄海道进行测图的措施，进而在日俄开战已迫在眉睫的 11 月突然下达“在朝鲜安州、楚山、宁边及鸭绿江沿岸测图”的命令。当时派遣的 40 名测量员“踏冰雪，斗朔风，以约三十日”，终于完成了测图。

同样，日本在中国的测图开始于甲午战争时期。当时不只台湾，辽东半岛乃至北方的地图都在持续制作中。《外邦测量沿革史》记载：“明治二十七八年的测图地区北至法库门、康平，西至新民屯，北至白头山下。旅顺、金州五十万分之一，辽东一万分之一，金州附近、得利寺、大石桥、营口、辽阳附近、奉天及台湾要地二万分之一，城堡图特以大比例尺施行。大半为修正俄国地图及二十七八年之既有地图。”由此可知，日方在日俄战争前准备了大量战场地图。但实际上，其中大部分地图由于前文所述的原因相当不准确，在军队中造成了混乱。

2 俄国方面的地志与地图

不用说，俄国方面也在极力积累关于未来战场的地理情报。这

一事实可以通过日方史料得到确认。譬如，《外邦测量沿革史》收录了在元山活动的临时测量部班长玉井清水大尉于1895年12月提交给参谋本部测量部的《关于俄国测量队到达元山之报告》。这一报告开头写道：“俄国军官一行本月一日自平壤过马息岭抵达元山。”玉井大尉接下来逐条记录，俄国测量队向居民询问山岭、村庄、土地之名，画“示意图于手册之上”；五个月前从双子城出发，南下咸镜道至吉州，入平安道，经平壤抵达元山；但其测绘的地图未能得见。

这一报告中还记录了不少玉井清水自己的感想，诸如“兵卒服装及装具污秽破烂，状如远征，然刀枪毫无锈蚀，惟有感服而已”，“兵卒敬礼端正，尊敬长官，且丝毫不现疲劳之态，实不得不曰敬服”云云，显示出日俄两国的测量专家见面时是以礼相接的。

另外，玉井大尉记载中的“哥萨克骑兵第十三团罗宾茨索夫上尉以下少尉一名、士兵四名、韩人翻译一名”，其实应该是俄文史料中的“鲁宾佐夫上尉”一行。这一时期，俄方由于“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与日本关系紧张，因此屡次向东北和朝鲜半岛派遣这样的测量队。派往朝鲜半岛的侦察队中取得最大成果的，是19世纪末被派往该地的科尔夫少校与泽维金兹夫骑兵上尉一行。

科尔夫等人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夕出版的《朝鲜北部军事要览》一书，是展示这一时期俄方朝鲜国情研究的最高水平著作。该书将朝鲜北部的历史、地理、居民、经济、交通和周边海域等地方概况分门别类，是真正的俄国版兵要地志。为展示其一斑，兹将具有代表性的部分译出：

妨碍行军的因素在于难以把握位置。地貌非常相似，视线极度受限，即使从山口看也是如此。寻找可靠的向导极为困难。即使询问居民，路程单位“里”在不同地方的意义也不一样。而且居民以所需时间计算距离，因此得出的是不准确的信息。

由此可知，科尔夫等人确实是在半岛上到处游历，以军人的眼光加以勘察。可以说，其记述的水平非常之高。但是，俄方测绘的地图达不到和地志相同的水平。1900 年在财政部的帮助下出版的朝鲜半岛地图，比例尺只是 1/3300000，而军方以科尔夫等人收集的资料为基础，于 1903 年底绘制的地图的比例尺是 1/834000。显然，这些地图对于前线指挥官来说没有什么用（由于长度单位不是以米计算，这里的地图比例尺只是大概数字）。

中国东北的情况则大为不同。俄方因义和团运动出兵东北之前，就已经向这一地区派出了不少测量专家。实际上，俄国向朝鲜半岛派遣测量队的同一时期，派往中国东北的调查团数量远超其上。譬如，1896 年，总参谋部的伊林斯基上尉从鸭绿江出发，一路侦察了凤凰城、营口、金州和旅顺。几乎同一时期，斯托雷利维奇上校勘察了奉天、铁岭、吉林等地。在他们于 1894 年至 1896 年间勘察了东北与辽东半岛^①后，俄国不仅制作出了比例尺为 1/834000 的地图，还制作出了比例尺为 1/84000 和 1/126000 的地图。

俄军长期占领中国东北，为绘制地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俄国

^① 辽东半岛在地理上是中国东北的一部分，但作者在书中时常将东北（原文为“满洲”）与辽东半岛并举。

远征军中的军事测量部队于1901年1月开始在奉天省绘制地图，2月在吉林省和黑龙江省^①也开始了这样的工作。这种工作是将全省细加划分，然后以若干名军官组成一个小组分别测图。考虑到当时中国东北的情况，这种作业应该并不安全。就像日本人在朝鲜半岛所遭遇的那样，俄国人在时时不得不动用武力的危险情况下进行作业。

于是，到1904年初为止，俄方已经制成了辽东半岛南部比例尺为1/42000的地图、东北南部比例尺为1/84000的地图，以及包括奉天、四平街在内的辽阳以北地区比例尺为1/168000至1/834000的地图。以地图的水平而论，日方的朝鲜半岛地图与俄方的东北地图都在开战之前大体准备完毕。

有意思的是，1904年在东北交战之时，日本陆军曾经利用过俄方制作的地图。战后参加编纂日俄战史的泷原三郎回忆（回忆时为炮兵大佐），鸭绿江之战时日军碰巧发现战死的俄国军官身上携带了四五张辽阳附近的地图，前线指挥官于是马上将其送往参谋本部测量部。测量部将这种俄制1/84000地图改绘为1/50000与1/200000地图，配发给各部队。泷原三郎说，拿到俄方的地图“实为天佑”。日制地图是测量员以道路为基点制成的，一旦偏离道路就会出现显著的误差；而俄制地图不同，水准相当之高。

3 对铁路的利用

比起普通的地理学，战场地理学更加紧密地与在空间中移动所

^① 原文如此。当时奉天、吉林和黑龙江尚未设省。

需的时间结合起来。在非“殖民地战争”的欧洲式战争中，如果敌我双方在武器与士气方面没有太大的差异，那么只要能在预设战场尽早集结优势兵力，各场战斗的胜负手就已经基本决定了。简单说来，在近代战争中，军队的动员与集结能力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无论是对于俄国军方，还是对于学习了欧洲军事学的日本军方来说，这一点都是指挥作战的基础。

西伯利亚铁路以及随之而起的中东铁路（随之又有南部支线相伴）的修建，令俄国在这一方面的能力得到了飞跃性的提升。正因为如此，日本军方的高层认定，维特（他在中东路的修建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举的意图是要推进俄国传统的南下政策。

在 1900 年这一节点，根据日本参谋本部的计算，从莫斯科向哈尔滨运送一个军团大约需要 77 天。这是按照走黑龙江、松花江水路来计算，当时铁路的大部分还没有完成。尽管如此，从最坏情况出发的日本军方还是设想了以下情况：

第一，西伯利亚铁路自俄国欧洲部分至斯列坚斯克的路段已经通车。

第二，海参崴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间的乌苏里铁路全线通车。

第三，中东铁路“预计至迟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初竣工”。

第四，自哈尔滨至旅顺、大连的支线还有 360 公里的路段未完成，将在 1900 年秋完工。也就是说，时间走向在战略上对俄军是有利的。

同样的情况在俄国军方眼中却呈现出不同的景象。西伯利亚铁路确实可以在1900年修到斯列坚斯克，但是不包括途中绕过贝加尔湖的路线，这一部分何时完成尚不清楚（实际上，这部分路线在1905年夏天之前还没有完成。到那时为止，通过贝加尔湖的路线要靠破冰船和水运来勉强维持）。而且西伯利亚铁路全线为单线，即使通车，输送能力也是有限的。至于中东铁路，由于1899年中国东北暴发传染病，加上1900年的动乱，施工进度较预计为迟。

正如日俄两国对铁路建设状况的看法完全不同一样，双方在军事力量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俄国当时有1.4亿人口，而日本只有4400万人。至于在此基础上能够提供的兵力，俄方拥有包括预备役和后备役在内的350万人，而日本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从武器装备上来看，俄军虽然在弹药储备等方面存在不足，但以武器的种类、性能和数量而论，不弱于欧洲任何一国。也就是说，如果直接比较双方的军事实力，日本远较俄国逊色。

因此，日军必须在最大限度上利用俄军远离欧洲作战这一弱点。换言之，日本有必要在俄国完成有关铁路建设之前，或在俄国开通铁路后将军队集中于远东之前，将大量军队投送到中国东北，占据有利地点。这样的思维，影响到了日本对铁路建设的评价。

那么，俄国的铁路在开战前究竟完成到了何种程度呢？1904年1月初，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Alexei Nikolayevich Kuropatkin）指出，为了在远东集中必要的军队，必须每天从俄国的欧洲部分开出7列军用列车，并且从中东铁路的东段和西段各开出相同数量的军用列车，再在由哈尔滨南下的南部支线运行14列军用列车。但是，实际上由于机车和车皮数量不足，这是完全无法办到的。贝加

尔湖以东地区的给水设施和复线也不敷使用。

为了提高铁路的运送能力，俄国领导层在开战之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即使如此也无法挽回战争初期动员的迟缓。1904 年 1 月，俄国部署在远东地区（外阿穆尔军区与远东总督府辖区）的兵力不到 9.8 万人。到了真正与日军进行陆战的 4 月底，这一数字仅增加到 13.3 万人。其间，外阿穆尔军区、远东总督府辖区与俄国其他地区下达了动员令，铁路转入军事活动优先使用的体制，但即使如此也只能集中这些兵力而已。凭这一点人数，要在从辽东半岛经中国东北、朝鲜半岛乃至海参崴的辽阔地区迎击日军，是极其困难的。

不过，铁路的整备自然随着时间而改进。原本拥有强大兵力的俄国，为了对抗日军的进击而陆续将士兵与军需物资送往哈尔滨。直通哈尔滨的军用列车，在 1904 年 2 月平均每天只能运送 2.1 个梯队，到了 3~4 月上升为 3.7 个梯队，5 月为 6 个梯队，6 月为 7.1 个梯队，运力逐月增长。（不过，“梯队”这一单位的运输量是将士兵、马匹和装备综合计算的，无法还原为兵力，在此只是用来表示大致的运输量。）

结果，从 1904 年 2 月到次年 9 月的 20 个月里，俄国的铁路共运送了官兵 1294566 人、马 230269 匹、货物 95 吨^①。日军司令部虽然无法准确把握这一情况，但可以了解其大概，因此不得不考虑一旦战争继续下去，将会面对越来越多的俄军。

^① 原文如此。这一数字显然过小，疑为笔误。

4 朝鲜半岛

明治时期的日本在考虑战争时，首先关注的地理对象就是朝鲜半岛。日本的军方领导层对此非常清楚，这个半岛对日本而言是战略上的要冲。1903年6月，日俄战争时担任满洲军总司令官的大山岩（时为参谋总长）对这一问题有以下说明：

日本帝国以朝鲜半岛为我独立之保障地，乃开国以来一定之国是，亘现今及将来，不可复有所动。盖帝国卓立瀛海之中，八面皆为波涛，古来称之天府。而于运输交通机关发达之今日，天涯比邻，波涛坦途，国防之难易正与昔日相反。且全国之形状蜿蜒南北，需要守备之地甚多，于国防极为不利。独所幸者，西有朝鲜海峡，扼东西之航路，隐然为国防之锁钥。是故朝鲜若能常亲附于我，日本海之门户则固，于国防大为有利。若反之，朝鲜为大国领有，其位置恰对帝国之胁肋，其距离渡航仅需二三点钟。

这里表达的战略考虑，只限于不能把朝鲜半岛交给俄国这一大国这种程度。但在战争爆发后，朝鲜半岛具有了不同的意义。正如甲午战争时那样，日本必须把这里当作自己的战场。

与日俄开战几乎同时出版的参谋本部编的《日清战史》，可以展示当时日本军方领导层的这种想法。该书首先指出“朝鲜半岛到处多山，交通不便”，接下来讨论了便于部队登陆的港口。该书

认为，鉴于“此半岛东岸有脊梁山脉^①连亘，海岸线曲折不多，沿岸岛屿稀少，缺乏良港”，可以使用的港湾只有永兴湾和元山湾。该书进而指出“西海岸线曲折甚多，港湾貌似丰富，然内地流出之泥沙多，沿岸皆浅，尤以潮汐差^②甚大……港湾之价值不免为之减色。虽然较之东岸，舰船之锚地不少”，举出了牙山湾口、济物浦（仁川港）、群山浦和木浦等例。最终，该书认为南部海岸“沿岸岛屿丰富，多有良好锚地”，其中釜山浦和马山浦等诸多港口“足以令大舰安全锚泊”。

该书关注的另一方面是道路：“道路皆为徒步路，虽有称为大路者，路面经过山地时忽而收窄为三四十厘米。除一二大路之外，皆不可通行车辆，仅可通行驮马。而多水田之地方往往以田畦为道路。河川不设堤防，任水泛滥，且重要之处殆无桥梁。”

进一步的讨论，诸如从某处至某处的道路可以行军等问题，在该书中亦有详细的记述。譬如，从汉城到义州的大路“全程一百一十余里^③，为此国第一等道路，路宽三至六米，皆可通行车辆。然途中多有狭窄山岭”。确定日军在朝鲜半岛的登陆地点与其后的行军道路，是制订日军在大陆军事行动计划的前提。

日方既已做出这样的军事分析，俄方自然也不会甘落人后。譬如，前文提及的科尔夫与泽维金兹夫的研究著作，对朝鲜半岛北部的道路有如下记载：

① 即某地区最主要的分水岭，这里指长白山脉。

② 潮汐差即高潮与低潮之差，潮汐差较小的港湾适合作为海港。

③ 此处的里应为日里，1 日里约合 3.9 公里。

车路分为三种。其中，第一种与第二种道路（会宁与茂山经富宁通往镜城之路、沿海各州沿日本海行进之路、平壤至义州之路以及其余南部地区之路）除渡口及需要绕行乡间小路之处外，路况良好。反之，第三种道路亦即大部分道路，要紧之处多无人过问，诸如上下陡坡（尤以山口为甚），道路狭窄，桥梁劣质或无桥可过，经过险滩，路面岩石突出或系砂石路面（东北方面），是为主要缺陷。

由此可见，对于行军时至关重要的道路问题，俄国人也做出了与日本的观察者相同的评价。但是，俄方的记述在视角上与日方有明显的差异。正如日本军人关注港湾那样，俄方则主要关注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交通状况。对俄方而言，由陆路而非海路从大陆向半岛行动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此他们的目光自然聚焦于陆地之上。

俄方所有的地理书籍都强调，朝鲜半岛与大陆之间耸立着长白山脉，吉林省一侧还有俄语称为普罗斯科戈利亚（Плоскогорье，作为普通名词即“山地”一词，但此处为专有名词）的如墙垣一般横亘开来的山地。由于这些山地的存在，陆地上可能让日军通过的地点就只限于北方的图们江口与南方的鸭绿江口两处。

对于前者，有浅滩的庆源被视为可以渡河的地点，稳城也是作战行动中需要注意的地点。也就是说，倘若日军试图进攻俄属南乌苏里地区（尤其是海参崴），要通过自庆兴^①溯图们江而上是不可

^① 位于图们江口右岸，与中俄两国隔江相望。

能的。

另外，在鸭绿江沿岸，可供渡河之处并不像图们江那样被限制在狭窄的地带。俄方分析的结果，认为最重要的地区在自碧潼至鸭绿江口的沿岸，尤其是从长甸河口到义州之间。在后一地区有从中国方向通往朝鲜半岛的大路，便于作战活动。实际上，日军的行动是在昌城与义州之间展开的。由此观之，俄方的认识是准确的。但超出其预料的是，陆战开战时朝鲜半岛周边的制海权已经被日方夺取，这一点下文将加以论述。

5 旅顺与海参崴

如果说对日本而言，最重要的战略地区是朝鲜半岛；那么对俄国而言，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便是旅顺与海参崴。要战胜岛国日本，就必须进行海战。没有这两个军港，俄国是无法在太平洋上打仗的。

一般认为，俄国自 1898 年获得旅顺与大连的租借权之后，在东亚占据了非常有利的地位。旅顺与海参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个不冻港。另外，作为中东铁路由哈尔滨南下的支线的终点站，它可以非常有效地利用这一铁路。据称，铁路修建之后的物资流通，将会让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与欧洲地区紧密联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但是，从军事角度考量，这样的展望从一开始便遭遇了诸多质疑。作为军港，俄国海军的专家早就对旅顺的缺陷表达过不满。所谓缺陷，正如 1899 年驻北京的俄国武官严厉批评的那样：“对于寻求避难所的舰队来说，旅顺就是陷阱。因为这里容易被封锁。”而且因为潮汐的关系，舰船如果要从旅顺港的内海驶出外海，必须一

艘一艘地鱼贯而行，很容易被等在外海的敌舰队各个击破。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旅顺距俄国领土太远，难以守卫。从哈尔滨到旅顺的距离是 972 千米，即使匆忙修建了联结两地的南部支线，军队的行动能力也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从军事角度看，俄国对旅顺与大连的扩张意味着要将有限的兵力进一步分散。尽管这一点早被指出，但俄军领导层认为，没有必要削减欧洲方面的边防经费，来强化对这一“飞地”的防卫。

负责当地防卫的外阿穆尔军区司令官对中央的怠慢感到愤慨。1899 年 5 月他曾指出，旅顺“是通往北京的极为重要的战略据点”，是“我国太平洋舰队遥向南方进军的中继点和支柱”。在他看来，如果不从速加固旅顺的防卫，将来一旦失守，将是“对我国在亚洲威信的一大打击”。这一中肯的批评提出的过早，并没有让俄军改变其重在防备欧洲方面之敌的传统。

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在俄国获得旅顺之后不久，俄国海军总参谋部将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舰基地设置在海参崴而非防卫尚不完善的旅顺，也是顺理成章的。大约到了 1903 年，俄国才决定以旅顺而非海参崴作为主力舰的基地。当时日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为了防止日军在朝鲜半岛或辽东半岛沿岸登陆，将舰队部署在旅顺是必须的。

到了 1903 年，旨在加强旅顺及周边防卫的工事也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之中。为了持久作战，修建了长期保存粮食的仓库，在海岸和作为据点的区域也渐次修筑了炮台。虽然到开战前为止，工事的建设进度按俄方的计划只进行了一半，但俄国在开战后动员了大量劳动力，至攻防战开始的 1904 年夏天，已经将旅顺变成了一座坚固的要塞。

与此同时，旅顺守军的人数也在急剧增加。在面积约 3000 平方千米的旅大周边地区，俄国守军在开战时除边防部队外有 2.4 万余人，其中部署在旅顺的有 1.6 万余人。这样的规模，可以应对牵制敌军一部这一最低限度的问题。

另外，虽然太平洋舰队的基地设在旅顺，但由于旅顺与海参崴之间的海路长达 2200 海里，如果将舰船集中在旅顺，海参崴则会有危险。为此，俄国海军司令部通常会在海参崴留下少量舰船。日俄战争开战时，海参崴留有 3 艘装甲巡洋舰和 1 艘巡洋舰，而太平洋舰队拥有的 7 艘战列舰全都部署在了旅顺。结果，原本比起日本舰队只是略居下风的俄国太平洋舰队，被分成了两支实力远较日方为劣的分舰队。

这一情况早已被日方纳入作战的考量之中。1903 年 3~4 月日本海军进行大演习时，海军司令部^①制定的目标是赶在旅顺分舰队与海参崴分舰队会合前将其各个击破。

战争爆发后，海参崴分舰队一次也没能和旅顺分舰队会合。该舰队在日本周边海域袭击汽船，实施袭扰作战，令日方出现了若干混乱。但是，这不是精心策划的作战，对战局并未产生多大影响。从总体来看，俄国太平洋舰队令人吃惊地没有发挥出什么作用。从俄国压下海军的反对而租借旅顺的那时起，这样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可以预测了。总体而言，俄军司令部擅长从战争的视角观察地理，但在需要陆海军共同作战的旅顺，却无法做出这样的评价。

^① 原文如此，疑为军令部之误。

1 莫理循的报道

1901年1月3日，伦敦的《泰晤士报》刊登了日俄关系出现裂痕的报道。该报名声在外的北京特派记者乔治·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以《俄国与中国 东北的协定》为题，介绍了本书第一章提到的1900年11月签订的“阿列克谢耶夫-增祺协定”（报道并没有明确记载协定是何时何地签订的）。

关于该协定，莫理循的记述与俄国的研究著作所载内容大为不同。譬如，俄方流传的协定第二条规定，为了建设铁路与维持秩序，俄国可以在奉天等地驻扎，奉天将军须对此进行协助。而莫理循则概括道，奉天将军“须优待军事占领中的俄国人，保护铁路，平定省内，提供住所与粮食”。关于第三条，俄方文件的表述是参加省内骚动与破坏铁路的清军须被解除武装并遣散，而莫理循的报道则写道，奉天将军“须解除中国士兵的武装，将其遣散”。[另外，俄方文件的内容与日本驻华公使西德二郎12月30日写给外务大臣加藤高明的信函（1901年1月4日收到）中记载的内容相似。]

总结前述协定的内容之后，莫理循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继这一协定之后，其余两省必然也会签订同样的协定。到那时，东北在

事实上就会成为俄国的保护领。”莫理循虽然如此声称，但没有给出能佐证这一观点的任何证据。如前所述，根据俄方的理解，阿列克谢耶夫签订的协定只不过是一个临时的地方性协定而已。

在研究莫理循的学者当中，有人认为阿列克谢耶夫的行动是服务于维特的目标的，继而体现了俄国领导层企图占领中国东北的意愿。但是，这种说法对这一时期的俄国政治理解得过于简单，并没有多少说服力。首先，当时维特已经在尼古拉二世面前失宠，没有指挥俄国行动的权力；其次，在俄国领导层中，比起主张公开占有中国东北的一派，维特更能代表主张通过修建铁路获得经济利益的一方。也就是说，认为维特与阿列克谢耶夫之间存在协作关系是没有根据的。

由此观之，莫理循的报道虽然不能说是捏造的，但明显对事实有所夸张。他对俄国领导层中的意见对立置若罔闻，断定俄国的整体意见是夺取中国东北。

这样的报道诞生的背景，正如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是莫理循对俄国强烈的警惕心态。他在这一时期以这种一以贯之的心态撰写报道，是为了在布尔战争持续进行的情况下为英国国民敲响警钟，使其了解远东发生的重大事件。出于这一立场，他公开表示希望日本与俄国对抗。

不过，如果说这样的重磅报道只是由莫理循的反俄倾向催生的，那也不够中肯。如果不考虑当时俄国向中国东北的扩张在列强中引起的不安，便无法读出莫理循报道的意图所在。所谓不安，即俄国一旦获得中国东北，可能会引发列强对整个中国的瓜分，乃至确立俄国对远东的支配。

不用说，对这样的不安感受最为强烈，从而对俄国最为警惕的国家便是日本。日本的外交当局不可能不把俄国向中国东北的扩张与迄今为止其向辽东半岛的扩张联系起来。仅凭在中国东北拥有的铁路利权，俄国就已经让战略关系朝自己有利的方向转化。如果占领中国东北全部地区，与辽东半岛相连，更会让俄国在远东确立军事优势。这样的危机感在日本的外交官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但是事实上，仅凭日本的力量是无法把俄国从中国东北驱逐出去的。于是日方开始考虑向欧美诸国宣传俄国在中国东北活动的危险性，组织反俄包围网。从这一角度来看，莫理循的报道是日方求之不得的。结果，不论是否知道莫理循的报道，日本的驻外公使开始在伦敦、莫斯科、北京、柏林和华盛顿展开活动。这并非只是为了确认俄国的真实意图，也是为了向国际社会控诉俄国行动的不当。

但是，俄方并没有因为遭到这样的非难而动摇。1901年1月中旬，日本驻俄公使珍田舍己询问关于俄中协定之时，新任外交大臣拉姆斯独夫（Vladimir Nikolayevich Lamsdorf）答以这一问题只是俄国与中国之间的问题，没有必要向其他国家说明，只是以个人身份表示俄军的占领是暂时的。他理应接到了俄国外交官关于日本国内反俄情绪空前高涨的报告，却认为没有必要借此机会加以解释。

2 关于中国东北问题的拔河比赛

到了1901年1月27日，尼古拉二世终于在其家庭成员的伴随下从克里米亚回到了圣彼得堡。不过，沙皇回京和俄国出兵中国东

北引发的动荡完全没有关系。他认为这一问题并不重要，故而将其全部交由重臣亦即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外交大臣拉姆斯独夫和财政大臣维特三人处理。结果，这三人于 2 月 10 日起草了俄中协定草案，内容如下：

第一条，承认东北为中国的一部分，恢复其民政机构。

第二条，由于护路队无法守卫建设中的中东铁路，俄国有权于秩序恢复之前在中国东北驻军。

第三条，驻扎在中国东北的俄军在必要时可帮助中国官员维持秩序。

第四条，在中东铁路建成通车之前，中国不得在东北部署军队。

第五条，俄国政府如有要求，中方应撤换对俄国不友好的官员。

第六条，中国不得在中国北方的陆海军中安置外国教官。

第七条，废止中国的“金州的自治权”^①，俄国与中国地方政府签订维持秩序的协定。

第八条，不经俄国同意，中国不得将与俄国接壤的蒙古^②、东北等地区的利权提供给外国人。

第九条，中国赔偿俄国因动乱支出的费用。

第十条，中国赔偿中东铁路遭受的损失。

① 根据 1898 年签订的中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俄租旅大地区内的金州城由中国“自行治理”。

② 指今日的蒙古国。

第十一条，作为上条赔偿的替代，俄国可以向中国提供有关中东铁路新的利权。

第十二条，中国同意新建通往北京的铁路。

由此观之，这样的条款中同时存在着俄方控制中国东北的希望与将来归还中国东北的认识。俄方认为，中国因义和团运动的善后问题饱受欧美诸国的压力，需要俄国的帮助，因此或许会接受这一暧昧的要求。

但是，俄方于2月16日提出这一要求后，其内容马上外泄。首先，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于27日向外务大臣加藤高明传达了这一内容。次日，《泰晤士报》刊登了莫理循撰写的报道，披露了这一草案。二者都大体准确地反映了上述12条的内容。很明显，是参加谈判的某名中国官员刻意泄露了俄国的草案，以便获取国际支援。于是，谈判早早地从俄中两国之间扩展到俄国与其他国家之间。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作为也是受限制的。3月12日，加藤高明在送交伊藤博文的信函中提出了日本可以采取的三种方案：公开对俄国提出抗议，采取不惜一战的态度；宣称今后日本将在朝鲜自由行动和“暂时保留一切抗议之权利”。至于应当采取哪一种方案，加藤高明并没有做出判断。

三天之后，元老们开会讨论加藤高明列出的方案，而他们的结论是只能采取第三种方案。山县有朋与伊藤博文不同，他已经开始担心日俄关系“早晚将有一大冲突”。为了避免这一结果，他认为日本不得不联结英国等国。山县于4月底将这样的思考以书面形式

提出，即《东洋同盟论》一文。可见，山县此时对局势的判断是慎重的，认为日本还没到能够与俄国一战的地步。

其实，俄方也对此有着不同意义的焦虑。俄国与中国的谈判已经国际化，结果是前者不得不听听本来居于弱势的中国的意见。中方指出，各国拥有最惠国待遇，不会承认仅限于俄国的特别权利，由此对第六、第七、第十二条提出反驳。对于第四条，中方也要求改为军队不得部署于中东铁路修筑区域内。对于第十条，则主张数额应与付给其他国家的赔偿相称。

于是，到了3月中旬，俄方重新审视了自己的要求。其得出的结论是，第四条改为承认清军在东北驻扎，但人数与地区应与俄方协商；第七条改为不提及金州。对于其他条文的内容，俄方也极不情愿地同意修改。

不消说，俄方的这些让步是由于中国外交巧妙地掀起了国际舆论。然而有必要注意的是，俄方从占领时起便存在的意见分歧此时开始产生影响。俄国领导层强行提出一系列要求，让谈判环境恶化下去。

在清政府的抵抗下，俄方在4月初决定暂时中断谈判。俄国认为由于中国东北仍在其占领之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方大概会考虑让步。4月5日俄国公开表示，虽然俄方迄今为止一直就归还中国东北问题与清政府谈判，但后者拒不配合，因此不得不中断谈判。考虑到关于中国东北的拔河比赛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这一中断明显反映出俄方的劣势与中方的优势。不过，俄国领导层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都还认为，事态正在朝向对俄国有利的方向发展。

3 “满韩交换论”

前文集中论述中国的东北问题，没有涉及朝鲜。事实上早在1901年初，日俄两国间已经围绕朝鲜问题有过微妙的互动。《泰晤士报》刊登那篇重磅报道仅7天后，俄国驻日公使伊兹沃尔斯基（Alexander Petrovich Izvolsky）向日方提出了各国共同保证朝鲜中立化的提案。在此之前，伊兹沃尔斯基自然得到了俄国外交大臣的许可。但是，他得到这一许可的时候，莫理循的重磅报道还没有见报。伊兹沃尔斯基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报道掀起的国际风波，便向日方提出了朝鲜中立的提案。

已经怀疑俄国想要把中国东北变为保护国的日本外交当局，对于这一提案十分警惕。他们担心在俄国获得东北的情况下再让朝鲜中立化，会减弱日本的影响力。

但是日本领导层中也有人认为俄国的这一提案并非不可取，那便是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等人。他们认为，日本以往与俄国分享了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今后也应该通过两国的协作来谋得半岛的稳定。换言之，外交当局（加藤高明和小村寿太郎等人）鉴于俄国对中国东北的扩张，认为应当重新探讨关于朝鲜的国际关系体系；而伊藤等人则主张在既有的体系下处理朝鲜问题。

加藤高明马上将伊兹沃尔斯基的提案与东北问题联系起来，1月17日答以将在俄国退出中国东北的问题解决之后商议朝鲜问题。由此，拉姆斯独夫感觉时机不宜，24日会见珍田公使时表示先前的提案只是“友好的意见交换”，中立并非俄国的期望。这一放低

姿态的回应，被认为是俄方已经对中国东北问题预期之外的走向慌了神。对于不太了解亚洲局势的拉姆斯独夫来说，他本来就缺乏应对这一情况的能力。

通过这样的对话，俄国的朝鲜中立化提案悄无声息地从议题中消失了，但它对日方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一提案让日方领导层萌生了将中国东北与朝鲜合并作为日俄间交涉对象的想法。具体说来，就是让中国东北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朝鲜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所谓的“满韩交换论”，从此开始浮现为现实政策。

1980 年代之前的研究，大多将当时的局势走向描绘为二者择一的图景：俄国与日本缔结协定，将中国东北与朝鲜作为交易筹码，抑或日本与英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抗俄国。前者为伊藤博文等对俄绥靖派的主张，后者则为加藤高明等对俄强硬派的主张。但是近年的研究认为，这两个方向未必对立，毋宁说是相互补充的。这样的解释是很有说服力的，很可能把握到了日本同时追求“对俄提携论”与“对俄警惕·对英提携论”之间的默契。

的确，山县有朋此时还不认为日本有实力对俄开战，因此希望以中国东北与朝鲜作为交易筹码与俄国缔结协定。而伊藤博文也并非反对日英同盟，只不过认为英国同意与日本结盟的可能性很小。伊藤的这一判断绝不是没有理由的。日英同盟是 1902 年 1 月缔结的，而这一谈判真正开始大约是在 1901 年夏天。

在 1901 年夏天到来之前，尽管首相桂太郎、驻英公使林董等人付出了努力，但英国政府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盟方案。这是因为，无论是英方还是日方，都在探索与俄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往往有这种说法：从 1901 年早些时候起，日本的反俄情绪与英国传

统的反俄情绪自然地产生共鸣，两国正在走向同盟。这显然是误读了当时英国外交的实情。伊藤博文敏锐地察觉到英国在外交上脚踏两只船，并对此有所警惕。

不过，俄国盘踞在东北的情况也对伊藤博文产生了影响。到了1901年年中，连他也开始觉得，如果仅以朝鲜半岛为交涉对象，日俄之间是不能达成和解的。换言之，他认为通过“满韩交换论”重新构筑日俄关系是最好的选择。

打定这一主意的伊藤博文于9月18日出发前往俄国。他经由美国、法国，于11月底到达圣彼得堡。其后，伊藤虽然开始与俄方展开谈判，但除维特之外，俄方于12月的回应都是极为强硬的。首先，俄国海军代表主张，根据现有协定，俄国有可能从朝鲜获得港口，因此不应当缔结新的日俄协定。他们认为，获得处于旅顺与海参崴中间位置的朝鲜半岛上的停泊地，对于在战略上利用两港是必不可少的。俄国陆军也认为，需要让日本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的优先权。在这样的强硬意见的影响下，俄方拒绝通过伊藤博文提出的“满韩交换论”达成和解。尽管伊藤还没有放弃希望，但事态正在朝着与他期望不同的方向发展。

4 日英同盟

伊藤博文与俄方谈判时，对他的意见表示出最积极反应的是维特。维特当时曾有以下论述，主张接受伊藤的提案：

如果放弃朝鲜，我们就除掉了时常与日本产生误解的因

素。这样一来，即使不能把常有遭受攻击之虞的敌人变成盟友，至少也能让它为了不失去辛苦得到的土地，而与我国成为维持友好关系的邻国。如此，俄国与眼下隔海遥望的日本之间就建立了新的陆上国境。通过这一国境，我们可以威胁到日本。待到将来铁路完全竣工，我国在中国北方确立影响力之日，如果情况允许，也可以考虑再度控制朝鲜。我们不应忘记，日本从来没有控制朝鲜，也从来没有离开朝鲜。

维特恐怕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依靠俄国海军。从上述意见可以看出，为了让俄国顺利地在中国东北修建铁路，他认为即使把朝鲜让给日本，将来也不会对俄国产生什么不利影响。但是，维特精辟的议论并没有在以尼古拉二世为首的俄国领导层中得到积极的回应。于是，在俄方对维特的和解方案置之不理的同时，日英同盟正在迅速走向实现。事到如今，比起让日本与俄国和解，英国更希望自己拉拢日本。

正如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日英同盟的谈判进展异常顺利。其中一个原因，是伊藤博文当时身在国外，而山县有朋支持这一同盟。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同盟条约的内容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根据这一条约，日俄或英俄之间爆发战争时，英国或日本并不自然负有军事援助的义务。只有在两国的任何一方与俄国进入战争状态，而且第三国加入俄方的情况下，两国才有相互援助的义务。

对于这一时期的英国来说，与法国结成坚实同盟的俄国是它在欧洲方面的强敌。因此它极其担心日本与俄国在远东开战，让自己也卷入战争之中。结果，它认为上述那样受到限制的条约是合适

的。另外，日方由于位居政治中枢的伊藤博文与井上馨等人主张日俄提携，对这样的条约也乐观其成。

无论新任驻俄公使栗野慎一郎怎样向外交大臣拉姆斯独夫继续推行伊藤博文的路线，但由于英日签订了包含反俄内容的同盟条约，俄国对日本的态度还是愈发强硬。其后，俄国公开出现了强化远东军备的意见。另外，日方也有一些人认为与英国结盟提高了日本在对俄交涉中的地位。一言以蔽之，日俄和解变得更加困难了。

对于日英同盟，俄国最初的反应体现在1902年3月中旬与法国联合发布的共同声明中。这一声明称，对于日英同盟中在远东维持现状与保持中朝两国独立的内容，俄国与法国都表示赞成。俄国担心以日英同盟的缔结为契机，远东将会形成一个对俄法两国采取敌对态度的国际体系，因此劝说美国和意大利等与义和团运动相关的国家不要加入这一体系之中。

由于俄国开始在东北撤军，俄法声明的内容总算有了说服力。俄国领导层从1900年夏天便开始与清政府谈判，在此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撤军势在必行。在清政府的抵抗与各国的压力下，俄国政府于1902年4月8日在规定俄军分批次撤退的协定上签字。^①这一协定规定，在“不起变乱且不受他国行动之妨碍”^②的情况下，俄国将首先于该年10月从盛京西南部撤军，再于1903年4月之前从盛京其他地区与吉林撤军，最后于同年10月之前从黑龙江撤军。尽管加上了暧昧的条件，这一协定还是明显意味着俄国在建设中东铁

① 即清政府全权大臣奕劻、王文韶与俄国驻华公使雷萨尔签订的《交收东三省条约》。

② 条约中文本原文为“如果再无变乱，并他国之举动亦无牵制”。

路的同时所追求的扩张政策遭到了挫折。

结果，维特在俄国国内的地位遭到了沉重一击。如前所述，他屡屡主张将俄国的要求限定在铁路利权之内，反对同僚们在此之外寻求领土和其他权益。但是，正因为维特身为俄国东亚政策推进者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这一挫折也就被看作维特政策的失败。

5 别佐勃拉佐夫

维特地位的下跌，在 1902 年秋天昭示于众。当时他预备访问中国东北以便视察建设中的中东铁路，并借机顺道访问日本。日本驻俄公使栗野慎一郎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访问修复日俄关系，在伊藤博文先前提议的框架下重新展开交涉。也就是说，日方对此没有异议。但是，俄国外交部并不欢迎这一行动。结果，维特只访问了东北便不得不返回圣彼得堡。这恐怕是因为当年 10 月将要进行第一批撤军，拉姆斯独夫基于国内的政治观点，不想给维特提供介入的机会。

事实上，在俄军开始撤出东北之时，俄国国内舆论的聚焦点集中到了中东铁路的保护问题上，中国人大举移民东北的流言也不胫而走。俄国人担忧，如果长此以往，作为俄国在亚洲扩张象征的铁路将会成为中国人的袭击对象，安全运行难以得到保证。

这种担忧的加深加强了俄国国内强硬派的活动。他们主张在远东部署强大的军力，同时在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边境的图们江与鸭绿江沿岸修筑军事据点，保证俄国对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影响力。这一强硬派集团的核心人物，是前近卫骑兵团上尉别佐勃拉佐

夫 (Aleksandr Mikhailovich Bezobrazov)^①。他从 19 世纪末开始关注俄国利权相关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在圣彼得堡的要人中间展开了活动。

维特自不必说，拉姆斯独夫也反对别佐勃拉佐夫的想法。他们认为，利用森林资源的开发权，在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交界处建设俄国军事据点的计划，在日本和中国两方面都会产生恶劣影响。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也担心增加俄国的军事负担，反对这一计划。

但是，以上三人都没有拿出保护东北铁路的方法。别佐勃拉佐夫抓住这一点，取得了对维特的行动采取批判态度人士的有力支持。他在 1902 年底得以谒见尼古拉二世，恐怕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些人的帮助。于是在 1902 年底，别佐勃拉佐夫出发前往远东地区考察，尼古拉二世借给他了 200 万卢布的巨额资金。

别佐勃拉佐夫的考察旅行，在铁路沿线受到了维特部下的监视，其一举一动皆被一一报告。根据这些报告，后世的历史学家描画出的别佐勃拉佐夫形象犹如一名骗子。不过，唯一不能否定的是他确实认真地考虑过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置军事据点的构想。别佐勃拉佐夫希望由他设立的木材开发公司而非俄国政府来实现这一事业。他还着手策划了让预备役军人伪装为森林警备队驻扎在鸭绿江口附近的方案。这一计划的问题在于，要想付诸实施，就必须从中国取得鸭绿江沿岸森林资源的开发权。不过别佐勃拉佐夫认为，凭

① 俄国商人、政治活动家。他从 1898 年起联合一批贵族、商人和军官，鼓动尼古拉二世推行强硬的远东扩张政策，被称为“别拉勃拉佐夫集团”。其最著名的活动是经营鸭绿江沿岸的伐木业。日俄战争爆发后破产并失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死于巴黎。

借俄国的压力，这是迟早可以办到的。

别佐勃拉佐夫的计划并没有得到所有强硬派的支持。一向批评维特与拉姆斯独夫外交软弱的海军将领阿列克谢耶夫，反对将数百名预备役军人派往那样的据点，而只派出了几十人，这激怒了别佐勃拉佐夫。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尼古拉二世将别佐勃拉佐夫召回首都，再度与其展开商议。

恰在别佐勃拉佐夫回到圣彼得堡的时候，第二次撤军的日期到了。关于其后发生的事情，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种解释是，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在 1903 年 2 月提出，第二次撤军地区中包括奉天这样的重要战略据点，俄国只能实行原定计划的一半，以便维持其在中国东北北部的影响力。维特和拉姆斯独夫认为这会酿成国际丑闻，故而加以反对。但他们拿不出保护铁路的妥善方案，只能默认。另一种解释是，陆军大臣已经开始准备撤军，但阿列克谢耶夫（他是“关东省”的总督）主张，为了保护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权，俄军必须留驻，因此撤军半途而废。

尽管真相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俄国此时采取了预料之外的强硬政策。1903 年 4 月，俄方在谈判撤军问题时向清政府提出了 7 条要求。其内容为：中国不得将归还的领土割让或租借给任何国家；不征得俄国的同意，不得在东北开辟新的口岸或允许外国派驻领事；俄国在包括直隶省在内的中国北方地区拥有优先权；中国聘请外国人负责行政事务时，其权力不涉及这一地区；等等。也就是说，逼迫中国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大部分地区拥有特殊权益。

清政府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一要求，俄中谈判也随即决裂。不用说，俄国的要求马上传播开来，引起了国际批判。不过，尼古拉

二世可不是会在意国际舆论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于5月19日任命别佐勃拉佐夫为御前大臣^①。虽然不清楚沙皇对阿列克谢耶夫与别佐勃拉佐夫的意见对立作何看法，但他明显拒绝了维特和拉姆斯独夫提议的路线，支持强硬派。

6 陆军参谋本部

再看日本方面。1903年4月21日，山县有朋在京都的别墅无邻庵中召开了会议，与会者有伊藤博文、桂太郎和小村寿太郎。对于俄国中止从中国东北撤军一事，领导层总结出了当时还并不强硬的善后对策：“对朝鲜问题，令俄国承认我之优越权，一步不向俄国让步。”“对满洲问题，借我承认俄国优越权之机，根本解决朝鲜问题。”换言之，日本领导层选择了通过“满韩交换论”达成日俄妥协的方针，认为进行战争尚不可能。

但在日本军部之中，战争不可避免的意见相当普遍。继4月俄国中止撤军后，又传来了俄国在鸭绿江沿岸活动的报告。5月，驻汉城的野津镇武少佐送出的情报称，俄国占领了位于鸭绿江朝鲜一侧的龙岩浦，并开始在那里修建兵营。大约同一时间，林权助公使也传达了这一动向。时时将战场地理挂在心头的军方上层认为，俄国在朝鲜的这些活动是与俄军盘踞东北的决定密切联结的。

事态急速发展之下，参谋次长田村怡与造于5月9日召见参谋本部总务部长井口省吾并做出指示：“目下情况难以置之不理，应

^① 当时中国称其为“参政大臣”。

会集各部长，立即调查应准备之事项。”在此之前，海军军令部局员小田喜代藏中佐已奉军令部长伊东祐亨之命，拜访了井口，向他征询陆军方面对局势的意见。井口的回答是，此时“以余一己之见，对俄国之举动采取断然之决心最合时宜”。小田也表示“海军方面以为，迟一日则不利一日”。

尽管第二天是星期日，受田村怡与造指示的井口省吾和第一部长松川敏胤等人还是集合在参谋本部，着手起草意见书。意见书于次日脱稿，12 日经参谋总长大山岩之手，作为“上闻书”呈送天皇，其副本同时送交首相、陆军大臣和海军军令部长。其中表达了以下判断：

俄国于满洲之行动渐呈活跃之状。反之，彼于巴尔干（当时由于马其顿问题，斯拉夫诸邦联合向土耳其开战）则一反常态，极力希望维持和平。此则彼之所以全力倾注于满洲方面，企图占领东三省者也。今后俄国之行动，将以其惯用之威胁手段恐吓帝国，观其态度之软硬而占多少之利乎？抑将终究诉以兵力一决胜败乎？无论如何，眼下之战略态势虽于我有利，然若经年累月，彼将转其态势。且韩国若处彼势力之下，帝国之国防亦不再安全。

现在看来，俄国的内情并非如此处所言。即使是俄方的强硬派，也只打算保住俄国在中国东北与辽东半岛的权益。但是，参谋本部已经考虑到了上文所述的事情。一旦俄国把军队留在中国东北，再进一步在鸭绿江修建据点，接下来让影响力波及朝鲜全境，那么无异

于以战争威胁日本。

参谋本部的危机感，在海军与外务省中也产生了共鸣。井口省吾在日记中对5月29日在乌丸的料亭^①“湖月”举行的一场会议有如下记载：

陆海军与外务当局之有志者会于湖月，研究处置之法。结果认为，今日若不以一大决心，抑制俄国之横暴，则帝国之前途堪忧。若失今日之时机，将来绝无恢复国运之机。意见满场一致。

此次会议的出席者，除陆军的井口省吾和松川敏胤之外，还有海军的军令部第一局长富冈定恭、外务省的政务局长山座圆次郎等16名中层以上官员。

在这样的压力下，大山岩参谋总长与田村怡与造次长于6月8日打破以往惯例，出席参谋本部会议，寻求各部长的意见。其中意见最为鲜明的是井口省吾。他提出，尽管与英美两国联手是重要的，但一旦开战，两国应当不会加入，日本只能单独对俄作战。而这场战争的目标是将俄国逐出中国东北，并将东北开放，成为各国利害相关的地区。他的这些议论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接下来对具体战争过程的预测则与现实有很大出入：

案日俄两国之兵力，俄国战时可在东亚使用之陆军兵力为

^① 乌丸是京都市中心的一个地方，料亭即高档日式餐馆。

二十三万余人。此中属于西伯利亚、黑龙两军区及关东省者十六万余人，其余为莫斯科军区所属。此七万余人到达辽阳附近，以如今西伯利亚铁路之情况需要一百二十余日。前述十六万余人之中包含辎重及要塞部队，各地亦须守备队，真正属于野战军者为数更少，而集中一地所需时日自然不少。

如本书第二章所述，拥有世界最庞大军队的俄军，规模远远凌驾于井口省吾所言。他所列举的兵力，只能理解为俄国在开战三四个月内在远东动员的兵力。既然井口如此评价俄军，那么他应当是设想可以在这段时间内就将俄军从东北驱逐出去。

在当天的会议上，田村怡与造一言不发。另外，大山岩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不接受井口的观点。虽然如此，会议在比较了日俄两国的作战力量、动员能力和海军实力之后，得出了日方有胜算的结论。显然，参谋本部对事态的看法极为乐观，主张尽早开战。

于是，在6月初这一节点，日本与俄国以不同的姿态走向了对决。双方都在互相未能把握对方意向的情况下展开了行动。

走向战争之路

1 库罗巴特金访日

1903年6月10日，户水宽人等法学七博士^①向首相桂太郎提交了建议书。其中表示，日本在处理对俄关系时需要保住朝鲜，同时也不能把中国东北交给俄国。可见，这样的意见比起以往政治领导层中所议论的“满韩交换论”更加强硬。他们主张，如果俄国拒绝这一要求，即使开战也在所不惜。

同一天，好像是为了缓和日俄间的紧张气氛一样，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在下关登岸。无论是从人选还是时间来看，很多人都把这次访问的目的视为旨在达成日俄和解。譬如，驻海参崴的一名外务书记生在送交外务省的报告（5月20日收到）中写道，该地有传言说，库罗巴特金拥有俄方的全权，为了商谈“满韩交换”而访问日本。俄国准备与日本缔结同盟，将英国从远东驱逐出去。

然而，实际上库罗巴特金的访日旅行早在4月就已经确定，并

^① 即法学家户水宽人、富井政章、寺尾亨、高桥作卫、中村进午，经济学家金井延，政治学家小野塚喜平次。其中除中村为学习院教授外，余者皆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此次上书史称“七博士事件”。

不是为了解决日俄间的紧张关系。鉴于尼古拉二世开始重用别佐勃拉佐夫和阿列克谢耶夫，他打算亲自出马考察远东与日本。他在此时访日，绝不会是尼古拉二世所期望的。

库罗巴特金是在总参谋部附属的尼古拉学院^①以第一名毕业的优秀人才，不会让自己的活动留下把柄。他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微妙地位，于是在4月底从圣彼得堡出发之后，慢悠悠地考察了东北、辽东半岛和滨海省^②，等待着尼古拉二世的最新指示。

沙皇的指示在他抵达日本前夕到来。这一指示表明，当时沙皇对日本的评价低得令人吃惊。沙皇命令，库罗巴特金在日本应如此行事：

第一，承认日本在包含军事在内的各领域都取得了很大成果。

第二，仅在日本对俄国采取适当态度的条件下，承认日本今后将在远东诸国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第三，批评日本的对外政策正如日本与英国结盟、采取武力威胁、纵容报纸言论一样，都完全起到了反作用。

第四，指出俄国在远东方面付出了很大牺牲，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他国所付出的。尽管俄国并不是要收回投入的资

① 全称为尼古拉总参谋部学院，建立于1832年，原名皇家军事学院，1855年改为该名，1909年改名为皇家尼古拉军事学院，是军官的进修学校。库罗巴特金于1872~1874年在该校学习。

② 俄国在远东的一个行政区，管辖区域自乌苏里江以东至日本海，相当于今天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地区南部。

本，但理应有确保自己得到利息的正当权利。

第五，出示4月签订的俄中协定，指出俄国1900年的对华行动是正当的。如果他国不加妨碍，俄国将遵守这一协定。虽然包括日本在内的若干国家批判俄国行为不当，但如此只有阻碍这一协定的履行而已。

第六，不讨论朝鲜半岛问题。

由于得到了这样的指示，库罗巴特金在日本的活动极为节制。他对首相桂太郎有以下陈辞：

俄国修建西伯利亚铁路，连接远东及太平洋，以开发西伯利亚不毛之地为第一目的。中途以中东铁路之名，于满洲修一支线，着手旅顺、大连之设计。于此支线之修建，予虽甚有异议，然其实行既毕，如今亦无能如何。且西伯利亚铁路之建设费用达三亿卢布之巨，目下对此费用之利息颇感困难。日俄间之问题如何由两国妥善解决，方法不一而足，尚请仅将关系前述西伯利亚铁路与中东铁路之问题除外考虑。

也就是说，库罗巴特金虽然承认俄方修建南部支线与租借旅顺、大连是存在问题的，但由于建设已经告终，希望能够与中东铁路的建设一并得到日方的认可。由于朝鲜半岛问题被禁止讨论，他无法在这方面陈述意见，结果只能被桂太郎认为是“利己主义之甚”。

而在与陆军大臣寺内正毅的会谈中，库罗巴特金也如此说道：“予为武官，倘若日本先开战端，则将以三百万常备军攻击日本，

握东京于掌中。然以一己之见，绝不期望日本开战。”

从库罗巴特金后来的言行来看，这样的言辞吐露出了他的本意。日方负责应对的桂太郎和小村寿太郎大概会听取库罗巴特金的意见，认为俄方还没有确定任何对日政策，留下了谈判的余地。

6月23日，日方召开御前会议，会上决定的方针是对日本在朝鲜的优势地位不做让步，对东北则仅承认俄国经营铁路的利权。在准备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这一点上，日方理解了库罗巴特金带来的信息。但是，若将其内容与先前提到的沙皇给库罗巴特金的指示相比，仍可见日俄两国的立场有很大差别。

2 旅顺会议

库罗巴特金逗留日本期间，和负责接待的村田惇少将^①进行了谈话，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村田向这位俄国陆军大臣明确地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日本并不希望与俄国打仗，但国内也有不惜对俄一战的态度。

于是，库罗巴特金离开日本之后便开始着手促进日俄和解。他的第一个机会是旅顺会议。沙皇于7月1~10日让库罗巴特金、别佐勃拉佐夫、驻华公使、驻日公使等实权人物在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关东省”总督）的地盘集聚一堂，讨论俄国的远东政策。

在当时，沙皇比起别佐勃拉佐夫更加信任库罗巴特金。对于陆军大臣遵照指示在日本行动一事，他大约是很满意的。

^① 时任佐世保要塞司令官，日俄战争爆发后任大本营陆军幕僚。

结果，旅顺会议由库罗巴特金掌握了主导权。他的开场白说，会议的目的是“讨论俄国在满洲的地位，仰鉴沙皇之意，调和1902年3月26日^①（西历4月8日）的协定与俄国威严的保持，确保俄国在这一地区的投入收到成效”。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尼古拉二世绝不是要无视从中国东北撤军的承诺，而是打算寻求“调和”这一承诺与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

会议的主要论题是俄国在中国东北，包括鸭绿江一带的权益事业^②。库罗巴特金认为，后者会给日方的对俄态度带来负面影响。他主张，应当集中力量维护俄国在中国东北（包括辽东半岛）的权益。访问日本之后，他认为能够凭借这一举措达成日俄和解。库罗巴特金的这一观点与别佐勃拉佐夫的意见针锋相对。后者此时仍对自己推行的事业抱有信心，并且认为日本同时关注着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即使对鸭绿江沿岸的事业让步也是没有意义的。

现在关键就要看阿列克谢耶夫支持哪一方了。从阿列克谢耶夫之前的言行来看，他似乎会支持身为强硬派的别佐勃拉佐夫，实际上却赞成了库罗巴特金的主张。这是因为他本来就重视以辽东半岛为中心的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而且对别佐勃拉佐夫的所作所为一向很不信任。

这次会议的决定如下。第一，不应将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等量齐观，对于前者应暂缓行动（鸭绿江沿岸事业应作为单纯的商业活动进行）。第二，尽管俄国无意吞并中国东北，但考虑到俄国投

① 此处日期是俄历。

② 应指别佐勃拉佐夫等人经营的鸭绿江沿岸的森林开发事业。

人的费用与俄军撤退的后果，必须想出不让 1900 年的事态再度发生的办法。第三，为了孤立日本，应允许清政府将除哈尔滨之外的中国东北其他城市向外国人开放。

会议的结果影响到了别佐勃拉佐夫与阿列克谢耶夫的处境，前者急剧失势，而后者势力更增。库罗巴特金鉴于以现有兵力难以同时维护俄国在中国东北与辽东半岛的权益，不得不与阿列克谢耶夫合作以应对这一问题。这一点以后一直困扰着库罗巴特金。

3 日本的领导层

另外，日方通过情报网早已关注旅顺会议。譬如，驻芝罘领事水野幸吉在 7 月 3 日送交小村寿太郎的报告中写道：“据高桥（新治）^①言，6 月 30 日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到达旅顺，在该地与驻朝公使以及来自圣彼得堡的宫廷顾问官^②会谈。俄国驻华公使当于 7 月 3 日或 4 日到达。”（原文为英文）

高桥新治通过水野领事报告会议内容，则是 7 月 18 日的事情。这份电报称，库罗巴特金在旅顺停留期间曾经参加过五次会议，“被认为代表宫廷的”别佐勃拉佐夫得到了强烈支持战争的若干文官的拥护，而“库罗巴特金陆军大臣与阿列克谢耶夫将军都认为为时尚早，应静观其变，武官大多赞成这一方。其后虽然仍有几度热烈讨论，但最终仍以反战派占据上风告终”。

① 时为日本驻华公使馆书记生。

② 应指别佐勃拉佐夫。

水野领事两天后也发出了内容几乎相同的电报。根据这一情报，日本领导层应当会做出俄国在总体上希望避免战争的结论。实际上，如前所述，会议真正的胜利者是阿列克谢耶夫，他的立场绝非真正的非战论。但是，负责制定对俄交涉方案的小村寿太郎恐怕会认为，俄国是希望和平的。

这一时期，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都没有对小村有过什么指示。事实上，7月中旬日本发生了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伊藤改任枢密院议长，几乎同时将政友会总裁的位子让给西园寺公望。这是为了让国策在首相桂太郎与外交大臣小村寿太郎之间取得统一，以便进行对俄交涉。

试图解决领导层意见分歧的明治天皇于7月6日向伊藤博文表示，希望他改任枢密院议长。伊藤虽然一时踌躇，但最终还是决定接受。迄今为止，他一直对与俄国开战抱持极为慎重的态度。但是到了日俄两国政府都抱着可能进行战争的想法进行谈判的时候，他大概也不会再固执己见了。

另外，山县一直以来都扮演着支持桂与小村进行对俄谈判的角色。据《公爵山县有朋传》记载，对俄谈判一开始，桂首相就抱着可能进行战争的觉悟，而山县也有相同的意见。按照这一记载，山县应当也会与桂和小村两人商议如何制定对俄谈判方案，但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一点。尽管研究者中有人认为山县早早就有了开战的主张，但直到8月中旬之后才能得以证实。山县的行动极为慎重，很难确定他从何时起有了开战的打算。不过，确实从这时开始，他没有制止桂的开战意见。

于是，伊藤博文避免发表意见，山县有朋则在暗地里进行活

动，而其他元老也不打算就对俄交涉表明己见。控制海军的山本权兵卫（海军大臣）6 月曾声称“即使丢掉朝鲜也无不可，只要守住帝国固有领土足矣”，但其后也没有表达过什么意见。而大山岩（参谋总长）虽然呼吁不要丢掉朝鲜半岛，但也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行动。他们觉得，最终决定战争或和平并非他们这些军人的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桂太郎和小村寿太郎（尤其是后者）的意见大体上决定了日本对俄政策。他们的决断在 8 月显示了出来。

4 谈判开始

7 月 28 日，小村寿太郎指示驻莫斯科的栗野慎一郎公使向拉姆斯独夫外交大臣提出口头照会，表示希望进行谈判，“以期确定两国在远东的特殊利益”。俄方同意谈判之后，小村于 8 月 3 日向栗野传达了作为日俄协定基础方案的以下内容：

第一，尊重中国与朝鲜的独立与领土完整，保证各国工商业的机会均等。

第二，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势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有关铁路经营的特殊利益。

第三，在不违反第一条内容的前提下，俄国不妨碍日本在朝鲜、日本不妨碍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工商业活动。另外，俄国不反对今后延长朝鲜铁路并与中东铁路、山海关—牛庄铁路接通。

第四，双方因故向中国东北与朝鲜出兵时，军队的规模应

限制在必要范围之内，任务告终后应立即撤退。

第五，俄国承认日本有权向朝鲜提供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帮助。

第六，以上协定将代替关于朝鲜的既有协定。

这样的内容，显示出小村以相当强势的态度制定了协定草案。第二条虽然是6月23日御前会议上决定的内容，但第三条与第五条明确地限制了俄国的权利，却给予了日本几乎在朝鲜吃独食的权利。换言之，这些条款旨在令俄国放弃迄今为止在朝鲜拥有的权利。以常理考量，俄方是不会原封不动地接受这些内容的。小村大概认为，既然谈判刚刚开始，即使这样做也无妨。

但是小村的计划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挫败。拉姆斯独夫以工作繁忙为由，拒绝与栗野慎一郎会谈，到了8月12日才收下日方的草案。事实上，俄国政府当天发表了组织方面的重要决议。外交大臣大约注意到了这样的变化，因此避免与日方有所接触。

沙皇于12日颁布公告，为了统一关于远东政策的意见，新设远东总督府，任命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为总督。由此，阿列克谢耶夫不仅拥有黑龙江沿岸省与“关东省”的行政权，还可以指挥太平洋舰队与这些地区的驻军，获得了在远东地区左右与邻国外交关系的权力。这一人事变动对日俄关系与俄中关系影响甚巨。

先说俄中关系。阿列克谢耶夫的晋升，意味着俄军不可能从中国东北撤退。他的主张是“三年的占领已经给我方带来了一定的权利，要放弃是不可能的”。在这种强硬态度下，俄国与中国的谈判完全无法进行下去。

阿列克谢耶夫的晋升给日俄关系带来的影响也是消极的。最主要的一点是，阿列克谢耶夫是俄国对日关系的最高负责人，日方必须在东京与受他指挥的罗森（Roman Romanovich Rosen）公使进行谈判。这意味着日本政府要和俄国的派出机构进行外交谈判，这令日方产生不快之感。小村寿太郎反复向栗野慎一郎强调，日方不希望和作为阿列克谢耶夫传话人的俄国驻日公使谈判，要栗野争取在圣彼得堡进行谈判。小村之所以打算做出这种变更，恐怕不单是考虑到国家尊严，更担心俄方由此拖延时间以便为战争做准备。

栗野拜访了维特，向他表示与远东总督府进行谈判是不妥当的。维特虽然在8月底卸下担任11年之久的财政大臣一职，失去了政治影响力，但认为栗野言之有理。然而，拉姆斯独夫外交大臣表示沙皇即将出国，自己也将随行，若要谈判只能和阿列克谢耶夫谈判。日方无可奈何，只得接受这种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谈判自然不会进展顺利。日方于8月12日递交的提案，迟至10月才得到答复。日本领导层等到了促使他们加深对俄猜疑的回答。

5 俄国的回答与日本的反提案

罗森公使10月3日递交小村寿太郎的答复书，与日方的草案大异其趣。首先，针对第二条“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势利益”，新设第七条，规定“日本承认中国东北及其沿海完全处于日本利益范围之外”。由此，俄方要求日方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是俄国与中国间的问题。这显然原封不动地反映了阿列克谢耶夫

的意见。他在9月28日致沙皇的信函中写道：“在即将与日本政府开始的谈判中，惟有让罗森公使使日本政府毫无疑问地明白俄国必要时将动用武力保护本国在中国东北的权利与利益，只有在这一前提下行动，才能期待他的成功。”

俄方还要求在第五条中补充规定，双方相互承诺不以军事目的利用朝鲜领土，而且“不应在朝鲜沿岸设置工事以妨害自由航行”。这明显限制了日本在朝鲜的权力，旨在保护海参崴与旅顺之间的航线。

另外，俄方提出第六条中应包含这样的内容：朝鲜领土中的“北纬39度以北部分应被视为中立地带，两缔约国皆不得派兵进入”。如果在北纬39度线（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平壤—元山一线）上设立中立地带，那么就会便于俄方防守作为俄朝国界的鸭绿江与图们江，而阻止日军经由朝鲜半岛开往中国东北与辽东半岛。而且，俄军由此也易于从中国东北进入朝鲜半岛，威胁日本在朝鲜的地位。

得到这样的回答后，日方感到谈判前途不容乐观。小村寿太郎起初提出的强势提案，引出了俄国同样强势的回答。但是，日本领导层认为有必要为了表示不默认俄国在中国东北地位的强化而继续谈判。于是，桂太郎和小村联合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两名元老，为继续谈判而琢磨对策。由于当时日本认为时间的流逝对俄国有利，故而花了两周时间准备反提案，并在与罗森协商数次之后，于10月底正式递交。

这一反提案要求将第六条的相关内容改作中立地带定为“朝鲜与东北边界两侧各50公里”，并完全删除俄方的第七条，要求俄方承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与清政府的条约不应妨害日本商业及居住权利”。由此可见，日本在此大大后退了一步，取消了将俄

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限定在铁路经营范围内的要求，而且对于俄方提案中不在朝鲜沿岸构筑工事的要求也没有做出任何反驳。日本此时的诉求是事实上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处于优势地位，作为回报，日本的影响力应向朝鲜接近中国东北的地区扩展，并通过“满韩交换论”达成妥协。

时至今日，日本国内外关于日俄战争迫在眉睫的说法已经相当风行。但是，政治领导层仍然对达成谈判抱有希望，为此压制了作为开战急先锋的参谋本部的行动。诚然，参谋本部次长田村怡与造于10月1日骤逝之后，持开战论的儿玉源太郎被任命为继任者，这是出于准备战争的考量。但是，政治领导层在向儿玉传达日方反提案的时候，令他感到“日俄谈判有和平之倾向”。10月30日，参谋本部各部部长听到这样的说明之后，叹息“呜呼！大事去矣！待到满洲与西伯利亚铁路建成，满洲军备充实之日，当如何哉？”他们被完全隔离在政策的决定过程之外。

在这种情况下，参谋本部只有在自己的权限内为开战做准备。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策划朝鲜半岛登陆作战。10月20日与21日的会议讨论了在马山、镇南浦与仁川登陆的方案。21日，关于在马山与元山登陆的作战计划书被交给了陆军大臣寺内正毅。总务部长井口省吾11月9日的日记对此有如下记载：

京釜铁路^①若能速成，于出兵之际经济上之利益殊非浅

① 即从今天的首尔到釜山的铁路。日本于1898年获得这一铁路的建设权，1901年动工，日俄战争爆发时仅完成三分之一。

鲜，其效力至少与我军增加二三个师团相当，乃对俄、韩外交政略之强劲后援也。且以今日之急务……当尽力使之速成。与儿玉次长密谈此事。

由此可见，参谋本部在儿玉的领导下，已经开始细致地讨论派兵登陆朝鲜半岛。登陆后的行军将通过公路和铁路进行。

至于海军，这一时期也在自己的权限内准备开战。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于10月19日将时任舞鹤镇守府司令长官的东乡平八郎中将提拔为常备舰队司令长官（战时将成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之前已经担任过常备舰队司令长官，这样的人事任命明显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

于是，军部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开战，而日本的政治领导层则在寻求避免战争的可能性。他们所期待的是俄国对日方反提案的反应。

6 观点的不同

对于日方的反提案，俄方的评价极为冷淡。11月2日，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对栗野慎一郎表示：“日本之要求前后如一，惟其形式有异而已，且所求过多。”的确，日本的反提案删除了关于日本向朝鲜派兵的规模与撤退的规定，因此比最初的提案扩大了日本的权力范围。就日本而言，这是因为日方承认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优势地位，所以有必要让俄方承认日本在朝鲜权力范围的扩大。不过，在原本就认为没有必要与日本协商中国东北问题的俄国看来，

日本不仅一再就中国东北提出自私的要求，还想扩大其在朝鲜的权力范围。

于是，到了 11 月中旬，谈判的前景已经显得很是黯淡，日方除了等待俄方的再度答复以外别无他法。不过，尼古拉二世并没有表露态度。俄国向日方提出第二次反提案是在 12 月 11 日，距离日方提出草案已经过了 40 余日。而且，其内容排除了一切关于中国东北的规定，显示出不欲与日本协商这一问题的强硬姿态。

至于有关朝鲜的规定，俄方的反提案也相当苛刻。首先，第五条再次提出“不以军事目的使用朝鲜领土”。其次，关于日方所期待的在朝鲜与中国东北边境两侧各设置 50 公里的中立地带这一内容，俄方的答复也与先前相同，要求设在北纬 39 度线以北的朝鲜领土上。

桂太郎和小村寿太郎接到这样的反提案之后，认为俄国已经不会妥协，继续谈判只会给予俄国强化远东军备的时间。不过，元老们对此尚未同意。于是，他们姑且先着手从事开战的准备。在接到俄方反提案的第二天，儿玉源太郎被召到参谋总长大山岩的官邸，从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口中得知俄方的答复完全不符合日本的希望。这一内容被立即传达给了参谋本部各部的部长们。

另外，此时俄方的领导层发生了意见分歧。一方面，阿列克谢耶夫等人对于对日战争非常乐观。譬如，远东总督府的高层官员在 9 月底到 10 月中旬分析开战后的战争进程时，认为日军的登陆作战将会受到俄国舰队的阻碍，即使能够登上朝鲜半岛，也只限于其南部，绝不可能抵达元山—镇南浦一线以北。由于日军将由此沿朝鲜半岛由陆路北上，俄方将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动员，在朝鲜半岛的

根部迎击日军。也就是说，他们完全没有考虑日本夺取制海权的情况。

库罗巴特金对此持有异议。直至1902年，他还和阿列克谢耶夫等人一样，对日军的评价非常低。但到了1903年，他的想法有所改变。他在当年7月写道，俄国在开战后暂时只能采取防御战。“即使我方能将军队开到奉天—辽阳—海城一线，如果日本全力进攻这里，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是无法守住中国东北南部的。我方不得不像两年前考虑的那样，为旅顺遭到长期围困做好准备。”他考虑到了日军决心发动强力进攻的可能性。

库罗巴特金之后也保持了这样的观点。同年10月底，他提出建议书，主张为了避免与中日两国发生纠纷，俄国应放弃中国东北南部的占领区，将军队集中在北部。他的这一考量到了次年1月更加彻底，演变为将“关东省”与旅顺还给中国，进而出售经济上无利可图的南部支线，以此为代价巩固俄国在中国东北北部的权益。这样全面撤退的主张，在当时的俄国领导层中是找不到支持者的。

有俄国的研究著作指出，包括库罗巴特金在内的俄国军方领导层都把即将到来的战争与当时欧洲诸国在世界各地发动的殖民地战争等量齐观。

殖民地战争的一大特色，是欧美列强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上都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在轻视对手战斗力的情况下投入战争。1900年，俄国驻日武官曾在报告中写道，日军只不过是在形式上接近欧洲军队，内在则有很大差异，即使要和欧洲最弱国家的军队分庭抗礼，也需要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这样的评价，在俄国武官撰

写的报告中属于措辞最为刻薄的一类，但在远东总督府的领导层中似乎得到了支持。要解释他们并不彻底的备战工作与极其强硬的谈判态度，就不能不考虑对日本军力的轻视这一因素。在这一点上，库罗巴特金与他的同僚们是有所不同的。

7 安全困境

12月16日，日本召开元老会议，讨论俄国的第二次反提案。其决定是再一次基于“满韩交换论”探寻达成妥协的可能性。

21日，日本政府对陆海军下达指示，要求做好随时出兵的准备。同时，小村寿太郎向俄国公使表示，俄方10天前提出的协定草案没有包含日方“不可或缺之区域”，因此敦促俄方对此重新考虑，并另外提出三点修正意见。三点之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去除俄方第二次反提案中的“不以军事目的使用朝鲜领土”一条，并删除关于在朝鲜境内设置中立地带的第六条。桂太郎在21日致山县有朋的信函中写道，对于东北问题应采用“外交手段”，“此问题不应动用最后手段”；然而对于朝鲜问题“应充分陈述我方修正之希望，若彼方充耳不闻，则采取最后手段”。日方的第三次草案也于23日通过栗野慎一郎公使传达给了拉姆斯独夫。

俄方为了讨论日方草案，于29日召开了御前会议。在会上，库罗巴特金陈述了前述关于中国东北北部的意见，拉姆斯独夫则主张接受日本的要求，将中国东北加入协定之中。与他们意见对立的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原因不明。代替阿列克谢耶

夫陈述意见的是阿巴扎（Aleksei Mikhailovich Abaza）海军少将，他在远东总督府成立时设置的远东特别委员会中担任秘书长。阿巴扎虽然与别佐勃拉佐夫走得很近，但此时与阿列克谢耶夫意见一致。他认为，俄国基于以下两点理由无法接受日本的第三次草案，因此主张中断谈判：

第一，鉴于朝鲜地位不是日本和俄国所能决定的，俄国无法承认日本对朝鲜的保护权。

第二，俄国为中国东北付出了巨大的人力与物力，在这个问题上不容他国介入。

按照阿巴扎的说法，如果谈判中断，日本大概只能选择向俄国宣战，或在未获俄国承认的情况下占领朝鲜。对于后者，欧洲诸国应当不会认为是正当的行为。提出这样的见解之后，他认为虽然与日本开战的危险性不大，但俄国应立即将适当数量的军队派往东方以防万一。

最终，这次会议没有采纳阿巴扎的意见，决定继续谈判，向日方递交新的提案。这份提案交到小村寿太郎手上时，以俄历计算还是年底，但西历已经是1月6日了。它包括以下内容：

日本承认中国东北及其沿海处于日本利益范围之外。同时，俄国不会干涉日本或他国通过与清政府之间的现行条约，在中国东北境内享有的权利与特权（但开辟租界不在此内）。

也就是说，俄方响应了日本将中国东北加入协定的要求，显示出尊重他国在该地所有权益的态度。文中既没有“尊重中国领土完整”

之类的措辞，也没有提及日本以外的国家，可见是一份精心制定的答复。如果日本以外的国家对此表示满意，那么将给日本造成压力。不过，俄方做出这样的让步，完全是为了重新提出俄方第二次反提案中关于中立地带的条款与“不以军事目的使用朝鲜领土”的规定，以此条件寻求日方的让步。

次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与各次长也一同参加。这次会议旨在确认日本除了诉诸战争之外已经别无选择。但当时海军提出，将运输船集中在佐世保需要等到 20 日，在此之前开启战端是不妥当的。于是，桂太郎于 11 日召集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和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制定了第四次提案。该案再次将前述关于朝鲜的两条规定（禁止在军事上利用朝鲜领土和设置中立地带）删除，并写入了“尊重中国东北领土完整”的内容。

桂太郎等人预料到俄方不会接受此案，已经做好了提出这一要求之后就中断谈判，然后投入战争的打算。于是，13 日小村向俄方传达了这份最后的提案。同时，他也要求俄方尽快做出答复。

俄方接到日方提案之后展开了讨论，但答复相当不一致。26 日栗野慎一郎向国内报告，他当天与拉姆斯独夫会面，对方声称俄方将于 28 日开会商议，并将决议上奏沙皇求得批准。但是到了 28 日，拉姆斯独夫又表示有关大臣正在分别向尼古拉二世陈述意见，其后沙皇将做出决断，因此将会延迟答复。

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按照预定计划准备中止谈判，与俄国断交。2 月 5 日，小村命令栗野通知俄方断交。日方在此使用了“保留采取独立行动之权利”的措辞。这份公文于 6 日下午送交俄国外

交大臣。

另外，根据日本外交文件，小村向栗野发出这一训令三个小时之后，4日发出的关于栗野与拉姆斯独夫会谈内容的报告送到了小村手上。栗野写道，拉姆斯独夫以个人名义表示，俄方希望不要以军事目的利用朝鲜领土，并且“在两国直接势力与行动范围之间设置缓冲地带”。

从这样的“个人意见”看来，日俄两国围绕朝鲜的利害冲突最终还是无法调和。小村尽管得知俄方的答复，还是选择走向断交。

国际政治学中有“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这一术语。由于国际社会时常孕育着战争的危机，在对立的两国之间如果有一方增强了本国的安全，则会引起另一方的不安，如此这般产生恶性循环。安全困境便是用来形容这一情况的。就日本和俄国而言，由于俄国进入了中国东北，如果一方要保证本国在朝鲜半岛的安全，就会增加另一方的不安。在这种强烈的安全困境意识之下，实力较弱的日本除了战争之外也找不到其他有效的解决方法了。

第五章

开战

1 奇袭

1904年2月6日，圣彼得堡时间下午4点，日俄宣布断交。身在旅顺的俄国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也得到了通知，但他只转告了少数亲信。他准备于2月9日召集要塞司令官等官员召开特别会议，大概打算在会上传达断交一事。阿列克谢耶夫原本已经知道日本人陆续从中国东北各地撤走的消息，但没有料到旅顺的舰队会突然遭到袭击。

日方在宣告断交的同时已经在着手准备作战。作战方向分为两个，第一个方向基本由陆军负责，目标是控制战略要地汉城。先遣征发队于2月6日从佐世保乘船出发，8~9日凌晨在仁川登陆。这支部队平安登陆，并顺利进入汉城，给当地人留下了日本处于优势地位的印象。8日下午在仁川港外，瓜生外吉^①率领的第二舰队遇到了正在出港的俄国军舰。俄舰一度退回港内，但到了次日下午为避免在港内作战而再度出港。炮舰“高丽人”号与“瓦良格”

^① 时任日本海军第四战队司令官，隶属第二舰队。

号^①遭到日本舰队攻击，中弹之后自沉。

这场海战导致参谋本部决定，将继先遣征发队之后开往朝鲜的第二师团的登陆地点由朝鲜半岛南岸的马山改为中部的仁川。从2月中旬开始，该师团用10天时间顺利在仁川登陆，占领了汉城以南地区。

第二个作战方向以夺取制海权为目的，首要目标是击败俄国太平洋舰队。2月8日，联合舰队悄然驶向俄国主力舰集结的旅顺港，袭击了停泊在港外的俄国太平洋舰队。结果，该舰队停泊在旅顺的7艘战列舰中的“列特维赞”号和“皇太子”号，与4艘巡洋舰中的“帕拉达”号遭到重创。但是，这些舰只都被拖回港内，日本舰队未能取得太大的战果。于是，日本舰队于9日再度接近旅顺港，炮击港内的舰船，但其时遭到反击，没有取得什么战果。即使如此，日本舰队的攻击也给俄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直到马卡罗夫（Stepan Osipovich Makarov）^② 司令官到来之前，俄国舰队始终坐守港内。

于是，到了向俄国正式宣战的2月10日，日本已经暂时达成了夺取制海权和占领朝鲜南部两个初步目标。按照日本领导层的理解，6日通知俄方断交时已经宣告日方有“采取独立行动之权利”，发动以上军事行动没有任何问题。对此，俄方领导层则认为断交和宣战是两回事，日本的行为是不宣而战。在宣战之前发动攻击，按

① “瓦良格”应为巡洋舰。

② 马卡罗夫于1904年2月24日被任命为俄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此前任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司令官）。他被公认为俄国海军最优秀的将领，在舰船技术、海洋科学、极地探险等方面皆有建树。

照当时的国际法尚不属于违法，但在道义上确实有些授人以柄。不过，俄方将谈判时间延长，在此期间持续增强远东方面的军备，而且从俄方接到断交的通知到日方开始攻击经过了一日有余，由此观之，俄方的主张也不是没有问题的。

日本军方领导层虽然在先发制人方面做了周到的准备，但是并没有为战争做出整体规划。他们的做法是先达成当下的小目标，再确立新的作战目标并付诸实施。

在这一点上，战争一开始的朝鲜半岛登陆作战表现得尤为明显。日军最初的目标是在马山登陆并控制汉城，作战计划局限于朝鲜半岛南部。然而，由于海军的袭击比预想更加顺利，夺取平壤被加入新的目标之中。这一决定是2月16日做出的。因此，当时正在驶向仁川的运输船上的第十二师团到达之后，才被通知自己的目的地不是汉城而是平壤。

接下来，鉴于朝鲜半岛登陆作战进展顺利，大本营于2月29日命令第一军（司令官黑木为楨）在镇南浦登陆，从朝鲜半岛北部向东北南部进发，并决定让第二军（司令官奥保巩）在中国辽东半岛登陆。前者的登陆地点在四天之前才从仁川变更过来。后者的登陆地点则出于对俄军“旅顺、大连军备薄弱，欧俄军事运输有未臻发达之兆”的判断，于27日才在大本营陆军部的脑中突然浮现出来。当时有四名骨干参谋表达了陆军主力应在大连湾登陆的意见。

结果，由于海军的旅顺堵塞作战连遭失败，第二军在辽东半岛的登陆地点在大孤山、大连、小平岛、大小窑口、盐大澳之间先后变动了五次，到了4月底还没有确定下来。不过，在从2月底开始

的作战计划变动过程中，日军在辽阳以北与俄军交战这一模糊的意图，终于作为作战目标得以具体化。

综上所述，日军当下的目标是巩固对朝鲜半岛和制海权的控制，但陆军与海军基本上是独立行动的。从切中机要、先发制人的日军攻击来看，似乎可以认为日军通过陆海军密切的配合，按照预定计划展开了从袭击旅顺到进军东北南部的行动。但这并非事实。

2 俄军的混乱

将日军行动衬托得更加突出的，是俄方自己的混乱。在此可以列出多条原因。

第一，俄方把阻止日军登陆朝鲜半岛的任务交给了驻旅顺的太平洋舰队。因此，一旦日军先发制人的袭击限制了太平洋舰队的活动，俄军就无法阻止日军登陆。时至3月，俄方仍然不清楚日军的目标在何处。有人认为日军会在辽东半岛登陆，指向海军基地旅顺；也有人认为日军会在辽东半岛西侧的营口—熊岳城一线沿岸登陆，目标是截断中国东北与旅顺之间的交通；还有人担心日军会从朝鲜半岛北部攻向最为脆弱的海参崴。结果，俄方没有拿出任何对策。

第二，如前所述，由于俄方铁路运输能力不足，军队无法集中起来。时至3月底，在中国东北（不包括辽东半岛与滨海省）的部队还不到55个营。一个营按战时编制有1000人，因此总兵力不到5.5万人。凭这点兵力，要在从奉天南迄营口与辽东半岛根部、东至鸭绿江的广阔区域阻止日军进入中国东北，是不可能办到的。

(辽东半岛与沿海州各部署了 1 万人左右的部队，但无法出动)。

第三，2 月 20 日库罗巴特金被任命为满洲军司令官之后，与最高总司令官阿列克谢耶夫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按照当时的欧洲军事理论，库罗巴特金准备将大军集中一处，然后一举粉碎日军。这样的战略战术强烈反对将小股部队派遣到前线。于是，库罗巴特金首先考虑的是守住南部支线。至于鸭绿江沿岸的防御，他认为只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

而阿列克谢耶夫基本上不太重视兵力的集中，认为应当将从俄国欧洲部分调来的部队部署在必要的地区。所谓必要的地区，指的是将中国东北北部的俄军与辽东半岛及鸭绿江沿岸的部队联结起来的区域，即从海城到营口的广阔区域。当然，阿列克谢耶夫也了解，凭开战时的兵力是无法守住鸭绿江沿岸的。但是，时至 4 月，库罗巴特金还认为部署在鸭绿江沿岸的部队的角色只是牵制日军，这是他不能同意的。于是，他在 4 月底直接向尼古拉二世表示了不满之意。他声称，“满洲军”亦即库罗巴特金所部兵力超过 10 万人，却不向鸭绿江沿岸派兵，他对此无法理解。

而在俄军出现这种混乱的同时，日方克服了陆军与海军的意见分歧。陆军方面主张立即将军队派往辽东半岛，而海军方面鉴于堵塞旅顺的行动屡遭失败，没有确切答复让第二军登陆的日期。到了 4 月 14 日，旅顺堵塞作战终于成功，而第二军的登陆被定在 5 月 1 日。按照陆军方面的推测，这是因为海军得到了情报，波罗的海的俄国舰队将于 6 月左右向太平洋出发，因此感到有必要迅速攻陷旅顺。于是，日军实行的计划是同时攻击鸭绿江沿岸与辽东半岛。

尽管受到阿列克谢耶夫的批评，但俄军的部署直到 4 月底仍然

看不出有什么变化：海参崴部署了3万人，辽阳周边3万人，营口至盖平2.3万人，旅顺3万人，鸭绿江2万人。

而在日军方面，朝鲜半岛的第一军拥有三个师团。其中，有4.25万人参加了4月30日开始的鸭绿江渡河作战。也就是说，在这一方向上，日军以两倍以上于俄军的兵力发动了攻击。由于鸭绿江沿岸区域辽阔，尽管俄军试图利用地形迎击日军，但防线还是迅速遭到突破。

至于从5月5日开始在辽东半岛的盐大澳登陆的第二军，则拥有四个师团与炮兵旅团等部队。至13日，该军登陆完毕的第一批次兵力已达4.88万人。由于日本海军在营口方向的牵制，这一登陆作战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其后，日方派遣独立第十师团在位于第一军与第二军之间的大孤山登陆，随后又令第二军剩余部队在盐大澳登陆。

于是，至5月初时，分布在鸭绿江一九连城的俄军东路军^①在兵力上已被日本第一军压倒。接下来，到了5月26日，在旅顺以北50千米的金州南山扎营的俄军不敌日军第二军的猛攻，将这一要冲拱手交出。

这一情况再度引起了库罗巴特金与阿列克谢耶夫的争执。已被阿列克谢耶夫的批评压制住的库罗巴特金，不得不在6月中旬派出部队增援旅顺。但是，他对这一行动只是勉强同意，没有按阿列克谢耶夫的要求派出48个营，而只派出了32个营。结果，6月14~

^① 原文为“东部方面军”，但按照中文军语，“方面军”的级别显然过高。按照俄文记载，其称谓为满洲军东方支队（Восточный отряд Маньчжурской армии），辖两个步兵师与一个骑兵旅。在此参照中文习惯译为“东路军”。

15 日在南满铁路沿线的得利寺附近，北上的大约 3.3 万名日军与南下的俄军 36 个营之间爆发了激烈战斗。此战又以俄军败退而告终。当时，俄军指挥官之间没有统一的作战思想，无法经受日军组织有序的进攻。俄军不习惯山地作战，对日军而言也是值得庆幸的事。

战争到了这一阶段，也伴随着巨大的牺牲。根据日方记载，从鸭绿江沿岸到九连城的战斗中，日军伤亡 932 人，俄军则为 1800 人。金州南山的战斗是阵地战，因此更加惨烈，日方的伤亡高达 4387 人。而在两军初次正面冲突的得利寺战斗中，日方的伤亡则有 1145 人。

俄方对伤亡的记载如下：鸭绿江战斗，俄方 2781 人，日方 1000 人；金州战斗，俄方 1400 人，日方 3450 人；得利寺战斗，俄方 3563 人，日方 1190 人。每次战斗的作战时间，短则一日，长则数日。

两军都使用了精度高、杀伤力强的武器，这使得前线的伤亡异常惨重。然而，双方除了持续进行消耗战以外也别无他法了。

3 爱国心与举国一致

一般认为，在开战的同时，日本国民便掀起了狂热的支援战争的声浪。相形之下，俄国人对这场战争一开始并不关心。其实在开战阶段，两国国民对战争的态度并没有显著的不同。俄国国民也在开战不久之后热烈地支持战争。

在俄国首都，沙皇在冬宫主持的宣战仪式在庄严的氛围中进行。救世主大教堂中也举行了祈祷仪式。从 2 月 9 日到 11 日，圣

彼得堡、莫斯科等城市都举行了大量市民参加的爱国游行。

而在边远的敖德萨同样如此。根据驻该地的日本领事2月14日的报告，他在8日因领事馆关闭而出发时，社会看起来还比较平稳；但其他馆员9日出发时，由于报纸号外已经报道了日本海军在旅顺海面用鱼雷袭击三艘俄国军舰的消息，“世间俄然轰动，街头民众群集，开战之谣众口嚣嚣”，“火车之中，俄人乘客为日本人斥骂非难之声所苦”。

讽刺的是，日军的奇袭反而促使俄国国民团结起来走向战争。2月10日公布的沙皇宣战诏书也强调了日本偷袭的不当。这份诏书在各地被宣读，坚定了国民支持战争的意志。国民唱着国歌，为战胜祈祷。

当然，两国也采取了措施来维持这样高昂的情绪。战争报道在这一点上极为重要。将军的肖像与舰船的照片，以及由照片精心摹写而成的插画被刊登在杂志上出售给读者。在这些杂志中，真实性是被弃之不顾的。日本杂志对日本人、俄国杂志对俄国人都有所夸张，都将他们塑造为勇壮强健的形象，而敌方士兵的面貌与动作则被描画得丑恶而卑下。在这上面所下的功夫，自然会起到坚定战争意志的效果。

记者和作家也奔赴战场，为本国读者送去战况报道。文章中经常运用插图来营造身临其境的感觉。以战争为主题的杂志在两国相继出版。政府对报道有所管制。譬如俄方禁止发送的有关战场的信息中，包括部队的部署、兵力等军事情报，以及“敌弹之效果、命中之处”与“虽经公开报道之死伤者姓名”这样会引发国内反应的内容。日本的报道管制则从1903年秋天便开始运作。

由于日本在战局中处于优势，维系高昂情绪的材料是不会缺少的。战斗胜利的消息一传来，繁华街道上便有提灯游行，大型公园里召开了庆祝大会。在旅顺堵塞作战中战死的广濑武夫中佐（战死时为少佐）被铺天盖地地报道，进一步提升国民的战意。日本还没有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已经呈现出了社会广泛卷入战争的“举国一致”的情态。

相形之下，俄国由于战果乏善可陈，缺少催生国民整体感的材料。在战争初期不愿与兵力占优的日军交战、一心等待集中兵力的库罗巴特金的战略虽然是合理的，但难以鼓动国民支持战争。对于近代战争而言，后方国民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俄军领导层在这一点上是欠考虑的。

在俄国，初战失利的消息传来之后，寻找“责任者”的工作便开始进行。上至库罗巴特金和阿列克谢耶夫，下至部队指挥官，几乎全体军方上层人物的能力与资质都遭到了质疑。然后是国内少数民族，尤其是犹太人。当时俄国人普遍认为，犹太人缺少爱国心，给部队带来了消极影响。接下来是中国东北战场上的当地居民，也就是朝鲜人和中国人。他们被怀疑为同是黄色人种的日本人充当间谍。日本全国上下也对潜入本国从事破坏工作的俄国间谍（当时叫作“露探”^①）保持着高度警惕。俄方则格外警惕日方间谍在出征军队中的秘密活动。

不过，俄国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社会中的阶级矛盾。以工人和农民为一方，贵族为另一方，呈现出巨大的社会落差。沙皇本应充当

^① “露”即日本对俄国的汉字简称（全称“露西亚”），“探”即侦探之意。

调和的角色而未尽其责，因此与国民的一体感便从内部崩溃了。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力虽然没有后世所想象的那样大，但俄国还存在其他的问题，那就是被称为布尔乔亚的中产阶级希望以地方自治组织为根基谋求参与政治。以沙皇为核心的领导层对这种新兴势力抱以怀疑的态度，没有给予其自下而上建立社会组织的机会。

象征着社会矛盾无法调和的事件在7月发生了，盼望革命的恐怖分子用炸弹杀害了内政大臣普列维（Vyacheslav von Plehve）。这昭示了俄国这个国家无法做到举国一致。

4 辽阳之战

日军于5月底组建第三军，负责进攻旅顺要塞，司令官为乃木希典中将（6月6日晋升大将）。该军所辖部队为第一师团与第十一师团。除此之外，出征的军队还有第一军（近卫师团、第二师团、第十二师团）、第二军（第三师团、第四师团、第六师团、骑兵旅团^①、炮兵旅团^②）和独立第十师团，这些部队全部向北进发。在这一过程中，独立第十师团于6月底得到第五师团和步兵旅团^③的增援，合编成第四军。接下来，又将第九师团编入第三军。这样一来，当时日本所有的13个野战师团中，留在国内的只剩下两个师团（第七师团和第八师团）。当时的一个野战师团由1.8万~2万名官兵组成。

① 确切番号为骑兵第一旅团。

② 确切番号为野战炮兵第一旅团。

③ 确切番号为后备步兵第十旅团。

考虑到俄军持续向东北进发，日军全军北上显得有些不可思议。从战史来看，6 月中旬的得利寺战斗之后的一个月內，没有发生过什么像样的战斗。这是因为，日方必须为将来的行军确保武器弹药的运输安全。对于不得不在险峻山路行军的第一军来说，问题尤为突出。有日方的回忆录记载，作者从 5 月中旬到 6 月下旬一直在作为军需基地的凤凰城“滞阵”。由于当时的部队机动依赖人力与马力，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休息时间”。

对于初战失利的俄军来说，这段时间是宝贵的。战争意料之外的进程，意味着对日战争不会以小规模收场。俄方利用这段时间，全力以赴地集中兵力。

在此以 7 月中旬这一时间点来观察俄军的阵容。首先是南路军。该部准备沿铁路迎击日军第二军与第四军，兵力包括大石桥的 4.2 万人，防守其左翼的 2.4 万人，以及在后方海城的预备队 1.6 万人。东路军部署在安东至辽阳的山路沿线，以防备日军第一军。该部的阵容包括蓝河的 2.6 万人、赛马集方面的 7000 人与辽阳的 5000 人。与日军对抗的俄军在这一时期达到了 19.6 万人之众，数量上明显占优。但是，接连退却的俄军在士气上极度低落。战前对日军的过低评价，经过初战的失利之后，转而变得奇高无比。

在这种情况下，俄军于 7 月中旬在摩天岭附近向日军第一军发起了心不在焉的攻势，但随即被击退。而在雨停之后的 23 日开始的大石桥附近的战斗中，俄军司令官扎尔巴耶夫（Nikolai Platonovich Zarubaev）^① 中将误以为日军兵力在己方之上，遂于 24

^① 时任俄军第四西伯利亚军团司令官。

日夜间撤退。

接下来，从7月底到8月初，在辽阳东部（榆树林子与样子岭），日军第一军与俄军东西伯利亚第三师、东西伯利亚第六师、第十军团反复交战。虽然未分胜负，但各个战场的俄军指挥官认定形势不利，接连下令撤退。

同样在7月底，扎苏利奇（Mikhail Ivanovich Zasulich）^①中将指挥的第二军团面对日军第四军时，完全没有交战便于8月1日早晨向辽阳方面撤退。这类战斗的结果就是日军士气持续上涨，而俄军则丧失了自信。

到了8月初，按照日军的判断，在辽阳集结的俄军兵力占优，因此需要等待乃木希典的第三军攻下旅顺之后北上增援。但是，旅顺的交战旷日持久，而俄军在持续增兵，情势显然对日军不利。日方于是考虑在旅顺获胜后将军队开往锦州方面，如此便于日军运送物资，以备辽阳战役之后的作战。无论如何，日军总司令部决定于8月中旬以现有兵力发动总攻。

辽阳位于辽河支流太子河与南满铁路的交叉点，是交通要道，俄军早已在这里构筑了防御阵地。会战开始前，俄军还在太子河上架设了若干桥梁。因此，守方在地利上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而且，第五西伯利亚军团于8月中旬抵达，兵力对比逐渐利于俄方。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的攻击于8月25日开始了。日军第一军从辽阳东南沿太子河右岸前进，攻向辽阳与奉天之间的道路，旨在切断俄军的退路。这一方向的攻击得到了第四军与第二军在南面的

^① 时任俄军第二西伯利亚军团司令官。

策应。但是第一军进军的道路险峻，不适合使用野战炮。而在高地上布阵的俄军居高临下地开火，有效地阻止了日军的行动。尽管如此，库罗巴特金认为日军在实行包抄，山地作战对俄军不利，于是在 26 日深夜命令全军向辽阳撤退。其后，第一军终于得以进击，而在辽阳以南的鞍山站与俄军对峙的第二军与第四军也可以前进了。

日军于 28 日开始乘势对辽阳发起总攻。一般认为辽阳之战即于此时打响。实际上，日军原本计划的太子河右岸渡河作战此时终于实现了。

31 日下午 3 时，日军总司令部的参谋向第二军副参谋长发出电报：“整场战役之命运决定于近日之战斗，各军皆不能进，第四军及近卫师团为优势之敌所压迫，战况止于此。各军皆将命运赌在第二军之成功上，持续苦战奋斗。”由此观之，日军至此都处于苦战之中。但是 30 日深夜日军第一军渡河成功之后，俄军便准备下令后撤。库罗巴特金对日军的兵力估计过高，于 31 日午后得到日军第十二师团开始渡河的确切情报之后，认定左翼方面已不可能继续作战，于是发出了前日准备好的撤退命令。

在布设了地雷和铁丝网的防御阵地前苦战的第二军与第四军，接到第一军渡河的消息后群情振奋。其后，日军冒着猛烈的炮火不顾伤亡地持续前进，追击俄军。结果，俄军于 9 月 3 日撤离辽阳。不过，获胜的日军也没有余力追击败退的俄军了。

5 日军的问题

日俄双方都在辽阳会战中伤亡惨重。据日方战史记载，日军参

战的战斗人员有 13.45 万人，伤亡 23533 人；俄军参战的战斗人员有 22.46 万人，伤亡约 2 万人。

而美国的军事史家认为，辽阳会战的伤亡为日军 2.3 万人，俄军 1.6 万人。由于对辽阳会战起止时间的定义有所不同，伤亡数字自然有所差别。尽管如此，鉴于前述作战过程，抑或根据俄方战史，日方战史列出的俄军死伤人数很可能被高估了。另外，日方所统计的俄军战斗人员应当是其兵力最多时的数字。

无论如何，伤亡的增加对兵力居于劣势的日本，是关乎作战持续能力的问题。事实上，在辽阳会战开始前夕的 8 月中旬，日军已经在旅顺总攻中付出了 1.58 万人的伤亡代价。在旅顺与中国东北的战斗引起了补充兵力的问题。

9 月 16 日，满洲军参谋井口省吾起草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文件。井口认为，迄今为止的战斗旨在“使我掌握战略要点”，为此应当不计牺牲，迅速达成目的。但战争最终的目的是“歼灭敌军主力，以至不能复逞威力”。这样的作战与旨在掌握战略要点的作战不同，即使耗时较久也没有关系，“应当勉力减少损害”。因此，应当避免俄军擅长的作战方式，以俄军不擅长的方式作战。井口指出，俄军擅长构筑坚固阵地，使用机关枪作战，然而若在没有掩蔽的平原进行机动作战，则会苦于缺乏统一指挥。显然，井口对日军兵力的消耗抱有危机感。

按照日军领导层的估计，远东俄军的兵力若以日军编制计算，在 8 月底将会达到大约 20 个师团。要对抗这样的兵力，仅凭日军现有的 13 个师团显然是不够的。于是，日方首先采取的对策是在除第七师团之外的各师团中为每个步兵联队增设一个大队，为每个

骑兵联队增设一个中队。接下来又修订征兵令，将后备兵的服役年限从原来的 5 年延长为 10 年。进而参谋总长提出的增设四个师团的提议被接受，12 月决定增征相当于两个师团的人员，并以次年 5 月前能够出征的标准来进行训练。日方试图通过这些手段来增加兵力。

然而，满洲军的状态已经不容许等待这些措施发挥效果了。于是日方决定动用作为预备兵力留在国内的两个师团。首先在 9 月底决定让第八师团前往辽阳方面，进而又于 11 月决定将第七师团派往旅顺。这样一来，直到 1905 年 3 月新建的师团成军之前，日本国内完全处于没有预备兵力的状态。

而且日军的问题还不仅仅在于补充兵力，武器弹药不足的问题也浮出水面。日军曾经统计战争中枪炮弹药的消耗数量，制成表格。根据该表，日军步兵在鸭绿江之战中使用了 84 万余发子弹，而辽阳之战的弹药消耗量达到了这个数字的十倍。如果就每支步枪平均消耗的子弹而言，辽阳之战的消耗量也达到了鸭绿江之战的三倍以上。日军弹药消耗量的增加是从金州之战开始的。由此观之，个中原因可能是俄军自此开始真正应战。

日军领导层注意到金州之战后的枪炮弹药消耗数量超过了战前的预想，于是开始寻求对策。譬如，陆军当局 6 月指示东京与大阪的炮兵工厂增加产量，为此可以广泛利用官立与私立的工厂。而在 8 月的辽阳会战之前，大本营兵站总督部^①起草了“增加炮弹生产之提议”。其中表示对速射炮“必须准备每月每炮发射四百发，而

① 应为大本营兵站总监部。

以我方每月制造百发之现状，思之可堪寒心，弹药补给岂非立至匮乏”，提出从速在国内增设炮弹工厂，而在这些工厂开始运转之前“必须特约外国工厂制造，以应对作战之迅速进展”。

其他枪炮弹药的情况也与之相似。譬如，日方于8月28日决定让东京与大阪工厂每月制造野炮、山炮炮弹3000发，加上海军工厂与国外的产品，在次年3月之前造出115万发炮弹。

辽阳会战以后，这样的措置越发加快了进度。这是因为日方通过辽阳之战一决雌雄的打算落了空，认识到消耗大量弹药（包括武器）的战争仍将持续下去。

日军在中国东北的总司令官^①曾对各军司令官下达训示，禁止火炮的“滥射”。而陆军省决定，将东京与大阪炮兵工厂每月的产量提高为野炮、山炮炮弹12万发，同日还向阿姆斯特朗公司、凯伊诺克斯公司、金斯诺顿公司、诺贝尔公司等外国公司发出了炮弹的订单。于是，日方到9月下旬为止得到了24.5万发炮弹，其中2万发分配给旅顺的部队，其余拨归辽阳的部队。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部队是无法继续作战的。当然，对于其他弹药装备也采取了应急补给的对策。

日俄战争史研究的先驱大江志乃夫^②曾在1976年出版的著作中指出，在战时军需物资的生产与分配中，出现了民间工业的动员与粮食交售制度的萌芽等新鲜事物。他评价道，这场战争对于日本而言是“早熟的国家总体战，明确展示了国家总体战的若干端绪

① 指日军满洲军司令官大山岩。

② 日本近现代史学者，著有《日俄战争军事史研究》（岩波书店，1976）。

性的特征”。“总体战”这一概念虽然暧昧，但经济体量较小的日本在投入这场大规模战争的过程中，确实尝试着为了单一目标而将不够发达的国民经济加以组织化。

另外，俄国也苦于武器弹药的巨大消耗。不过，其军队与经济的规模本来便较日本为大，因此还没有到需要动员民间经济部门的程度。若说俄方的补给存在问题的话，那主要在于铁路运输能力的不足与社会组织能力的低下上。

陆与海的纽带

1 联合舰队

日俄两国军队在陆上殊死拼杀的同时，两国舰队则在海上展开神经战。这一时期日本最大的问题，在于旅顺港的太平洋舰队。对于在大陆作战的日本陆军来说，这自然是一大问题。但是若从战争全局来考虑，对日本而言更加可怕的剧本是俄国舰队仍留在旅顺港，而从欧洲方面出动的另一支俄国舰队抵达太平洋。果真如此，日本联合舰队将会陷入被敌舰队前后夹击的局面，很有可能丧失制海权。

于是，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认为，有必要将太平洋舰队封锁在旅顺，使其无法展开行动。无论是成功率极低的旅顺港堵塞作战，还是驶近要塞化的旅顺港以舰炮射击港内俄舰，都是出于这一目的。但是，俄方也频繁出动鱼雷艇，并从港内猛烈炮击来对抗日方的攻势。因此，联合舰队的作战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在封锁作战仍在继续的1904年4月中旬，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被日方布设的水雷炸沉，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马卡罗夫战死。马卡罗夫是俄军司令官中少有的凭借实力一路晋升上来的人物，3月刚刚背负着俄方的期待到达旅顺。他的死是对俄方的重

大打击。不过到了5月中旬，轮到日本战列舰“初濑”和“八岛”被俄方布设的水雷炸沉。对于正在准备迎接大规模海战、一艘主力舰也不愿失去的日方来说，这是极大的打击。

在此期间，驻扎海参崴的俄国小舰队不断地在日本沿岸袭击运输船，可以说是实施了海上游击战。不过，俄国小舰队并没有取得干扰日本物资运输的成果。仅凭4艘巡洋舰^①，也没有起到牵制联合舰队的作用。日方由上村彦之丞指挥的第二舰队负责追踪这支小舰队，海军主力则全力对付旅顺港的太平洋舰队。

在这种情况下，海军军令部长与次长于7月12日拜访大本营陆军部，向参谋总长与次长出示了东乡平八郎发给军令部长的电报。电文明确展示了东乡当时的想法：

旅顺之敌舰队如今正在努力修理舰船，亦有脱离我军监视，于外海布设机械水雷之形迹，是故我军海上之监视日渐困难。……倘若旅顺港之敌修理完毕恢复战力，反之我舰船战力则逐渐削弱，单是对抗旅顺之敌舰队已失彼我海上之平衡，全局作战实不堪忧虑。目下情报所言波罗的海舰队东航若属确实，我舰队不得不大部撤回国内，加以必要修理。舰艇大部入坞后已过六个月，上漆及修理需一个半月。是故确认波罗的海舰队东航之时，若不在相当之时机将我舰艇撤出本方面^②，则无法完成对抗该舰队之准备。……以此情形，刻下我作战上之

① 即海参崴分舰队的装甲巡洋舰“俄罗斯”“格罗姆鲍伊”“留里克”和防护巡洋舰“壮士”。

② 指旅顺附近。

最大急务，在于早日攻下旅顺，保证登陆军后方安全，我舰队亦将击破敌舰队，完成对抗新来敌舰之准备。

可见，东乡平八郎由于担心波罗的海舰队到来，希望陆军方面尽早攻下旅顺。其后召开的陆海军高级幕僚会议采纳了东乡的意见，决定从速攻陷旅顺。或许是因为理解到了这一作战的重要性，陆军方面对此并没有什么抗拒。从后来的经过看，也有可能是陆军对攻陷旅顺要塞这一任务过于轻视，于是轻易地接受了海军的请求。

姑且不论这一问题，8月初海上发生了一次重要事件。俄方命令旅顺港的太平洋舰队强行出击，驶向海参崴。而海参崴的小舰队也做出策应，前往釜山海面迎接。

然而，8月10日早晨出港的太平洋舰队于当天中午被联合舰队截住，在旅顺港东南海面爆发了海战。不过，东乡平八郎司令长官当时未能把握俄方的动向，太平洋舰队得以逃走。尽管如此，联合舰队到晚间还是在黄海海面追上了俄国舰队，击伤旗舰“策萨列维奇”。在这次黄海海战中，尽管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维特格夫特（Wilhelm Karlovich Vitgeft）战死，舰船四处逃散，但没有一艘被击沉。于是，联合舰队分头追击俄国军舰。结果，逃入中立国港内的俄国舰船都在当地被解除武装。另外，也有俄舰逃到库页岛（萨哈林岛）^①附近，在那里自沉。不过，仍有包括4艘战列舰在内的10艘俄国舰船驶回旅顺港。

另外，当时前来迎接主力的海参崴小舰队的3艘巡洋舰，于

^① 日本称为桦太。

14 日早晨在朝鲜半岛南岸的蔚山海面与守候在那里的上村彦之丞舰队交战。海战的结果是一艘俄舰被击沉，另两艘也受伤颇重。于是，海参崴的小舰队事实上已经被消灭了。

从作战结果来看，日方大获全胜，但东乡平八郎对此是不满意的。残留在旅顺的 10 艘俄舰，仍然是危险的存在。其实，俄方领导层已经不再打算让返回港内的舰队前往海参崴，而是将舰炮卸下安在陆上，加强旅顺的防御。不过，东乡并不知道这一情况。他仍然盘算着在下一次海战中歼灭太平洋舰队。

2 波罗的海舰队

与东乡的想法不同，8 月海战的结果给俄方带来了很大冲击。在马卡罗夫战死的 4 月中旬，俄国领导层已决定从波罗的海舰队抽调兵力组织第二太平洋舰队，前往太平洋。不过，由于俄方对太平洋舰队自行突破日方的封锁多少有所期待，这一决定迟迟未能付诸实施。俄国海军的首脑中，恐怕颇有些人对于从欧洲向亚洲派出大舰队的行动抱有不安。

如果俄方像东乡担心的那样，开战之后立即向太平洋派遣哪怕几艘军舰，分散联合舰队的力量，那么战况应当会变得不一样。然而，在二流海军国家俄国，即使要执行这种程度的决定，也找不到拥有足够自信与经验的指挥官。

到了 8 月 23 日，沙皇终于召开御前会议，讨论黄海海战后的措置。与会者大多认为，第二太平洋舰队刚刚编成，准备不够充分，不应仓促出动。也有人认为，比起从欧洲远道派出舰队，不如

将原本预定由智利和阿根廷购买的巡洋舰派往旅顺，增强太平洋舰队的实力。

强烈反驳这些意见的，是被任命为第二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罗热斯特文斯基（Zinovij Petrovich Rozhestvenski）海军少将。他指出，如果行动延期，那么就要遣散好不容易为沿途补给而集中的外国船只^①，下次派遣舰队将会产生困难。

这一主张与派遣的目的和成本无关，纯粹是从战术角度出发，看起来有些奇妙。不过就大方向而言，有必要援救处于困境中的旅顺与太平洋舰队这一意见，是任何与会者都无法反对的。于是，会议决定秋天派出第二太平洋舰队，在马达加斯加与预定由智利和阿根廷购买的巡洋舰会合。据当时估算，第二太平洋舰队将在1905年3月抵达战场。

罗热斯特文斯基曾参加俄土战争，担任过驻伦敦武官，在海军中是备受瞩目的人物。如果连他的见识与舰队指挥能力也被怀疑，那么在俄国海军中恐怕再也找不出司令官的合适人选了。

8月的御前会议之后，第二太平洋舰队的派遣准备终于开始付诸实施。然而，由于编成太迟，舰队连一次演习都没有进行过。舰员则从各种舰船上抽调前来。而且由于编入了较旧的舰船，增添新式装备需要花费时间。因此，实弹射击训练也是聊胜于无。一言以蔽之，第二太平洋舰队在出发前进行的战斗准备是不充分的。

无论如何，到了10月15日，第二太平洋舰队终于从利巴瓦

^① 俄国在第二太平洋舰队出发前曾向德国租用若干运煤船，用于沿途补给。

港^①出发了。其阵容如下：旗舰“苏沃洛夫”号，排水量 13516 吨，航速 18 节，是新建成的战列舰。三艘同型舰“博罗季诺”“亚历山大三世”“鹰”也被编入舰队。其次是战列舰“奥斯利亚比亚”“伟大的西索伊”“纳瓦里诺”。这三舰建造于 1891 ~ 1898 年，排水量略小，航速也较低。

至于巡洋舰，则有“纳希莫夫”“金刚石”“阿芙乐尔”“斯维特拉娜”“珍珠”“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另外，航行途中又有海军上校多布洛沃斯基率领的几艘巡洋舰加入。除此之外，还有装甲海防舰、驱逐舰和运输船（准备从智利和阿根廷购买的巡洋舰最终未能到手）。

由此可见，第二太平洋舰队的阵容相当雄厚。然而，途中没有一个基地可供舰船与乘员休息，使得舰队航行倍加困难。只有在不妨害中立国的前提下，俄国舰队才能够入港停泊，装载补给。于是，对长途航行来说必不可少的舰船修理也无法称心如意。摆在罗热斯特文斯基面前的课题是非常严峻的。

第二太平洋舰队被种种问题所缠绕，英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对于海战也具有很大的意义。无论是俄国的盟国法国，还是对俄国较为友好的德国，在海上都无法发挥英国那样的作用。俄舰的乘员不得不意识到号称海上霸主的英国的存在。10 月 22 日在北海的多格尔沙洲海面，俄国舰队将英国渔船误认作日本鱼雷艇加以炮击，正是这种心理的体现。

这一事件起初被认为可能引发战争，但英方并不认为有多么严

^① 波罗的海东部港口，今名利耶帕亚，属拉脱维亚。

重，于是一周后便得以解决，第二太平洋舰队继续航行。在法国的殖民地摩洛哥，舰队兵分两路：包括“苏沃洛夫”在内的主要舰只由于无法通过苏伊士运河，只得从非洲大陆西海岸绕行。到了12月，这一队俄舰终于经由好望角到达马达加斯加。在那里，罗热斯特文斯基需要再度思考今后的行动。

3 要塞战

在此之前的8月19日至24日，俄方取得了这场战争中的第一次胜利：完全击退日军第三军对旅顺仓促发动的攻势。

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中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①与俄土战争（1877~1878）中的普列夫那要塞^②，都证明要塞战拥有足以决定战争走向的重要意义。在要塞战中，占据要塞意味着控制地利，能够左右此后战斗的胜负。不仅如此，要塞战往往具有代表性战斗的意义，其中的攻防对两军的士气有很大影响。当时的日军对此还不甚理解。

在日方的战史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日军进攻旅顺要塞准备不足的是《机密日俄战史》。该书原是1920年代在陆军大学校任教官的谷寿夫为挑选出来的极少数学生讲授战史的讲义汇编。在该书中，谷寿夫尖锐地批评道，日方对要塞战术的研究“较之俄方远

① 塞瓦斯托波尔攻防战是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主要战役。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在坚守349天之后被英法联军攻陷，导致俄军在克里米亚半岛全线溃败。

② 普列夫那在今保加利亚境内，土军曾在此与俄军相持四个多月。该地陷落后的两天，土方即向列强请求调停。

为幼稚，要塞炮兵科首脑军官仅了解此种程度而已”。

这样的见解，从《明治卅七八年战役陆军政史》的记载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该书在二战结束前一直处于保密状态。其中有如下内容：

八月二十九日 本月二十一日对旅顺要塞之总攻击未能奏功，死伤颇多，遂决定于采取正面攻击之同时，将箱崎炮台撤去之二十八厘米榴弹炮六门运往大连湾，以之炮击旅顺。为运输之故，令运输船于九月一日左右向横须贺返航。

该书还记载，寺内陆军大臣在攻击旅顺之前曾就“运用如二十八厘米榴弹炮之大口径炮为得策”这一观点向参谋次长征求意见，而“当时参谋本部之议论，一致以为以中小口径火炮炮击之后加以强袭，当可攻陷旅顺要塞，陆军一般意向亦概在于此”。

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一再突击，结果便造成日军在 8 月的第一次总攻中伤亡了 5.7 万人中的 1.58 万人。俄方战史则记载，日军伤亡近 2 万人，原因在于“围城部队战斗力低下”，“当时使用的攻城炮威力不强，无法奈何混凝土建筑物”。

前文提到的“二十八厘米榴弹炮”，是为海岸防卫而设计的，从这一时期开始转而用于攻击要塞。首先，镇海湾要塞装备的该型火炮于 9 月底被移交给第三军，开始发挥它们的威力。10 月以后，日本各地要塞的同型火炮以及弹药、炮床等被送往旅顺，相继布设起来。于是，最终有 18 门炮用于旅顺作战。

尽管如此，用混凝土修建的旅顺要塞仍然不是日军能够轻易攻下的。使用二十八厘米榴弹炮之前，日军已在 9 月 19~23 日的攻

击中付出了 4700 ~ 4800 人的伤亡。

日军 10 月 26 ~ 31 日的总攻也以失败告终，伤亡 3830 人。第三军参谋长在报告中写道，二十八厘米榴弹炮虽然破坏了一部分堡垒，但对主要工事的效果并不好。而俄方战史分析道，该炮的效果实际上相当显著，但因为日军没有充分破坏堑壕侧面与连接堑壕的工事便展开突击，结果遭到了失败。从战况来看，后者的说法更接近事实。

攻击旅顺的失败让日本海军领导层感到棘手。11 月初，大本营海军部预测，“罗热斯特文斯基所率主力舰队，将于十二月中旬在马达加斯加岛附近集合后驶向马来群岛附近，至迟明年一月上旬可到台湾海峡附近”。为了修理联合舰队的舰艇以便对抗俄舰，最晚应在俄舰到达的两个月前中止对旅顺的海上封锁。

也就是说，海军方面认为对旅顺的封锁应在 12 月上旬停止。为此，大本营向满洲军总司令部询问能否迅速攻下旅顺，如果旅顺在短期之内无法攻陷，第三军能否用二十八厘米榴弹炮“首先破坏敌舰”。也就是说，应否突然炮击旅顺港内的俄国舰船而非旅顺要塞。

围绕着同样的问题，当时东乡平八郎司令长官与第三军的乃木希典司令官也在频频交换意见。双方在“首先破坏敌舰”这一点上意见一致。不过，第三军的上级满洲军总司令部决定首先攻下旅顺，因此主张将二十八厘米榴弹炮全部用于攻击要塞。结果，为了解决这样的意见分歧，11 月 14 日反常地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会上决定的方针是，为了“首先破坏敌舰”应当攻下俯瞰旅顺港的 203 高地。

日军领导层全体参与到围绕旅顺攻坚战之争论当中，是因为认识到即将来临的海战会决定战争全局的胜负。为了在这场海战中取胜，日本希望尽快歼灭旅顺舰队。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陆军从高地炮击旅顺港，陆军为此也需要海军的协助。于是，海上与陆上的战斗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

4 沙河会战

在旅顺的攻防战持续进行的同时，东北的战斗也在继续。到了这一时期，俄方终于取得了战争的主导权。由于日军并没有追击从辽阳败退的俄军，加之战后的补充让俄军得以喘息，俄军领导层忽然又恢复了战意。库罗巴特金于 10 月 2 日宣称，如今轮到俄军发动攻势了。事实上，俄军约有 19.5 万人，而与之对抗的日军则有 13.1 万人，兵力对比明显是俄方占优（苏联时代的俄国史学者认为，俄军有 19.4 万人，日军有 17 万人）。

沙河是汇入太子河的一条小河。这一地名指的是这条河流与南北走向的南满铁路交叉处偏南的地方。俄军为了洗雪辽阳之战的耻辱，准备将在辽阳北方布阵的日军逐回太子河左岸。

在地形方面重要的一点在于，铁路将日俄两军分隔在东西两侧，而战斗最为激烈的铁路东侧是山谷地带，两军不易自由行动。已经进至没有地图可用的地方的日军自不必待言，俄军手里也没有关于这一带山谷的地图。而且俄军在铁路东侧集中了比西侧更多的兵力。因此，胜负未必完全由兵力与魄力决出。库罗巴特金选择东面为攻击地点，是因为他最依赖的部队部署在奉天以东。

日军没有充分补充辽阳之战中消耗的弹药，一时未定应对俄军南下的方策。鉴于迄今为止俄军体现出来的孱弱，日军是希望采取攻势的。然而，考虑到补给方面的不足，恐怕不得不采取守势。时至10月7日下午，日军司令部终于发出了“务必集结兵力，确保随时皆可转入攻势”的含糊命令。由此，日军全军终于集结在太子河右岸，第四军部署在中心地区罗大台，东面为第一军，西面为第二军。

俄军于10月5日从抚顺方面向日军第一军的东侧进击，但由于态度极为慎重，反复进行侦察，前进速度非常缓慢。根据俄方战史的分析，俄军的迟缓给了日军采取对策的时间。

俄军西路军的行动更加不彻底。司令官比尔德林（Alexander Alexandrovich Bilderling）原本的任务是向日军施加压力，策应东路军的进攻。但西路军做出的行动仅仅是沿铁路略微南下，随即便按兵不动。这并不是库罗巴特金所设想的威胁行动。

日方得知俄军开始攻击是在8日晚间。按日方的理解，当时俄军开始攻击日军部署位置最东端的本溪湖。日方战史认为沙河会战从此时开始。

日军遭到俄军进攻之后，于9日晚间决意次日开始转入攻势。结果，从10日起，各地展开了真正的战斗。第一军的右翼当日遭到了俄军持续不休的攻击，到了11日，战况越发激烈。对双方而言，战局都相当严峻。然而，负责俄军攻势的东路军司令官施塔克尔贝格（Georg von Stackelberg）于11日认定自己发动的攻势即使持续下去也没有胜算，擅自下令后撤，致使日军在全线占据优势。由此，日军得到了夺取东路主导权的机会。

时至12日，俄军西路军在日军第二军的进逼下开始后退。俄

方于是担心，日军第一军会从俄军东路军与西路军之间的空隙穿插进去，将俄军分割成两半。而由于俄军拥有庞大的预备队，日军也不敢贸然突进。于是，在日军总体上占优势的情况下，双方在各处持续着拉锯战。

日方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意见：在炮兵的射击技术与步炮协同水平上，日本较之俄国有着一日之长，这决定了此次作战的胜负。被送上战场的俄国士兵没有接受足够的战斗训练，或许也对战局产生了影响。俄国士兵从各地来到战场之后立即投入战斗，缺乏炮兵与步兵协同作战的经验。

不过，对这场会战的走向影响最大的是俄军整体协调性的低下。库罗巴特金尽管希望全军统一行动，但缺乏这样的能力。反观日方，日军总司令部将第四军中动作迟钝的第五师团改为预备队，行动果断，指挥系统未曾出现混乱。

时至 17 日，日军逼近沙河左岸，渐占上风。根据日方战史，日军截至 20 日的伤亡达到了 20497 人。俄方战史则记载，俄军的伤亡与失踪人数合计 40769 人。显然，处于攻势的俄军付出了更大的损失。

沙河会战的确以遏制俄军攻势的日军获胜而告终，但日军也没有追击敌军的能力。16 日下午 6 时左右，满洲军总司令部收到了参谋总长山县有朋发来的如下电报（顺便应该提到，大山岩于 6 月转任满洲军总司令官之后，山县继任了他的职位）：

第二次编成之后备队不至来年二月左右无法出战，新设诸队须至五月以后。野、山炮弹药之补给不至十二月之后亦不能

如意。

简而言之，山县要求满洲军总司令部了解，由于兵员与弹药不足难以追击俄军。如果战争继续下去，日军即使取得作战胜利，也不得不停顿下来准备下次作战。

5 旅顺的陷落

沙河会战结束后，日俄双方都在努力恢复战斗力。俄方由于无法立即展开总攻，便计划动用未曾在沙河出场的骑兵部队，切断日军的补给线。另外，满洲军总司令部中也有人主张利用沙河的地形再度展开攻势。但是东京的大本营没有同意这一方案。当时，大本营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旅顺。

11月19日，山县有朋参谋总长向第三军乃木希典司令官发出了以下电文：

已收到满洲军总司令官拟令第三军占领望台一带高地的通知。“此举当神速果敢，使敌军无抵抗之余地。若再不成功了结，因弹药等关系，尔后徐图再举之机不易得来。北方彼我均势渐失，波罗的海舰队东航益急，十二月上旬以后我海军为准备对抗新来敌舰，不得已撤回封锁舰艇之大部分时，敌军再度恢复海上交通，输入弹药粮食，攻城则将愈发困难，大连湾之防备亦有危险。如今旅顺之攻势，实乃只争朝夕。或成或否，信为陆海作战利弊之所在，国家安危之所在。仰见老兄苦心所

在，敬祝贵体安康，敢闻腹心，以待高见。”（另外，关于这份电报有两种相似的文字传世。）

由此可见，山县要求乃木无论如何也要成功攻下旅顺。这份电报的行文，现在看来过于冷酷无情，但山县也许把它看作打气鼓劲。

于是，到了 11 月 26 日早晨，日军的攻城炮在旅顺要塞东侧开火了。几个小时后，突击作战开始。日军的攻击夜以继日，持续不停。然而，俄军守备部队也拼死据守，一一将其击退。有鉴于此，第三军司令部将攻击目标集中在俯瞰旅顺港的 203 高地上。这一攻击从 27 日早晨开始。

但是，俄方从 5 月起便认识到了 203 高地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因此使用了鹿砦（围绕在阵地周围的障碍物）、深壕、隐蔽射击孔、铁丝网、交通壕等诸多手段来加强该地的防御。要夺取 203 高地是极为困难的。日军采取了对壕作业^①，并集中使用二十八厘米榴弹炮，反复发动突击。刚刚到达旅顺的第七师团也投入进攻。付出巨大伤亡而未能攻克 203 高地，使得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按捺不住，从辽阳以北的烟台^②前来旅顺指挥作战。结果，日军 12 月 5 日终于攻占 203 高地。

日军立即在山顶设置了观测所，根据观测结果用二十八厘米榴弹炮射击旅顺港内的俄国舰船。持续四天的炮击之后，港内的残余舰船一一被破坏。有人怀疑二十八厘米榴弹炮能否击穿俄国

① 即对着敌方坚固工事隐蔽地挖掘壕沟的作业，旨在掩护己方军队突然发起冲击。

② 即今辽宁省灯塔市烟台街道。

舰船厚重的装甲，但这样的议论并没有什么意义。当时，日军对二十八厘米榴弹炮的期望是让港内的舰船无法战斗。从这一点来说，203高地的炮击取得了极大的成果。战列舰“波尔塔瓦”、“列特维尊”、“佩列斯维特”、巡洋舰“帕拉达”等舰或被击沉，或舰身倾斜无法航行。只有战列舰“塞瓦斯托波尔”驶出港外，试图杀出一条血路。该舰接连与日本舰队交战，最终于16日被击沉。^①

20日东乡平八郎会见了乃木希典。次日他报告大本营，旅顺封锁作战已经告终。联合舰队得到了第三军的帮助，又利用了波罗的海舰队缓慢的航行，有了足够的时间准备接下来的大海战。

另外，12月5日203高地的陷落对旅顺守军而言是一大冲击。军港一失，就等于旅顺丧失了要塞的功能。旅顺要塞的攻防战继续持续下去，是因为它的命运对两国国民而言具有象征意义。因此，5日之后战斗仍在继续。

12月中旬，旅顺的俄军战斗人员共有1.35万~1.4万人（包括水兵）。由于长期作战与缺乏粮食，守军极度疲劳，并且出现了大量坏血病患者。15日，一直激励守军投入防御战的康德拉琴科（Roman Isidorovich Kondratenko）中将^②战死，他是在讨论防御方针时中炮身亡的。这进一步打击了俄军的士气。

18日，日军在东鸡冠山的北堡垒正下方挖掘坑道埋设炸药，

① 该舰并未突围，而是为躲避203高地的炮击从旅顺西港转移到距外海较近的白狼湾，在该处遭到日本鱼雷艇的持续偷袭，12月15日夜间中雷，无法出海作战，次年1月2日因旅顺守军投降自沉。

② 时任俄军东西伯利亚第七步兵师师长，被称为旅顺守军的灵魂人物。

破坏了堡垒的胸墙。俄军试图填埋炸出的大洞，但日军猛烈的炮击阻止了这一行动。于是，此处被日军占领。根据俄方战史，当天日军损失 800 余人，俄军损失 300 余人。

随后，日军尝试爆破俄方所谓的第 11 号堡垒（日方称为二龙山堡垒），但因为地质构造是岩床而未能成功。不过，日军 28 日终于将其破坏，让突击队冲入，俄军试图将其击退，但被日军的机关枪压制。

在这种情况下，要塞司令官斯特塞尔（Anatolii Mikhailovich Stoessel）于 29 日召开了防卫会议。不过，与会者主张继续作战。31 日，日方称为“松树山”的堡垒遭到爆破；其后，日军未经苦战便夺取了这座堡垒。之后各处战斗仍在继续，但斯特塞尔认为胜负已定，1 月 1 日向日军派出军使请求投降，并于次日在水师营签署了投降书。

苏联时代的俄方战史写道，这次投降是斯特塞尔及其幕僚的叛变行为，守卫旅顺要塞的士兵并没有投降的打算。如果拿出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勇气，还是可以继续作战的。无论弹药还是粮食，也都还有富余。然而，这种解释应当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拥有二战经验的俄国人的观点。日俄战争时代的俄军，并不会像苏联时代那样将被俘看作不可接受的耻辱。

根据日方战史，从第一次总攻的 7 月 31 日至俄军投降当日，日军约有 13 万人参战，其中伤亡 5.9 万人。俄方战史没有交代这一时期的伤亡，但记载俄方自 2 月开战以来在旅顺攻防战中伤亡、失踪 31295 人，另有 3000 余人病死，而日军伤亡约 10 万人。作为一场大消耗战，旅顺攻防战可以说是日俄战争的

浓缩体现。

看似固若金汤的旅顺要塞陷落之后，战况明显对日本有利。第二太平洋舰队不得不选择直奔海参崴抑或直接与联合舰队交战。从战术方面考虑，后者是俄国舰队极不希望见到的。然而，若要避免这一情况，就需要巧妙地掩饰己方的航向。

1 两种国际关系

随着战争的持续，围绕日俄两国的国际关系也产生了较大的变化。欧美诸国原本很少有人认为日本能够在与俄国的交战中打平甚至获胜。譬如，战争爆发时前往美国募集外债的高桥是清（日本银行副总裁）在回忆录中写道，那里对战争的看法是“胆大包天的孩童挑战力大无穷的巨人”。至于与俄国结盟的法国，其外交部长德尔卡赛（Théophile Delcassé）直到开战前夕还认为亚洲新兴国家日本不会挑战欧洲大国俄国，试图达成日俄两国的和解。英国的外交专家也在讨论，一旦战况对日本不利，应采取怎样的对策。

就在日本被认定为形势不利的同时，其领导人正在一步步巩固本国的地位。1904年2月23日，日本与朝鲜签订议定书。其中规定，日本保证朝鲜的独立与领土完整，在第三国（指俄国）的侵害或内乱导致“大韩帝国之皇室安宁或领土完整有危险之虞时，大日本帝国政府可速取临机必要之措置。大韩帝国政府为使大日本帝国政府易于采取以上行动，予以充分之便宜”。由此，日本使朝鲜成为自己的盟国，取得了在该国领土上的军事行动权。如前所

述，日本此前已经派出相当规模的军队在朝鲜登陆，但日本政府对此没有做出像样的说明。

日本对中国采取的对策则远为圆熟。开战之前，小村外交大臣等人曾经讨论过是让中国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参加对俄作战，还是使之保持中立。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让中国参战，则会影响欧美诸国，给它们介入的机会，因此还是让中国保持中立为好。于是日本政府开始劝说清政府发布中立宣言，并在清政府2月12日宣告中立之后继续促其始终保持中立。考虑到欧美诸国当中存在怀疑日本人将与中国人携手对抗俄国人的“黄祸论”，这种原则性的对策有助于让欧美诸国理解日本的立场。

比起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俄方的外交并没有如此深思熟虑。俄国驻朝使节只是抗议日本单方面向朝鲜施加影响力，但未曾采取妨害日本行动的具体措施。至于中国，俄军占领中国东北本来就是战争的导火索，俄国自然无法像日本那样向清政府要求保持对本国友好的中立。正因为如此，俄国政府一直怀疑清政府没有严格保持中立，而是秘密支援日本（日本的确利用了东北的马贼，但他们不能代表清政府）。在这一方面，无论是俄国政府还是驻在中国东北的俄军，基本上都没有努力争取清政府与当地居民的好感。

俄国政府的行动不只在东亚是稚拙的，在欧洲也是如此。在这里给俄国人一记痛击的，是英国与法国在4月8日签署的协定。这一协定将摩洛哥与埃及联系起来，规定前者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后者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以图改善两国的关系。

在日俄战争如火如荼之时，俄国最希望达成的国际格局就是像

甲午战后的“三国干涉还辽”那样，与法、德两国联手对抗日本。然而，英法协定是以德国为首的国际组织^①所催生的。其后围绕着摩洛哥问题，德国与法国的矛盾加深，想要还原“三国干涉还辽”时的国际格局是难以办到的。

不止如此，在俄国看来，英法协定明白地表示作为当时俄国外交基础的俄法同盟无法用来对抗日英同盟。对俄国而言，英法协定意味着本国的盟国（法国）与敌国（日本）的盟国（英国）建立了友好关系。法国虽然帮助俄国发行了用于筹集军费的国债，但越来越顾虑与英国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能够指望法国的只有用它的殖民地为第二太平洋舰队提供停靠、补给、修理等便利而已。不过，尼古拉二世鉴于法国没有向俄国提供足够的援助，便开始接近德国。这种情绪化的反应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德国政府于 10 月底向俄方提出旨在对抗英国的德俄同盟方案之后，他立即希望让法国加入，回到最初的构想上。不过，到了 1904 年底，这已经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俄法同盟内容单薄，俄德同盟方案则是空中楼阁。

综上所述，无论是东亚的国际关系还是欧洲的国际关系，俄国在外交上的轻虑浅谋都无法制造有利于战争的国际局势，与在欧美诸国面前作为新兴国家恰如其分地活动、在东亚为本国巩固地位与增强影响的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情形，到了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有着很大的影响。

^① 指德国、奥匈帝国与意大利 1882 年缔结的三国同盟。

2 俄国国内的混乱

1904年秋天以后，尼古拉二世在国内也开始直面种种棘手的问题。从中国东北传来坏消息之后，不仅是军方，政治领导层也遭到了指责。由于沙皇9月任命的内政大臣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Pyotr Danilovich Svzatopolk-Mirsky）采取了自由主义政策，追究责任的声音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尼古拉二世破格起用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物，反而加剧了对体制的批判。

在这种情况下最先有所动作的，是诸如波兰等位于俄罗斯帝国边缘区域的人们。在这些地方，出现了乐见俄国败北消息的风气。

对体制更大的打击，在于文化人士以及以地方自治组织为据点的地方实力者开始追究政府的责任。他们抨击政治与军事领导层的无能，要求其听取自己的意见。他们主张，让俄国实行立宪体制，在政治权力与社会关系上向欧美诸国看齐。由于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多数民众需要为国家奔赴战场，这种民主化的要求容易得到社会的支持。于是，文化人士与地方实力者半公开地召开集会，讨论政治问题。

进而，首都的学生也开始行动了。时至12月，他们在圣彼得堡的主要街道上举行了游行。游行中打出的标语有“结束战争”“打倒专制”等。游行的参加者并不多，但当局出动了骑警进行镇压。然而学生批判政府的态度并没有因此减弱。

就在政治情绪如此高涨的时候，旅顺陷落的消息传来了，人们对领导层无能的反感越发强烈。对政治体制的不满扩散开来，使得社会很不安定。正在这时，首都的工厂有几名从事工运活动的工人

被开除，这在首都引发了一万数千名工人参加的罢工。维护工人权利这一单纯的要求得到了呼应，罢工的参加者进一步增加了。

在这一动向扩大的过程中，人们于 1905 年 1 月 22 日这个星期日团结在东正教神甫迦包纳（Georgy Apollonovich Gapon）^① 周围，为了向沙皇请愿而朝着冬宫行进。到了这时，他们的诉求已经不仅是改善劳动条件，还包括获得政治权利。数万人的游行使得政府狼狈不堪。虽然政府出动军队企图弹压，但并不容易得逞。结果，队伍行至冬宫广场之时，被步兵的射击和骑兵的冲击粉碎。这就是所谓的“流血星期日”事件。

向沙皇求救的人们遭到军队枪杀的消息迅速传遍整个俄国，罢工继续扩大。为了压制民情，当局频频出动警察入室搜查，逮捕不满分子。首都的工厂不到一周便重新开工，但批判体制的声音在国内处处皆有支持者。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无法指望国民支持战争，希望结束战争的声浪渐渐高涨。

3 虎头蛇尾的反攻

无论是俄国的国际困境还是国内混乱，都没有给在中国东北旷野迎来冬天的日俄两军带来影响。两国军队在动辄低于 -15℃ 的严寒中挖掘堑壕，固守对峙。由于缺少合适的住房，两军士兵都过着挖洞栖身、烧柴取暖的日子。在这种情况下，日军满洲军总司令部

① 他曾在俄国警方授意下从事“警察社会主义”式的工会活动。“流血星期日”后流亡国外，与包括列宁在内的革命组织者有所接触。于 1905 年沙皇颁布“十月宣言”后回国，次年因为与警方的关系被社会革命党成员杀死。

决定次年雪融时再行决战，缓下了节奏。

然而，俄军期待着一雪前耻。尤其是基本没有参加沙河会战的骑兵部队的指挥官主张，袭击日军后方的铁路可以阻碍第三军从旅顺北上。铁路西侧地形平坦，也有利于骑兵行动。于是，米什琴科（Pavel Ivanovich Mishchenko）^①将军率领的大股骑兵部队在1月初潜行南下，于12日袭击了营口周边的铁路与仓库。不过，他们破坏的铁路随即被日军修理完好。这一作战虽然出人意料，但并没有取得太多实质性的战果。

俄军的反攻没有就此结束。从西面运来的部队与物资陆续集中到奉天，兵力增加到了25万余人的规模。生力军的到来，使俄方领导层催促进攻。于是，库罗巴特金将增加的兵力编为左翼的第一集团军、中央的第三集团军和右翼的第二集团军，制订了攻击计划。本次计划规定，首先由格里彭伯格（Oskar Ferdinand Gripenberg）将军指挥的第二集团军夺取位于日军左翼中心位置的沈旦堡（俄方称为桑德普），其后由第一集团军与第三集团军在各自方面发动攻击。

大山岩和儿玉源太郎的总司令部完全误读了俄军的动向。1月24日俄军渡过浑河发起攻势之后，他们判断俄军的兵力有大约两个师，于是派出第八师团前去迎击。然而，俄军仅步兵便有9万余人，一个师团根本无法与之抗衡。于是，俄军于25日夜间占领黑沟台。另外，俄军也过高地估计了东面秋山好古^②少将所部的实力，进攻相当慎重。于是，俄军从黑沟台向沈旦堡方向缓慢前进，

① 时任扎卡斯皮哥萨克旅旅长，同年2月17日升任外贝加尔哥萨克师师长。

② 时任骑兵第一旅团长，指挥以骑兵第一旅团为基础编成的“秋山支队”。

招致前来增援的日军的反攻。

根据俄军的计划，第二集团军占领沈旦堡后才能展开接下来的作战，但第三集团军和第一集团军并没有积极策应第二集团军的行动。结果，日军满洲军总司令部有了足够的时间在左翼集结第五、第三与第二师团。对于俄军而言，这样的协作失当是一道致命伤。

即使如此，当下的战斗也与以往有异，日军没有立即取得胜利。在这一方向上，两军持续了三天的激烈交战。27 日，俄军一度占领苏麻堡，看似有望夺取该地东北的沈旦堡。但日军发动猛烈反击，夺回了这一据点。结果，库罗巴特金于 28 日夜间用电话向第二集团军司令部下令撤退。于是，俄军没有取得任何战果便退回了攻击开始前的地点。

根据日方战史，日方参加此次战役的战斗人员约有 5.4 万人，俄方则有 10.5 万人。至于伤亡，日方约有 9300 人，俄方约有 1.2 万人。俄方战史对伤亡数字的记载大体一致。此次失败之后，俄军内部由于将领互相推卸责任而出现纷争。最终，第二集团军司令官格里彭伯格提出辞呈，离开了前线。这种情况与俄国国内的混乱结合起来，削弱了俄军的斗志。

4 奉天会战

日军在黑沟台遭到俄军反攻之前，满洲军总司令部已经决定提前与俄军决战。1 月底击退俄军的反攻之后，满洲军总司令部开始具体筹划这一决战。考虑到俄军士气低落而日军兵力增加，日方希望早日决战。

在国际方面，由于旅顺陷落的消息，日俄议和的可能性在各地议论纷纷。迄今为止一直对战争态度暧昧的德皇威廉二世，1月中旬向扮演中间人角色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缔结不包括日本领土要求的议和条约。尼古拉二世本来不会理会这样的议论，但鉴于欧美诸国已经认为战况对日本有利，故而开始讨论俄国能够接受的议和条件。

满洲军总司令部于2月20日召集各军司令官，宣称下一场会战将是“日俄战争的关原”^①。由于俄军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必将殊死拼搏，总司令部也下达了若干具体指示，诸如应注意侦察、各军应全力以赴、炮击应力求准确，等等。

支撑日军进攻计划的要素，第一点是兵力的雄厚。当时日军的部署，最右翼为1月编成的鸭绿江军，川村景明任司令官；最左翼为旅顺陷落后北上重新编成的第三军；中央西侧为第二军；中央为第四军；中央东侧为第一军，总兵力25万人，火炮992门，机关枪268挺。

根据苏联时代的战史，与之对峙的俄军右翼（奉天西面）为步、骑兵9.17万人的第二集团军，中央为步、骑兵6.07万人的第三集团军，左翼（奉天东面）为步、骑兵10.65万人的第一集团军，右翼背后有大约7000名骑兵，左翼背后有大约8000名步兵，奉天南面还有预备队。总兵力有步、骑兵29.23万人，火炮1386门，机关枪56挺。

① 1600年的关原会战是宣告日本战国时代结束、德川家康统一全国的决定性战役。

由此可见，俄军虽在兵力上占据优势，但机关枪的数量不如日军，而且双方兵力的差距也不是很大。满洲军总司令部认为，如果拖延时间，俄军兵力将进一步占优，而且也考虑到俄军的部署东西横亘 155 公里，纵深 15 公里，无法迅速将援军派到遭受攻击的地点。

支撑日军进攻计划的第二点要素是这样的作战。2 月 22 日，日军首先由右翼的鸭绿江军向奉天东面的抚顺进击。该军 24 日穿过山路，占领清河城，牵制俄军第一集团军。接下来，日军中路部队于 27 日发起猛烈炮击。与此同时，最左翼由乃木希典指挥的第三军向西大幅度迂回，开往奉天北面。日军从俄军正面守御严密的防线外侧绕行，要了库罗巴特金一道。在当时的作战中“迂回者恒被迂回”，但库罗巴特金自 1904 年 8 月的辽阳会战以来一直指挥平庸，才让日军得以进行如此大胆的迂回作战。由此，双方兵力的差距越发减小。

第三点要素在于两军的士气。在屡战屡败的俄军之中，常有部队由于总是处于守势而丧失自信。譬如，日军在奉天会战前组建了两支各有数十名骑兵的“挺进队”，派往俄军后方，破坏长春附近的铁桥。俄军得知这一消息后，后方部队中立即传开日军前来攻击的流言，出现恐慌情绪。库罗巴特金接到报告称，2.5 万人的护路队无法与日军对抗，请求从奉天派出几十个营的兵力增强后方警备。

另外，得知鸭绿江军的主力部队是打下旅顺的第十一师团之后，与之对阵的俄军第一集团军怀疑日军将在这一方向发动决定性进攻，因此普遍感到不安。于是，库罗巴特金派出邻近的第二西伯利亚军团一部与作为预备队的第十六军团一部等部队增援第一集团军。东路的这一变动，对于日军所期待的西进迂回作战极有助益。

当时乃木希典奉满洲军总司令部的严令，率领第三军向西画出一个巨大的圆弧，转而北上。

部队中的不安气氛，使得缺乏大规模战斗经验的俄军指挥官调度乖方。在此表现得尤为无能的，是负责防守俄军右翼，与日军第三军对抗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官考尔巴斯（Alexander Freiherr von Kaulbars）。格里彭伯格在黑沟台之战后返回首都，由他继任这一重要职位。

考尔巴斯的第一个失策，是平白放过袭击行军队伍绵长的日军第三军侧腹的绝好机会，而且命令正与日军第七师团（隶属第三军）苦战的托波尔宁（Dmitry Andreevich Topornin）中将^①所部撤退，缩短了战线。根据俄方战史，俄军“不与敌方生力军交战”，着意防守通往奉天的道路。于是，第三军继续北上，直指俄军背后。

考尔巴斯的第二个失策，在日军逼近奉天的3月6日终于暴露了出来。前一天，库罗巴特金鉴于一旦第三军继续向己方背后迂回，将会切断俄军全军与北方的联系，于是命令考尔巴斯全力发动攻击。但是，考尔巴斯误判形势，做出了错误的部署。俄方战史记载，库罗巴特金要求他亲自前去组织攻击。

在此期间，日军总司令部也在督促激励其他各军继续进击。不过，黑木为楨指挥的第一军在俄军面前几乎无法前进。野津道贯指挥的第四军虽然反复向万宝山发动炮击和突击，但始终未能攻克此处。只有奥保巩指挥的第二军，迫使由于分兵对付第三军而削弱兵力的俄军右翼〔第二集团军中的拉乌尼茨（Mikhail Vasilievich

① 时任俄军第十六军团司令官。

Schmidt von der Launitz)^① 将军所部] 后退。

在这种情况下，库罗巴特金 3 月 7 日认定必须集结全军对抗第三军以及与之联动的第二军，于是命令左翼的第一集团军与中路的第三集团军向浑河右岸撤退。这一举动让日军鸭绿江军、第一军与第四军的攻势更加凶猛，越发恶化了俄方的战况。结果，库罗巴特金 8 日下令全军撤退。从当日到 9 日，俄军逐次向北退却。尼古拉二世得知此事之后撤掉了库罗巴特金总司令官的职务，但尚不打算结束战争。总司令官一职由利涅维奇（Nikolai Petrovich Linevich）^② 接任。

5 战俘

日方战史记载，日军在奉天会战中伤亡 70028 人，俄军则伤亡约 9 万人。两军合计约有 56 万人参加此次会战，其中伤亡达到了三成。这样的数字，无论是对于难以派出援军的日本还是国内骚乱频发的俄国来说，都是促使战争结束的压力。

另外，此次会战还有一大特点，即俄军有大量官兵被俘。根据日方战史，在奉天被俘的俄国人共计 21792 人。《明治卅七八年战役陆军政史》的附录《俄国俘虏捕获总数表》则记载战俘总数为 20732 人。看来，这样的数字大体是准确的。相差的 1000 多人，大概是因为某种原因被释放，或者在送往战俘收容所的途中死亡。

① 时任俄军第二集团军司令部附员，考尔巴斯率领第二集团军一部前去堵截日军第三军之后，负责指挥该集团军余部。

② 时任俄军第一集团军司令官，1904 年 3 月 3 日升任满洲军总司令官。

从该表来看各个时期的“捕获俘虏”情况，日军俘虏俄军最多的一次是在“旅顺投降”时，其人数高达43975人。考虑到此役是海陆被围的要塞被攻陷，而且要塞司令官斯特塞尔较早决定投降，这样大的数字并非不可思议。然而，奉天会战时两军对峙而战，而且日军并未完成包围，因此两万余人的数字令人感觉未免太多了。再看以往的类似战例，辽阳会战时被俘的俄军有1127人，九连城之战594人，得利寺之战485人。可见，俄军战俘急剧增加是从旅顺陷落之后开始的（其后，俄军在日本海海战中约有6100人、在库页岛之战中约有4700人被俘，战俘总数为7.9万余人）。

奉天会战中有如此之多的俄军被俘，恐怕与俄军内部广泛存在的厌战情绪不无关系。奉天会战后负责收容俄军战俘的军官报告，俄国人“一般咸信不会遭到虐待，甚为安心，毫无愤怒惊恐之状，皆能听从命令，不稍反抗，保持肃静”。俄军之所以选择投降，应当是被厌战情绪笼罩，又听到了日军优待俘虏的传言。形成对照的是，被俄军俘虏的日军只有不到2100人。

同时，这场战争中也没有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普遍存在的虐待现象。这是因为尼古拉二世1899年发起的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上规定的《海牙陆战规则》^①当时仍在发挥效力。日俄两国关于战俘的规定也是本着《海牙陆战规则》而制定的。由此，日方于1904年2月、俄方于同年6月分别设立战俘情报局，两国政府在9月以后开始通过这一机构定期交换关于战俘的情报。另外，法国政府与

^① 正式名称为《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的章程》。下文提到的关于战俘情报局和利用战俘的规定，见该章程第十四条和第六条。

美国政府的代表分别受俄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的委托访问战俘收容所，也给战俘管理带来了或明或暗的压力。

与日后的做法尤其有所不同的一点是不强迫战俘劳动。日方的战俘管理细则第十五条规定“关于劳役及其酬金之规定，将应实际需求另行制定”，俄方的战俘管理暂行规则第十二条也规定“得以按俘虏官位与技能使之从事各种作业”。双方都准备让战俘从事劳动。不过，日方和俄方都没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布置过于苛刻的强制劳动。

不过，虽然说两国政府没有虐待战俘，但这基本是就战俘被送往收容所之后而言。在战场上，日俄双方都出现了掠夺战俘财物甚或杀害战俘的事件。由于战争为期较短，又以中国和朝鲜这样的第三国领土为战场，不会产生难以区分战斗员与非战斗员的情况，这样的事件恐怕是很少的（在已知有杀害俄军战俘事件发生的 1905 年夏天的库页岛战役期间，俄军使用了不人道的达姆弹，而且有服装和平民没有区别的义勇兵参与战斗）。

尽管如此，双方政府都认为战争是两国间的事情，与双方国民无关，因此维持了必须对脱离军队的人们采取不含敌意的对待方式的态度。

6 日本海海战

奉天会战结束之后，政治与军事再度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会战之后，满洲军总司令官大山岩向大本营表示，今后的战略必须与政策保持一致，因此要求树立明确的方针：满洲军应当转入防御还是

继续进击？

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收到这一提议后经过一番思考，3月23日写成一篇《政战两略概论》。山县指出，“即使夺哈尔滨、陷海参崴，亦未足曰予敌以致命伤”，因此需要抱有“今后作战数年”的思想准备。

3月31日制定的作战方针也定下了夺取哈尔滨、海参崴和堪察加半岛的目标。不过，在满洲军总司令部看来，这样的目标定得过高。为此，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前往东京，向高层建议尽快争取议和。结果，4月8日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在树立持久战方针的同时，也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争取议和。不过正如山县所言，俄方拥有动员庞大兵力的能力。因此，第二太平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决战是不可避免的。

罗热斯特文斯基海军中将（航行途中由少将晋升）率领的舰队到达马达加斯加后得到了旅顺陷落的消息。于是，舰队于4月初驶入马六甲海峡。罗热斯特文斯基月底决定，将舰队停泊在法属印度支那（越南）的金兰湾以北的云峰湾，等待仓促编成的第三太平洋舰队^①前来会合。第三太平洋舰队由1888年下水的战列舰“尼古拉一世”与三艘岸防战列舰等舰只组成。增派这批舰只，应当是为了弥补未能从智利与阿根廷购得的巡洋舰。

顺便一提，俄国舰队之所以不在设施齐全的金兰湾停泊，是因为日本对法国发起了强烈的抗议，提出中立国不应允许交战国利用本国的港湾。希望与英国改善关系的法国，是不能无视日本这一抗

^① 该舰队系抽调波罗的海舰队剩余舰船编成。

议的。

5 月 14 日，波罗的海舰队（第二与第三太平洋舰队）重新起航。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三种选择：鉴于目的地只有海参崴，只能选择取道对马海峡（朝鲜海峡）、宗谷海峡或津轻海峡。对此，大本营与联合舰队都判断波罗的海舰队会在对马海峡与津轻海峡之间选择其一。不过，第三太平洋舰队司令官涅博加托夫（Nikolai Ivanovich Nebogatov）少将日后回忆，他曾经考虑取道海雾浓重的宗谷海峡。

结果，罗热斯特文斯基考虑到 1904 年 8 月黄海海战中旅顺舰队在东乡面前逃走的先例，决心强行突破对马海峡。他认为，尽管与日本舰队的正面冲突不可避免，但将波罗的海舰队的大部分舰船带到海参崴还是可以办到的。鉴于舰队由包括运输船在内的 38 艘舰船组成，日方决不会熟视无睹地任其通过。

另外，联合舰队与大本营虽然估计俄国舰队应当会取道对马海峡，但毕竟没有十足的把握。到了 5 月 26 日，联合舰队终于得知波罗的海舰队在中国上海港外的吴淞，于是准备决战。次日早晨，辅助巡洋舰“信浓丸”在长崎五岛列岛以西海面发现了波罗的海舰队，镇海湾的东乡平八郎立即接到了这一情报。于是在 27 日下午，联合舰队与波罗的海舰队在対马海峡东水道进行了最后的海战。

东乡当时曾经反复思考，不要重演黄海海战的失败。他认为，日本舰队的目标在于全部歼灭波罗的海舰队的主力舰，即使让日本舰船处于危险境地也不得不为。联合舰队以前导舰“三笠”为中心，首先向西南行驶，似乎想要在波罗的海舰队前方做出横切动

作，而在双方相距 8000 米时突然向东北方向大幅度反转。由此，联合舰队与大体成两列纵队行进的波罗的海舰队并列航行，较后者居前一步。

眼见日本舰队转向，波罗的海舰队旗舰“苏沃洛夫”认为良机到来，开始炮击。冒着炮火转向的“三笠”以下舰船在双方相距约 6000 米时终于还击，炮火集中在波罗的海舰队旗舰“苏沃洛夫”和其后的“奥斯利亚比亚”上。一旦进入两支舰队并列航行的炮战，形势就利于训练更加投入的日方。不久，“苏沃洛夫”中弹起火，后烟囱和司令塔相继被击毁，罗热斯特文斯基也身负重伤。随即“奥斯利亚比亚”船身被击穿，向左倾斜。

由于联合舰队挡住去路，旗舰遭受重创的波罗的海舰队无法逃往海参崴方向，于是向东向南散开。然而，“苏沃洛夫”离开队列后，继为前导舰的“亚历山大三世”和“博罗季诺”先后被集中炮火击沉。也就是说，俄方先头四艘军舰中除“鹰”之外的三舰与第二战列舰分队的“奥斯利亚比亚”在开战几个小时之后或被击沉，或无法作战。

入夜之后，日本鱼雷艇对波罗的海舰队发动了攻击。这次攻击中，“纳瓦里诺”被击沉，“伟大的西索伊”等舰丧失战斗力。

于是，幸存下来迎接次日海战的俄舰，除“鹰”之外只剩下“斯维特拉娜”“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尼古拉一世”“谢尼亚文海军上将”等二流舰船。在 28 日的炮战中，这些舰船基本上皆被击沉或者在负伤后投降。结果，逃脱联合舰队攻击抵达海参崴的俄舰只有巡洋舰“绿宝石”和两艘驱逐舰而已。

至于日方，“三笠”虽然中弹较多，但不妨碍其作战，被击沉

的只有三艘鱼雷艇。日方的伤亡不到 700 人，俄方则有 5800 余人。对于俄国而言，“对马”成了一个象征其海军悲剧的词汇。

7 战和之间

日本海海战的结果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俄国未能夺取制海权。于是，日本外交大臣小村寿太郎认为没有必要等待俄方主动提议，于 5 月 31 日向驻美公使高平小五郎发出训令，要他委托罗斯福总统调停日俄谈判一事。

罗斯福立即劝说俄国驻美大使喀希尼（Arthur Paul Nicholas Cassini）召开日俄两国间的议和会议，并于 6 月 5 日指示美国驻俄大使迈耶（George von Lengerke Meyer）直接就议和谈判向俄方传达美国政府的意向。到了这一步，尼古拉二世也不得不接受议和。6 日，他集合重臣召开了御前会议。

会上首先说明，应总司令官利涅维奇增援 13.5 万名步兵的要求，俄方 5 月 29 日开始派兵，预计将于 6 月 24 日结束。俄方仍然拥有可以立即出动的兵力。

不过，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Vladimir Alexandrovich）大公^①随后强烈主张尽早进行议和谈判，定下了会议的调子。他的理由是：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海参崴、黑龙江口^②乃至堪察加半岛都可能遭到日军的攻击。他还补充道，如今国内局势不稳，应当优

① 亚历山大三世之弟，尼古拉二世之叔。

② 应指位于黑龙江出海口的庙街（俄名尼古拉耶夫斯克）。

先处置这一问题。即使如此，也有与会者反对向日本乞和。于是，大公将自己的意见总结为“如果议和条件真正令我方难以接受，届时自然不得不继续战争”。由此，姑且认为俄国向议和走近了一步。7日，尼古拉二世向迈耶大使表示接受罗斯福总统的调停建议。

6月9日，罗斯福正式劝告日俄两国政府结束战争，进行议和谈判。当天，日本领导层正准备实施已经准备停当的库页岛占领计划，但12日又将这一计划搁置起来。他们认为，不能让结束战争的难得机会由于这一作战化为乌有。

同一天，俄国政府正式答复，接受罗斯福的劝告。而日本领导层正式决定实行库页岛作战则是17日的事情。其后，陆军与海军的配合也花费了一些时间。因此到了7月4日，日军登陆库页岛南部的部队才从青森出发。事实上，日本政府接到高平公使的通知之后，已经于7月3日表示愿与俄方缔结停战协定。不过，俄方通过罗斯福要求这一提案应完全保密。日本政府鉴于这一状况，决意无视俄方的意向。

6日，高平公使接到了内容如下的训令：“此际倘若暂时停战，显然于我国不利，从而利于俄国。是故帝国政府确信以目下之时机停战，不啻不惟无以进和平之步武，反至催生相反之结果。当以此意述之。”

于是，罗斯福11日向高平提议缔结停战协定时，后者答以担心俄国与清政府一样在军事方面利用停战，因此不能接受。

俄方当时只是一味表示倘若条件屈辱则谈判决裂，没有向日方传达缔结停战协定的希望。在此期间，日本实行了库页岛占领作

战。7月9日，新成立的第十三师团一部组成的第一批登陆部队占领了科尔萨科夫（大泊），24日又在库页岛北部登陆，27日占领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和里科夫。结果，日军于8月1日占领库页岛全境。这是日俄战争期间唯一一次在当事国领土上进行的军事行动。

此后，尽管在朝鲜半岛上还有一些小的角逐，但日俄两军之间再也没有进行过像样的战斗了。不过，停战协定是在议和条约缔结前夕的9月1日才签订的。四十年后，日本遭到了苏联军队如同讨还利息般的一连串报复，但在当时是不会料到如此下场的。

近的未来与远的未来

1 议和条约的缔结

为战争带来终结的议和会议，由1905年8月9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小城朴茨茅斯召开的预备会议揭开序幕。正式谈判则从8月10日延至9月5日。日方的全权代表是从1901年起担任外务大臣，自开战时起便一手掌管日本外交的小村寿太郎。俄方的全权代表则是1903年8月卸任财政大臣，其后出任闲职的维特。他之所以被任命，是由于此前被指名的两名外交官皆推辞这一重任，尼古拉二世无奈之下只得如此。虽然沙皇不喜欢维特，但也实在找不到其他了解与战争相关的事务，同时又能够代表俄国的人物。

日方在会议上提出的诉求是明确的。1905年4月21日决定，并于6月30日由阁议通过的训令将议和条件分为三类。首先，作为绝对必要条件的是“令俄国承诺听任”日本“完全自由地处置”朝鲜、俄国与日本军队撤出中国东北、将俄国在辽东半岛的租借权与从哈尔滨至旅顺的铁路相关权利让渡给日本这三条。

其次，作为相对必要条件的是赔款、引渡逃往中立国的俄国舰船、割让库页岛与获得沿海省沿岸的渔业权四条。

最后，作为附加条件的是限制俄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解除海参崴港的武装。

由此观之，日本领导层在议和条约中最为关心的是保证日本面对俄国时的安全。如果满足绝对必要条件，俄国对日本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便被暂时封死了。相对而言，在议和会议中争执最为严重的赔款与库页岛问题只被看作第二等的要求。

另外，俄方也下达了训令。这一训令是在任命维特之前做出的，因此并没有要求无论如何也要达成协议和。它指出，割让领土、支付赔款、割让中东铁路一部与剥夺在太平洋部署舰队的权利这四项条件事关国家尊严，是俄国所不能接受的。俄国领导层认定，日本的军事资源与财政已经枯竭，而俄国以外的国家也不愿看到日本的国力增强如斯，于是下达了如此强势的训令。

然而，曾任财政大臣的维特熟知俄方的财政事务，并对尼古拉二世在开战过程中的冒险外交政策持批判态度，因此对于与日本进行议和谈判并没有心理上的抗拒。可以说，选择维特为谈判代表时，俄方（尼古拉二世）已经隐然认识到要做出一定的让步。维特出发前曾谒见尼古拉二世，得到的指示是“一个卢布、一寸土地也不能让出”。也就是说，在不赔款、不割地的条件下达成议和。这一内容虽然严厉，但比起为维特之前的议和代表制定的训令已经有所软化。

于是，虽然谈判的前景不被看好，但是在认为应当在此达成协议和的日本领导层与维特的努力下进展相当顺利。首先，小村与维特就关于朝鲜的条款达成了一致意见，亦即俄国承认日本对朝鲜有指导与保护的权力。小村秉承日本领导层之意，将朝鲜保护国化的条

款纳入条约之中，明确地排除了俄国与其他列强参与该国事务的可能性。

其次，双方也同意两国同时从中国东北撤军，进而将该地交还清政府。随后，让渡辽东半岛租借地与南满铁路的问题也较为简单地得以解决。关于后者，维特同意让渡由日军实际控制的长春至旅顺的铁路，而非哈尔滨至旅顺的铁路。于是，日方认为绝对必要的条件，在不到 10 天的谈判中便得到了满足。

然而，割让库页岛与赔款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执。按照维特的说法，俄国国民感情所系的库页岛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不容割让；而战争还未打到占领首都的地步便即结束，也没有理由赔偿军费。此外，尽管还有引渡被中立国扣留的俄国军舰以及限制俄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等问题尚未解决，但这只是小村作为谈判手段提出的条件，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事实上，小村 8 月 18 日已经准备以放弃这两个条件为代价获得库页岛与赔款，但没有让维特察觉这一预案。

8 月 22 日，维特收到了外交大臣拉姆斯独夫发来的电报：沙皇命令不屈从日本的要求，中断谈判。同一天，罗斯福总统发觉谈判有决裂的迹象，于是劝告日方放弃赔款的要求。在这样的压力下，小村在 23 日的会议上提出将库页岛一分为二，北半部归还俄国，作为代价由俄国支付 12 亿日元。但是，俄方对此也不表同意。尽管谈判有决裂的危险，双方都不肯让步。结果，29 日最终达成妥协：俄国割让北纬 50 度以南的地区，日本不要求赔款。

日本领导层此前已经决定即使放弃赔款与割地也要达成协议和，因此对小村通过坚韧的谈判取得库页岛南部感到十分惊喜。反之，

尼古拉二世在妥协方案成立后的两三天中对此感到不够满意，但其后观察周围的反应，终于予以承认。9 月 5 日，议和条约正式签订。由此，持续二十个月的殊死拼杀落下了帷幕。

2 战争的归结

综上所述，无论是战争的规模，还是作战的层次，抑或使用的武器，甚或支撑长期作战的前线与后方的密切关系，日俄战争与这一时期频繁发生的殖民地战争都有着本质性的差异。一言以蔽之，这场战争是普法战争结束后三十多年未曾有过的大国间的战争。堑壕战与机关枪的组合、情报与宣传的利用、为确保制海权而进行的陆海军协同作战，欧洲诸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动用的几乎所有战争手段都曾在这里现身，或至少初现雏形。俄国将日本视为殖民地档次的国家，结果在严峻的考验中尝到了苦果。

在此再一次确认这场战争的规模。对于这一问题，最便于理解的指标是参战人数与伤亡人数。日方参与作战的军人与军属^①总数，根据《日俄战争统计集》，前线与后方共计超过 108 万人。至于俄方，如本书第二章所述，仅通过西伯利亚铁路送往战场的兵力便超过 129 万人。战死者与负伤者的数量，根据统计方式的差异有所不同，一般认为日方战死约 8.4 万人，负伤约 14.3 万人。俄方的统计较不明确，伤亡数字的记载从 19 万余人（含战死 4.8 万余人）至 27 万余人（含战死 5 万余人）不等。

^① 即军队中的文职人员、雇员、勤杂人员等非军人。

这样的大规模战争一般都会给社会带来大的变化，日俄战争也不例外。其给战后两国的历史带来的主要影响，可以归结为军方与大众地位的变化两点。

首先，日比谷暴动事件显示出了日本社会发生的变化。这一事件的起源，是政治家、新闻记者与社会活动家认定议和条件是屈辱的，企图组织集会。9月5日，警察封锁了预定作为会场的日比谷公园大门，设置栅栏禁止集会。但聚集在公园入口的数万名民众拒不服从，攻击执行警戒的警察，闯入了公园。同时，由于计划在市内其他地方进行的演讲会也被迫取消，狂怒的民众袭击了内务大臣官邸与支持议和的国民新闻社。

政府虽然出动军队企图镇压，但在入夜之后，东京市内的许多派出所、电车和教堂等设施遭到纵火破坏。于是，政府终于在市内与周边的郡^①颁布了戒严令。时至9月7日，秩序终于恢复正常。

这一事件表明，日俄战后的日本社会正在走向大众时代。批判藩阀政治的势力试图利用社会的这种变化改变政治结构。1906年初政权从桂太郎内阁到政友会的西园寺公望内阁的移交，明显地表现出了对这种变化的适应。尽管这一内阁只加入了政友会的原敬和松田正久，但政党主导的政治终于显出了端倪。

不过，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还没有立即走到实行普遍选举法（1925年公布，1928年举行第一次总选举）的地步。不能将政治交给“愚昧的民众”的意见，在社会上层当中相当盛行。尤其是因战争的胜利而地位上升的军部，在山县有朋的领导下强力抵抗民主

^① 当时日本的行政区划，介于府县与町村之间，较市略小。

化的动向。山县 1910 年曾表示：“社会主义乃贫富悬隔之胚胎，普遍选举将政权分配于下层，实现普遍选举于实行社会主义至为便利，两者之间可谓仅隔一步。”也就是说，普遍选举与社会主义是一体的，对日本而言都是危险的事物。

于是，希望增强陆海军实力、提升自己影响力的军部，与在大众压力下以确立欧美式政治体制为目标的政治家与言论界人士之间产生了对立。这样的对立，决定了直至 1920 年代的日本政治。

至于俄国，从战争末期开始，希望进行革命的势力与旨在成立议会的势力为争取民众而反复角逐。在议和确立的 9 月，各地大学生召开集会，集合大量工人与市民进行政治讨论。10 月，莫斯科的印刷厂发生罢工，进而扩展到纺织工厂，铁路工人也参与其中。到了 10 月中旬，莫斯科通往外部的铁路全部中止运行。罢工也蔓延到了哈尔科夫、圣彼得堡、华沙等地。

由于铁路中断，大城市的生鲜食物等商品价格腾贵，社会出现动荡。在这种革命气氛浓厚的情况下，沙皇于 10 月 21 ~ 22 日连续召见维特，征询意见。维特主张，鉴于当下的社会运动追求自由，沙皇应当顺应民意，开设国会。尽管沙皇也征询了其他高官的意见，但也找不到其他对策。于是，沙皇终于在 10 月 30 日发布诏令，承认人身不可侵犯、言论自由等原则，并宣告将基于有相当数量国民参加的选举开设国会。

这道诏令颁布之后，当年 12 月通过了区分选民身份的选举法^①，

^① 即 1905 年 12 月 11 日颁布的《国家杜马选举法》。该法规定土地所有者选民团每 2000 人选举 1 名代表，市民每 4000 人选举 1 名代表，农民每 3 万人选举 1 名代表，工人每 9 万人选举 1 名代表。

1906年实施了议会选举。尽管这是土地所有者一票相当于工人四五票的不平等选举，但终究是开启了大众参与政治生活的议会政治。

由于俄国战败，军方无法成为社会的保守主义基础。社会上下都不能理解，为何俄国这样的大国会败给一个亚洲岛国。虽然应负最大责任的是沙皇，但并没有人追究他的责任。激烈的纠弹声浪，一直到了审判军方上层的地步。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决定旅顺要塞投降的斯特塞尔。他在军法审判中被判处死刑，但得到减刑，处以十年徒刑（到了社会不再关心此事的1909年，他被尼古拉二世赦免）。进而，俄国政府设立了审查军方上层资格的委员会。结果从1906~1908年，有4307名将官以年老或不称职为由被编入预备役。

需要特别记上一笔的，是俄国成立了检讨日俄战争史的委员会，收集了庞大的资料，于1910年编成一部极其详尽，并对军方态度严厉的战史。这与日方欠缺分析的官方战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军方上层在这一系列行动中受到损伤的权威，经过日俄战后的十年仍然未能恢复。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一年里，便有50万名俄国人从前线逃亡。随着战争持续下去，革命势力赢得了民众，增强了影响力。反之，逐渐得到沙皇认可的议会政治在民众当中却没有扎下根基。最终，1917年爆发了大规模革命，共产主义者列宁掌握权力。结果，直至戈尔巴乔夫创立人民代表大会之前，俄国约有70年不曾施行议会政治。就这样，日俄战争将日本与俄国导向了完全不同的历史道路。

3 何谓日俄战争

最后，试述战争给国际社会造成的影响。日俄战争是明治新体制成立未满 40 年的亚洲国家击败欧洲大国俄国的大事件。这明显表示，只要妥善实行从欧洲诸国学得的改革，非欧洲国家也可以向欧洲诸国挑战并战胜之。这正是日俄战争所带来的观念 (ideology)。

这场战争也将日本推上了东亚强国的位置。战后，日本吞并朝鲜 (1910)，进而向中国寻求在东北的特殊“权益”。这样的举动激起了中朝两国国民的激烈反弹，但却无力阻止。日本的举动也招致了欧美诸国的批判，但即使是这些国家也难以干预。当然，日本的经济规模无法与欧美诸国比拟。但正如日俄战争所显示的，它们不可能在东亚集中与日本对抗的军力。

最先认识到这一事实的国家是英国。1905 年 8 月改订的日英同盟规定，其中一方受到他国无端攻击时，另一方应“立即向其盟国提供援助”。英国鉴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同意缔结更加明确的同盟关系。

日本领导层认识到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弱肉强食，于是希望强化与英国之间的同盟关系。譬如，山县有朋认为，尽管日本战胜了俄国，但胜利是有限度的，俄国必然会“复仇地南下”，因此“此次和平乃稍为长期之休战”而已。他基于这种观点，于 1907 年制定“帝国国防方针”，规定因对抗俄国需要拥有 25 个师团。另外，日本海军在同一国防方针中以美国为假想敌，

规定需要战列舰 8 艘、装甲巡洋舰 8 艘，也就是所谓的“八八舰队”。

日本这样的态度，影响到了列强，尤其是一半以上国土在亚洲的俄国的对外政策。由于丧失了大部分海军，又丢掉了中国东北南部的据点，俄国不得不认真考虑与日本的关系。从日俄战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日俄关系处于史上罕有的友好时期，正是这一情况的结果。1907 年，缔结了第一次日俄协定。这一协定附属的秘密条款规定了两国在东北的势力范围，并相互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与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

同样的协定也在 1910 年、1912 年和 1916 年签订。最后一个协定确定了两国的同盟关系。尽管山县有朋相信俄国将会复仇，但显而易见，当时的俄国领导层希望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确保本国在欧洲方面的安全。

俄国在这一时期采取的政策不只是对日修好而已。至 1907 年，俄国领导层放弃了结好德国的路线，转而走上了与英国和解与协调的路线。鉴于日本与英国在亚洲结下了牢固的同盟，加入英法协定对于保障俄国的安全显然是合宜的。国力急剧增强、旨在挑战英国世界霸权的德国将俄国视为自己的追随者（junior partner），刺激了俄国领导层的自尊心，使得两国难以维持友好关系。于是，同年 8 月英俄协定缔结，与德国与奥匈帝国的同盟形成对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两大阵营至此成立。就这样，日俄战争成为将列强导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触媒。

顺便一提，有许多日本人鉴于日俄友好关系持续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重视断言旅顺陷落时“不是俄国人民，而是专制制

度遭到了可耻的失败”^① 的列宁在 1917 年俄国革命后建立共产党政权这一事实，认为日俄战争在日俄关系中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然而，日俄战争败北的记忆依然存留在很多俄国人的脑海中。日本于 1918 ~ 1922 年对西伯利亚的出兵，以及 1930 年代两国激烈的军事对决，一次次地促使俄国国民回想起俄国与日本作战并败北的往事。1945 年 8 月，苏联向在二战中面临失败的日本宣战，击垮了盘踞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9 月 2 日（日本当天签署了投降书），列宁的后继者斯大林宣称，这次战争是为洗雪日俄战争的耻辱：“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 40 年。”^② 山县有朋在日俄战后的预言，至此成为事实。

其后，日本与俄国的关系一直深陷在这场“第二次日俄战争”的影响之下，直至今日。两国之间遗留的边境划界问题^③，和日俄战争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① 出自列宁撰写的《旅顺口的陷落》一文（刊于 1905 年 1 月 14 日出版的《前进报》第 2 号）。

② 出自斯大林 1945 年 9 月 2 日发布的《告人民书》。

③ 即北方四岛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日文文献

井口省吾文書研究会編『日露戦争と井口省吾』原書房、1994。

石井常造『日露戦役余談』不動書店、1908。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 外交と内政 一八九八—一九〇五』木鐸社、2000。

ウイッテ伯回想記（大竹博吉監訳）『日露戦争と露西亜革命』復刻版、上、中、下巻、原書房、1972。

D・ウォーナー、P・ウォーナー（妹尾作太男・三谷庸雄訳）『日露戦争全史』時事通信社、1978。

ウッドハウス暎子『日露戦争を演出した男モリソン』上下巻、東洋経済新報社、1988。

宇野俊一校注『桂太郎自伝』平凡社、1993。

J・エリス（越智道雄訳）『機関銃の社会史』平凡社、1993。

大江志乃夫『日露戦争の軍事史的研究』岩波書店、1976。

大江志乃夫『明治卅七八年戦役軍政史解説』湘南堂書店、1983。

大江志乃夫『兵士たちの日露戦争 五〇〇通の軍事郵便から』朝日新聞社、1988。

大山梓編『山縣有朋意見書』原書房、1966。

海軍歴史保存会『日本海軍史』第一卷、第一法規出版、1995。

外務省蔵版『小村外交史』上下巻、新聞月鑑社、1953。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三三巻～第三七巻。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 一八四〇—一九四五』上下巻、原書房、1965～1966。

D・キーン（角地幸男訳）『明治天皇』下巻、新潮社、2001。

A・クロパトキン（参謀本部訳）『クロパトキン回想録』東京偕行社、1910。

桑田悦『近代日本戦争史第一編、日清・日露戦争』同台経済懇話会、1995。

軍事史学会編『日露戦争（一）』錦正社、2004。

小林一美『義和団戦争と明治国家』汲古書院、1986。

小林道彦『日本の大陸政策 一八九五—一九一四 桂太郎と後藤新平』南窓社、1996。

小森陽一・成田龍一編『日露戦争スタディーズ』紀伊国屋書店、2004。

参謀本部編『明治卅七八年日露戦史』全10巻、東京偕行社、1912～1915。

参謀本部編『明治三十七・八年秘密日露戦史』復刻版、巖南堂、1977。

参謀本部第四部編『明治三十七八年役 露軍之行動』全12巻、東京偕行社、1908～1910。

信夫清三郎・中山治一編『日露戦争史の研究』復刻版、河出書房新社、1972。

田辺元二郎・荒川衛次郎『帝国陸軍史』帝国軍友会、1910。

谷寿夫『機密日露戦史』原書房、1966。

角田順『満州問題と国防方針 明治後期における国防環境の変動』原書房、1967。

徳富蘇峰編述『公爵山縣有朋伝』下巻、原書房、1969。

沼田多稼蔵『日露陸戦新史』岩波書店、1982。

橋川文三『黄禍物語』岩波書店、2000。

I・バード（時岡敬子訳）『朝鮮紀行 英国婦人の見た李朝末期』講談社、1998。

古屋哲夫『日露戦争』中央公論社、1966。

松尾尊兌『大正デモクラシー』岩波書店、2001。

松山大学編『マツヤマの記憶 日露戦争一〇〇年とロシア兵捕虜』成文社、2004。

明治期外交資料研究会編『日露講和関係調書』第一巻、クレス出版、1995。

陸軍省編『明治軍事史』下巻、原書房、1966。

陸軍省編『日露戦争統計集』復刻版、巻一、巻一五、原書房、1994～1995。

I・I・ロストーノフ編（及川朝雄訳、大江志乃夫監修）『ソ連から見た日露戦争』原書房、1980。

B・A・ロマノフ（山下義雄訳）『満洲における露国の利権外交史』復刻版、原書房、1973。

西文文献

O. R. Airapetov, red. , *Russko-Iaponskaia voina, 1904 – 1905* (Moskva: Tri kvadrata, 2004).

J. F. A. Ajayi and Michael Crowder, eds. , *History of West Africa* (London: Longman, 1971 – 1974).

B. V. Ananich, et al. , red. , *Iz arkhiva S. Iu. Vitte* (St. Peterburg: DmitriiBulanin, 2003).

M. F. Boemeke, R. Chickering, and S. Forster, eds. , *Anticipating Total War* (Washington D. C. :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9).

J. S. Corbett, *Maritime Operations in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 – 1905, vol. 1 – 2* (Newpoet: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1994).

V. I. Denisov i S. S. Sulina, *Rossiia i Koreia, nekotorye stranitsy istorii (konets 19 veka)* (Monskva: MGIMO (U) MID, 2004).

Dokumenty po peregovory s Iaponiei 1903 – 1905 gg. , *khraneschiesia v kantseriarii osobogo komiteta Dalnego vostka* (St. Peterburg, 1905).

J. E. Elliot, *Some did it for Civilization, some did it for their Countr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P, 2002).

M. M. Evans, *Encyclopedia of the Boer War*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00).

V. V. Glushkovi A. A. Sharavin, *Na karte general' nogoshtaba, Manchzhuriia* (Moskva: Institut politicheskogo i voennogo analiza, 2000).

A. V. Ignat'ev, *S. Iu. Vitte-diplomat* (Moskva: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a, 1989).

N. A. Korfi A. I. Zvegintsov, *Voennyi obzor severnoi Korei* (St. Peterburg: Voennaia tipografiia, 1904).

R. Langhorne, *The Collapse of the Concert of Europe* (London: Macmillan, 1981).

M. I. Lil'e, *Dnevnik osady Poet-artura* (Moskva: ZAO Tsenrpoligraf, 2002).

A. Malozemoff, *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1881 – 1904*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7).

B. Menning, *Bayonets before Bullets* (Bloomington: Indiana UP, 2000).

K. Neilson, *Britain and the Last Tsar, British Policy and Russia 1894 – 1917*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I. Nish, *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1985).

S. C. M. Paine, *Imperial Rivals* (New York: Sharpe, 1996).

M. Pokrovskii red. , *Russko-Iaponskaia voina, izdnevnikov A. N. Kuropatkina i N. P. Linevicha* (Leningrad: Tsentrarakhiv, 1925).

Rodina, no. 1, 2004, Moskva.

I. S. Rybachenok, *Rossia: Mezhdunarodnoe polozhenie i voennyi potentsial v seredine 19-nachale 20 veka* (Moskva: Institut rosiiskoi istorii RAN, 2003).

D. Schimmelpenninck van der Oye, *Toward the Rising Sun*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P, 2001).

V. Shatsilloi L. Shatsillo, *Russko-Iaponskaia voina 1904 – 1905* (Moskva: Molodaia gvardiia, 2004).

A. Svechin, *Takticheskie uroki Russko-Iaponskoi voiny* (St. Peterburg: Tipografiia A. S. Syvorina, 1912).

A. Svechin, (ed. by K. D. Lee), *Strategy* (Mineapolis: East View Publishcations, 1992).

A. Svechin, *Predrassudki i boevaia deistvitel'nost'* (Moskva: Finansovyi kontrol, 2003).

A. Svechin i Iu. D. Romanovskii, *Russko-Iaponskaia voina 1904 – 1905* (Oranienbaum: Izdanie offitserkoi strel'koboii shkoly, 1910).

A. E. Taras, *Russko-Iaponskaia voina na more 1904 – 1905* (Minsk: Kharvest, 2004).

A. M. Verner, *The Crisis of Russian Autocracy, Nikolas II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90).

Voenno-istoricheskaia komissiiia Russko-Iaponskoi voiny, *Russko-Iaponskaia voina 1904 – 1905 gg.*, 9 vols (St. Peterburg, 1910 – 1913).

D. Wolff, *To the Harbin Station, The liberal Alternative in Russian Manchuria, 1898 – 1914*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9).

B. Zewde, *A History of Modern Ethiopia 1855 – 1974* (Addis Ababa: Addis Ababa UP, 1991).

V. A. Zolotarev red. , *Rossiia i Iaponiia na zare XX Stoletiia* (Moskva: Arbizo, 1994).

* 此外亦曾利用福岛县立图书馆藏佐藤文库的日俄战争关系文献。

译后记

《日俄战争：20世纪第一场大国间战争》的翻译工作终于告竣，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从2018年夏天到2019年春节前夕，这一工作持续了大半年时间。同时，这也是我博士学习阶段的最后一年。它花费的精力比想象的要多一些，不过仍是值得的。

就原书的开本和体量而言，可以称之为“小书”。它是日本老牌出版社中央公论新社出版的“中公新书”系列中的一种。所谓“新书”，即日本特有的一种开本较小（主流为173mm×105mm）的书籍，由1938年岩波书店出版的“岩波新书”首开先河。1962年开始出版的“中公新书”，与“岩波新书”同为日本出版界最负盛名的两大“新书”品牌。比起同样为小开本、重在经典重刊的“文库本”（岩波和中公也同样出版“岩波文库”与“中公文库”），“新书”多为通识性（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读物。当年赴日留学时经常逛书店，书架上动辄一字排开几十册的“新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水准而言，中公新书旗下的作品却不可谓之“小书”。其作者阵容相当雄厚，多为中坚研究者，亦不乏声名显赫的大牌学者。“大家”写“小书”，向来是学术界最为推崇的通识读物写作方式。对应通识读物的定位，各书的主题一般也相对宏大。普通读者读完一册，便可在某个领域大体形成入门级的知识水平。专业研究者则可撷取其中的观点，与作者隔空砥砺切磋。

《日俄战争》便是这样一本高水准的“大家小书”。作者横手慎二教授毕业于东京大学，现为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是日本知名的俄国政治外交史研究专家，著有《现代俄国政治入门》《俄国的政治与外交》《斯大林》等书。翻译本书，对研究方向为近代中日关系史的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基础练习。书中内容自有读者品评，在此不多置喙。我自己读来最有兴味的，是书中对日俄战争的军事史分析。横手教授在自序（原书后记）中提到，本书的写作受到了苏联军事理论家斯维钦相关研究的触发（书中也参考了多部斯维钦的著作）。因此，比起一般的日俄战争通史著作，本书的军事史味道更浓厚一些。相信军事史的爱好者与研究者会对本书很感兴趣。

本书翻译过程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李期耀、陈肖寒两位编辑老师花费了大量心力。同门唐仕春师兄、梁敏玲师姐、王淑会师妹分别在俄文、日文、越南文方面有所指教。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武向平老师抱恙之时仍代为核对书中所引《外邦测量沿革史》，尤其令我感动。谨此一并致谢。当然，书中可能出现的舛误应由我负责。

吉 辰

2019 年 3 月 19 日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It depicts a dramatic seascape with two large, multi-masted sailing ships, likely galleons or similar vessels, navigating through turbulent, dark waves. The sky is filled with swirling, dark clouds, creating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intensity. The style is characteristic of literati painting, using varying ink tones and brushwork to convey texture and atmosphere.

NICHIRO SENSOSHI

BY Shinji YOKOTE

Copyright © 2005 Shinji YOKOTE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UOKORON-SHINSH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HUOKORON-SHINSHA,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日俄战争史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是20世纪大国之间进行的第一场战争，以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甚至被有的学者称作『第零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是如何爆发、如何收场的？新兴国家日本缘何取胜，老牌强国俄国又如何战败？战争对两国社会与国际局势产生了什么影响？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与之有何关联？归根到底，日俄战争是怎样的一场战争？读过以俄国研究著称的横手慎二教授的这部作品，以上这些问题将得到解答。

启微



出版社官方微信



启微官方微信

ISBN 978-7-5201-4496-4



9 787520 144964 >

www.ssap.com.cn

定价：49.00元